黑色文库 第五集

文彻赫恩 著

苦难的历程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五集

苦难的历程

文彻赫恩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3

目　录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出版缘起.....5
郑义：(序)万分之一的幸存者文彻赫恩.....9
前言.....15
参加 1947 年的学生运动.....21
没有去台湾.....28
军队里的黑暗.....30
离开军队.....34
反胡风运动.....36
我竟变成了空降特务.....48
毕业演出成功了！.....50
鸣放、反右和整风.....53
我被逮捕入狱.....57
发配青海改造.....69
大炼钢铁.....76
香日德农场.....81
三年自然灾害.....86
第二次死亡.....92
赶排《洪湖赤卫队》.....97
万人批斗大会.....102
我新生留场就业了.....107
管教员强奸我老婆.....115
孩子唱错了歌.....122
谁是剥削者.....128
中苏边界冲突.....129
妈妈来信了.....131
我终于平反了.....133
文化精英的遭遇.....139
我看偷渡潮.....144
丑陋的中国人.....147

1. 1978年平反回校。
2. 1982年在美国自由女神像前留影。
3. 1982年来美见到90岁老妈。
4. 1986年拍电视剧《瞿秋白之死》，饰演国民党团长。
5. 2001年和孙子合影。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在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

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3 年 9 月于华盛顿

万分之一的幸存者文彻赫恩

郑　义

这本自传名为《苦难的历程》，与阿·托尔斯泰(Aleksei N. Tolstoi 1883-1945)描写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同名。小托尔斯泰曾流亡西欧，但没过几年便耐不住寂寞，终于回苏俄当御用作家去了。他的这部十月革命三部曲我看是写得有点违心。共产党允许你回去，给你别墅庄园汽车，你是不是总得有所表示？按照时间顺序，写完革命就该写劳改了。小托尔斯泰写完三部曲就去世了，没有写劳改，另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高尔基写了。虽然他被誉为呼唤革命的海燕，但还是被共产党的血腥所震慑。出走了，也是耐不住寂寞，又回去了。这就要将功补过，要极为无耻地吹捧暴君，还要去访问劳改营，讴歌劳改犯开挖大运河的伟大社会主义劳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也写劳改，文字当然比不上那些大作家，但没有颠倒黑白，至少写得很真实、真诚。

文彻赫恩是一位中国劳改制度的幸存者。从中国的劳改营里活出来，这很不容易，从青海劳改营里活出来就更不容易。我游历青海时，友人曾告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说有广东右派八百余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后“改正”时，发现竟无一人存活。广东方面抱怨说“也不能一个也没活下来呀？”青海方面则反唇相讥：“谁让你们往这儿送？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小托尔斯泰为《苦难的历程》(*Trudnye Gody*, 1943)第二部所撰写的开卷语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

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按照这种说法，那化为白骨的八百个右派应该是比较纯净了。

助人“纯净”的办法很多，最为简易且效率最高的是饥饿。现在甘肃省的“夹边沟”劳改营很有名，在大饥荒的 1960 年前后饿死了一千三百人，算下来有一半以上。文彻赫恩的见闻更可怕。他所在的劳改犯文艺队到“白浪沟”分场去演出，犯人们听说场长也来了，大呼“场长来喽！场长来喽！”随即一拥而上，把场长和干部们围得水泄不通。“几乎一个不拉的，二千余劳改犯非常统一，整齐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救命啊！场长救命啊！’拖拉机上的人每个都流下了热泪，我强忍着眼泪算未掉下来，但泪水已湿透了我的眼睛。饥饿使人变成无理性，好像人们都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最后刘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大家才慢慢地起来，排队去领饭了。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 1962 年这个分场撤销时，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 85%。”如果文彻赫恩的记忆无错，那白浪沟就远远超过夹边沟了。这剩下的 15%，还会以种种方式死掉一批，最后活下来，精神也没有彻底垮掉的，就实在是凤毛麟角了。还能写书，为那段苦难历史作证，也只有数万分之一吧？这样说起来，文彻赫恩的这本书确实是值得每一个同情心尚存的中国人祝贺的。

文彻赫恩出生于一个满族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共产革命。中共夺权之后，他退出中共“解放军”，成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高材生。不久他便因言获罪，沦为“阶级敌人”。据他自己计算，从 1958 年春被捕入狱至 1978 年冬平反

止，文彻赫恩共计坐牢二十年九个月零十一天，加上坐牢之前“群众专政”近三年，合计二十三年八个月。他如此概述道“我今天能活着出来，离开人间地狱，算是命大。虽然我没有死，可我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将折磨我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断、左耳被打聋、牙齿因营养不良脱落十二颗，打掉四颗，共十六颗、腰被打致残，成终身疾病，这都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在精神心灵上的折磨摧残，使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将永生陪伴着我……我热爱中国，但共产党的独裁和暴戾迫使我逃出”古拉格”，远离中国 ，我只能生活在异国他乡，从遥远的地方怀念它。”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最后的安慰奖是参加好莱坞影片《喜福会》的演出。他是纽约地区一千多名应征者中唯一被录取的，可惜是个小角色，不过几个镜头。聊以自慰的是“中国大陆有几个演员能在好莱坞上戏？”但事实是“从此之后就再没有机会了”。二十年以上的劳改生涯，还说什么呢？整个生命无非是“劳改期间”（主体）、“劳改之前”（初涉人世）和“劳改之后”（余生）三个阶段罢了。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

文彻赫恩是一个有良知的头脑清醒的人，但他仍然堕入受难者之间残忍的倾轧与互虐。在囚吏们的煽动下，难友们极其凶残地打他，九死一生。反过来，他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报复。在一次“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到来之际，他十分清醒地舍弃人性，“准备好一根白腊杆，四十公分长的木棍，这种木头不会断还有弹性。凡是斗过我的揍过我的人，都一一回敬他们一顿白腊杆，打得他们皮破肉裂，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哇哇叫！几个月下来我报复了不少人，心里才平静些、心理也平衡些，总不能老叫别人

揍啊！也得揍揍别人，尝尝那种滋味。”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在那种环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会变成没有人性了。热血变冷，人变成兽，既残暴又凶狠，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大约正是劳改制度最成功的一面，就是利用人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弱点，迫使受难者互虐，从而建立起劳改营中的多数暴政！连文彻赫恩这样明白的人，都压不住仇恨，拎着一根白蜡杆把难友们往死打。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耶稣基督。在那种制度下，我们无可避免地堕落为助纣为虐的魔鬼。我说“魔鬼”而不说“野兽”，那是因为野兽一般不会如此凶残地对待同类。这就叫“异化”，即，我们的努力反过来成为迫害与蹂躏自己的异己的力量。

除此，更加令人叹惋的是，文彻赫恩身为那个血腥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那个制度的宣传者、粉饰者。他导演了鼓动阶级斗争的经典之作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以及美化中共夺权史的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特别是歌剧《洪湖赤卫队》，这是他在青海劳改营中的得意之作。当然，这不是他一个。所有的犯人不是也和看管蹂躏他们的“管教人员”一起鼓掌叫好吗？这也是共产专制最为成功的一面。任何野兽，都不会和猎人一起高唱狩猎之歌。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人类现象。洗脑洗透了骨髓。我没有进过劳改营，没有资格来评论那些历尽酷刑、饥饿与死亡的幸存者。特别是本书作者文彻赫恩，他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真的死人堆，不是文学比喻。我尊敬他，我尊重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他、以及他的成批死亡的难友的名字，应当以金字写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史册。血真是流

得太多了！当正义的暴风雨彻底涤荡那块大陆之前，是他们的脖子硬把刽子手的屠刀磨钝了！

我不是苛责文彻赫恩。我只是为我们这个被催眠被洗脑被打断脊骨的民族倍感痛心。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就共产专政这个制度而言，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建设者、维护者。不在其中者甚少甚少，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内。

2003 年 9 月 1 日　于华盛顿

前　　言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总想把我经受过的一切，随时光的流逝而忘。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还是不能忘记，就像在昨天在眼前……

我会以平静的心，对待过去发生的事，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绝望！

这本小书，我是噙着泪写的，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人类社会在进入到廿世纪中叶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暴君苛政统治下受煎熬的日子！这一页历史早已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消逝，永不！

此书献给所有活着的人们。

让廿一世纪的人类活得更美好，愿人类远离一切人为的苦难！

苦难的历程

参加 1947 年的学生运动

1947 年 5 月 20 日，学生运动从北大开始不久，就蔓延成全国性的运动，简称为“五二〇”学生运动。其时我们中学生可以不参加，但我们学校和别的中学不同，我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大批爱国青年流亡到关内北平，于 1934 年 3 月 26 日在北平成立的。抗日战争时期，该校迁往大后方四川省自流井市静宁寺。胜利后，1946 年迁回沈阳。这个学校自成立时起，学生就以校为家。学生都很纯朴，学习都很好，而老师们也同样以校为家，多是优秀教师。学生质量和教师质量在当时都是一流的，有许多教师都是留学生回国任教的，学生学习毕业后都能考上各名牌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他的国立中学都取消了，只有我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唯一留下来的一所国立中学。

回沈阳之后，光学生就有两千余人，加上教职员工足有三千人。五二〇学生运动爆发的起因，是为北大一年级女同学沈崇被美军驻北平的士兵强奸而引起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我们学校特殊，所以也决定响应全国学联号召，参加全国学联决定的五月二十日罢课游行。本来决定在那天，沈阳市五大国立院校一齐出动上街游行，但学校早晨即被军警包围，学生无法走出校门，学联适时决定全体学生在校内罢课一天以表抗议。

没过几天，学校接到全国学联和东北学联的通知，全国学生在六月二日举行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为主题的示威游行。六月二日那天，原计划东北大学从北陵出发到马路湾和沈阳医科大学和我们学校汇合，从太原街游行到市政府。但天还没有

亮，军警已经把学校封锁得水泄不通，别的学校也如此。东北学联决定，全体同学在校罢课，绝食以表抗议。

我当时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长得人高马大，所以学生会指定我为纠察员，保护学校及同学。当时，我守在靠北一马路的边门，和四、五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聊天，看着包围我们的士兵端着枪来回的转悠。将近中午的时候，学生会决定派一名小同学溜出去给对面的沈阳医大送个信，告诉我们学校已开过全体同学大会，一致通过罢课绝食抗争到底，全体同学当场宣誓。可这位小同学走出去不到二十米就被抓住了。我们四、五个同学一拥而上把士兵按倒，并把步枪缴了下来。这个士兵看我们人多，站起来看看，撒腿就跑。不到三分钟，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一个尉官和三个手持冲锋枪士兵下车后直奔学校二楼办公室，学校教官出来，叫我们把枪还给他们。临走时，那个军官对我说："警告你，下次再抢枪，可以当场击毙你，注意啦！"从此以后我倒是在全校出名了。

其实我们生活挺好，从来没有挨过饿。那为什么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呢？当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年轻人爱凑热闹，觉得挺有意思的。由于我们游行被阻，我对当局的做法反感，认为国民政府不给学生自由，压制民主，所以对政府的专制不满，这是我第一次在思想上起了朦胧的变化！

当年九月开学不久，某天晚上自习后，我和韩良、韩宗泽、魏岱几个人肚子饿了，到校门口小馆吃水饺去。忽然看到从太原街回来的几个女同学哭哭啼啼地，我就上前去问："出什么事了？"她们说："去建国西堂看电影，被收票的人（是军人）摸

脸和摸屁股，所以电影没看就回来了。”我一听就火了，敢吃我们中山女同学的豆腐！我们知道建国西堂是军人电影院，属东北行辕管辖的。我和韩良说了一声：“走！我们找他们评评理去，愿意跟我们走的来吧！”大概有十来个人跟了上来。

我们直奔建国西堂电影院，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告诉韩良：“你们在下面等着，我上二楼找他们经理评理去。”到了经理室，经理叫两个士兵把我看住了，竟然想把我扣下来。我拉开门大喊：“韩良快回学校喊人来，他们把我扣下了！”韩宗泽说：“我去。”我说：“回校后掀警铃。”不到十分钟，中山同学一千人左右把建国西堂包围，要求立刻放人，否则开砸。经理一看这些“丘九”也是不好惹的，就把我放了出来。我下楼之后大喊一声：“开始砸！”只见韩良拿着铁棍一下子就把门口的大镜子给砸得粉碎。这个镜子足有一丈高、二丈多宽，特大！这一来把电影院的观众都吓得往外跑。我们的同学往电影院里头冲，开始砸电影院了。大银幕被撕坏，音响座椅不到几分钟全部给解决了。

学生们准备回校时，整个大街上都是我们的同学。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咖啡厅”，一个穿著军官制服的上尉从咖啡厅走出来说：“你们这些学生在胡闹甚么！”学生一听，火冒三丈，一拥而上。军官一看不妙，转身就跑，直奔中苏友好大厦，边跑边往天空放枪。同学们紧追不舍，他又往地下开枪。这一下不要紧，当场打在我班同学李善金的脚上。李善金大叫：“我受伤了！”魏岱急了：“你敢开枪打我们！”一个箭步冲过去，拿着铁棒子朝头上就是一下，当场脑袋瓜头破血流，学生们上前把他逮住，缴下他的手枪。魏岱把手枪交给我说：“怎么办？”我答：“先

把他押回学校再说。”我通知两个同学扶着李善金到附近诊所和医院包扎治疗，然后对全体同学说：“同学们快撤回学校去，军队说不定马上就赶来了。”同学们撤得很快。我们走不远就看到来了几辆十轮军用大卡车，上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直开到建国西堂。

学校同学们都集中在大礼堂里，已把开枪伤我同学的上尉军官五花大绑吊在舞台上的天桥下面。这时我的朋友郑安腾过来和我说：“这个受伤的军人是我们家的副官。”我一听楞住了。“你们家的副官？他开枪打伤了我们的同学李善金，同学们火了才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郑安腾是东北剿匪副司令郑洞国的儿子，我们是要好的同学。我当机立断，把人放下来，把手枪也交还给他。他满头血淋淋地和郑安腾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敬我一个军礼，并讲：“下次有空到家里玩。”后来我确实去郑家玩了两次，和这个上尉军官混得还挺熟。其实那个副官人并不坏，是误会了。

军队的十辆大卡车满载军人，已开到我们学校门口来了。当官的少校已上二楼校办公室去了，要求学校交出肇事者，带大盖帽的学生！魏岱跑来告诉我：“怎么办，找你呢！”我说：“得赶快溜呀！”魏岱跑回宿舍，拿来替换衣服。我到厕所换好衣服，从学校正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也看到军车上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看着我，我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他们面前，回家避难去了。

回家的第二天，我看到《沈阳日报》和《沈阳晚报》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并指出有共匪学生在煽动闹事！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本人只是平生一贯爱打抱不平，有正义感，爱管闲事而已。

二个星期后，魏岱跑到家里来告诉我学校已出布告，我和韩良、韩宗泽三人是留校察看处分，我只记一个大过。至此，建国西堂事件总算结束。

1948年1月放寒假前学校宣布，沈阳市国立院校宣布学生一律要参加冬令营，不参加冬令营的一律开除学籍。我们入冬令营不到两周，元宵节前夕，本来和家里说好正月十五回家过节。晚上十一点钟我们遭到大逮捕，总共有一百余人。有东北大学和沈阳医大的，我们中山的共有二十三人，东北大学最多，农学院也不少，沈阳医大有十三人。我们被关押在沈阳北市场一个军队的仓库里，是钢骨水泥的结构，都是水门汀地。东北本来就冷，这下可是雪上加霜了，又无暖气，感到特别冷。我们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女同学在楼下，男生在楼上，东北大学的学生发起绝食以表抗议。中山的同学是中学生，一般年纪都小，都听大学生的话，也参加了绝食斗争。

三天后，沈阳市警备司令王铁汉来探望我们。东大同学表示要求转换环境和改善生活。两天后，我们就迁到沈阳市第三女子中学宿舍大楼里了，全部睡在三楼，饭厅也是用三女中的。因为是寒假期间，学校没有学生。我们入冬令营时每人发的军棉衣，现在都贴上一符号在自己的左胸兜上面，写着“青训大队第四中队”，中间四个字是“爱国青年”，下面是自己的名字。

每天除了早晨上早操跑步外，其余时间都无事可干，打扑克的、瞎聊胡扯的都有，只许在三楼活动。宪兵虽然看守很严，但态度很好。这些宪兵都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都是宪兵学校毕业的。他们是在日本执行任务回来后，接到看押我们的任务的，日子长了反而和我们交上朋友了。只要我们给他们钱，请他

们帮忙买一些日用品和吃的都可以。从他们的眼光里，我们看到友善和同情，这就是学生和学生的内在联系，不同于那些大老粗士兵。

我们听过一次报告，由长春警备司令廖耀湘主讲，内容大意是我们年轻幼稚不成熟，不要受共匪的欺骗，他们利用你们煽动罢课闹事，你们学生的任务就是在学校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受过两次审问，第一次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什么人介绍的？"我回答说我才上高二第一学期，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何况我根本不问政治，你们可以调查。讲良心话，我还真不懂共产党是什么一回事，只知道他们挑起内战，想夺国民党的权！其时，我们班上的共产党员盖大北、孙辑六和刘大文在我们被捕的前一天已转移到开原县老区去了，而我们被捕的人大多数是在学校爱出风头爱管闲事的人，而他们共产党人从来不抛头露面，他们总是在下面搞串连，煽风点火。

第二次审问是在半个月后，问："在去年六月二日罢课期间，你强夺士兵们的武器，是谁指使干的？九月份你带领学生把军人电影院建国西堂给砸了，是谁指使你干的？"我回答："确实没有人指使我，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正义感，自动自发，都是临时动议，无任何预谋和计划。我们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加上我姐姐找到辽宁省主席高希滨，把情况说明并打包票："我弟弟绝不是共产党。"就再也没有问我什么了。

我们的情况后来有所松动，下午可以到大操场上打球和散步。我们洗过两次澡，在不远的地方，晚间十点澡堂停业之后，我们才由宪兵押着去澡堂洗澡。由于我们住的条件差，天气又

冷，换的衣服又少，所以每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每天早晨穿衣服前都先抓好虱子再穿，晚上也是脱下衣服先抓虱子再睡。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虱子，密密麻麻地，一把一把地抓，看着都肉麻，全身不时地发抖、打颤，每天身上都奇痒不堪。

三月初，学校陆续开学了，三女中也不例外。全校有一千多女同学，对我们这些小伙子，都以好奇疑惑的眼光打量。特别是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在操场打篮球运动时，几乎全校的女同学都倾巢而出，观看我们。操场位置在中间，三面都是大楼，正面是大门。所有大楼从一楼到三楼的门口、窗户上都挤满了叽叽喳喳、指指点点的女生。花花绿绿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头巾，像节庆一般热闹。有时我不打球了，干脆坐在球场边上，从一楼到三楼，逐个窗户看过去，看完了这幢楼再转过身子看那幢楼，欣赏这些妙龄少女，其乐无穷。可惜只能看，不准接触和谈话。可就在宪兵们刺刀的监视下，春光关不住，红杏照样出墙，爱情是束缚不住的。女学生吃完饭十分钟后，我们才集体进食堂开饭，可就在饭桌上留字条和留情书的大有人在。后来听说真有几对认识了，成了情侣，真是坏事变了好事。

四月中，我们被释放了，还有一部份大学生尚被羁留，以后听说没多久也都释放回校了。我回到学校后，即准备购买飞机票，因为我家早已迁到北平生活了。不到两周，我买到回北平的机票，旋即飞回北平家中和家母及姐姐团聚。妈妈高兴得流着泪来迎接我，姐姐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和妹妹已去广州了。

由于这次坐牢，我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乱抓好人。虽然后来全部释放了，但总觉得受了委屈受了罪。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而共产党讲的就是

民主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贪官污吏和腐败，讲官兵一致，官民平等，穷人富人都一样，共产党肯定比国民党好。而且，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也搞得好，解放前夕，1948年秋天，我们经常到北大沙滩民主广场去参加火炬营火会，他们教我们唱一些进步的歌曲，如：山那边有个好地方、茶馆小调、国民党一团糟、团结就是力量等，对我的影响也不少。

没有去台湾

由于我参加过 1947 年的“五二〇”及“六二”两次学生运动，所以在 1948 年 1 月底遭国民党逮捕入狱，后送青训大队。在青训大队期间我结识了东北大学的学生雷公和东北农学院的学生戴福忠及沈阳医大的同学。他们都比我年长，对我们小同学特别关爱和照顾。那时我才十七岁，读中山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在审讯我的时候，青训大队的人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在什么地方？是谁介绍的？以及共产党怎样指示学生参加哪些活动？我一概不知！当雷公他们知道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后，就向我介绍了一些共产党的情况，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其实这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我们年纪小又不关心政治，当然不懂内情，每天只知道读书和玩耍。四月中旬我们被释放回校，两周后我即飞回北平（现北京），和家人团聚。

九月后，妈妈、哥哥、姐姐、妹妹等亲人决定去台湾，而我受当时气氛的影响，自有打算，决定不跟家里走。我不去台湾的理由，一是我第二年即高中毕业，准备投考北大和清华，如果去了台湾，就不可能考北大了。二是我相信共产党说的，要让人民

当家作主，建立国富民强的新中国，相信全国不久即会全部解放。当时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也准备迁往台湾，一部份同学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流亡学生南迁团，从北平出发，经上海转往台湾。教育部在各大城市设立了流亡学生的接待站，负责转运学生的工作。我们中山的同学走了二、三批，像我班的同学瞿黑山、“台北青年乐团指挥”杨世良等等就去了台湾。我有几次去台湾的机会都自动放弃了，坚决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谁知，这竟成了我终身遗憾的大错。

不久我们学校也由沈阳迁往北京东城隆福寺崔府夹道。九月一日继续上课，这时我比较注意局势了。我觉得国民党腐败，人民起来反对它。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最为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想我为共产党坐过牢，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有功之臣，共产党一定不会亏待我的。当时要走很方便，中山同学就有几批流亡学生团前往台湾。我当时年轻幼稚，才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我在青年时代是一个非常不恋家的人，加上听信共产党的宣传，信以为真，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毅然离开了家，诀别了亲人。当我长大懂事、想家恋家，思念亲人时，又不知家在何处了……。苦难降临到我头上时，我才恍然大悟，当初未听老人家的话，但为时已晚，就是向苍天呼救，也无济于事了。

1949 年 2 月 1 日，北京和平解放，这一天早晨我们冲上大街，狂欢庆祝，迎接解放军入城。那时北京市人口也不过七、八十万人，可跑到街上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入城的人群，竟达到三十万人！我们男女青年学生非常激动，唱歌、扭秧歌，热泪盈眶，欢迎中国未来的希望，欢迎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群

体，人民的救星——共产党。大家相信人民终于能当家作主了，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生活即将来到，老百姓真的解放了，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三月初，我决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军队里的黑暗

我参加随军南下工作团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当时北平市很多招生单位，如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军政大学等等。但这些大学都有名无实，报名者只要有初中文化程度，年满十六岁均可入学。这些名为大学，实质上就是交待历史、改造思想的单位，进去才半年，就毕业分配工作。我二月中旬考取华北大学第三部戏剧文学部。后来没有去，认为要革命就参军，随部队南下为革命成功做先锋。

随军南下是有战争风险的。南下地点是两广一带。我们虽然是文工团，但男的全部发枪枝、子弹和手榴弹，以备随时战争。打过长江之后，就开始徒步行军了。每天步行平均九十里，不但要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背上枪枝弹药手榴弹，加在一起有百十来斤。行军是非常艰苦的，每天汗流浃背，到了湖南，我已无力背负行李了，除了武器，别的全扔掉，只留了一双老百姓送的拥军鞋，千层底，以备走路用。脚上不知起了多少血泡，每天晚上停下来就开始挑血泡，以备第二天继续行军。到了宿营地后，首先还得给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时开展军爱民活动，搞好军民关系，才能打胜仗。

在湖北省鸡公山整修时，我们每天从信阳火车站，往鸡公山上背粮食。一般每人背一袋面，顶多也是二袋“炮车面”，一袋五十斤。我经常背三袋，有时四袋，每天跑二趟，将近一百里路。因为我表现出色，很快就入了青年团。

进军到湖南地区时，我们文工团没有粮食吃，必须派人前往离驻地有九十里的介守镇背粮食回来。因为我人长得高大魁梧，刚入团，热情非常高，团长就派我和通讯员宋月芝去扛粮食。我们两人都是棒小伙子，每人发两枝枪，长短各一把，以备万一。我们傍晚出发，天亮以前一定要赶回驻地。当我俩背着百十来斤的粮食回来时，用枪声，二快一慢，联系了队里，我就累得躺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得等接应人来，把粮食运回去。

另一次是押送文工团的器材设备和乐器，雇了 7 个挑夫，由我和另外一个人押送。走到两风桥时，天色已黑，听到枪响，我立刻命令挑夫跑到公路边的水沟里，趴在那里不许动。我也趴在公路下面，看见国民党散兵，骑着马在山上走过。真险呀！我出了一身冷汗。要是碰上了或是被发现，我们准完。我们只有两人，他们起码有一个排的兵力。

根据这两次的表现，我应该被记大功一次的，但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我违反了纪律，功亏一篑。那次是在衡宝战役之后，俘获大批俘虏，押送人员不够，上级决定叫文工团派几个去帮助押送。我们共三人押着一百多俘虏，他们不听指挥，乱窜乱走，不时还有掉队的。有一个俘虏不走，我气急了就用枪托打了几下。后来在评功会上他们说我违反俘虏政策，不予记功。我心中有点不服，但领导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反正我在解放军南下行军中尽职尽力，可以说比文工团所有人员贡献都大。另外一点，

我和女团员颜某接触比较多，经常帮助她，文工团王团长看了吃醋，当然评不上功了。

1949 年冬，四十九军解放桂林，我们随战斗部队一起进城。当时桂林城内仍是一片硝烟弥漫，我们奉命停止前进，在桂林扎根长住，成立军政大学，招生培养广西省所需的军队干部。我们搬进了原国民党省政府“皇城”院内，文工团就驻扎在桂林最佳风景区之一的独秀峰山脚下。当时桂林人民流传一句话“桂林山水甲天下，最佳山水在军大”！

在半年多的行军中，文工团女团员颜某经常帮助我洗洗补补，就这样她遭到第一副团长的批评，指定我们俩要相互表态，以后互不来往，并写出保证书。我当时很反感，问王副团长：“这是什么意思嘛！”他说：“就是不叫你们谈恋爱。”我回答：“我们根本没有谈恋爱，你们不是教导我们，同志之间要互相帮助吗？”副团长说：“那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嘿！我们那点不正常？”副团长说：“我看你们不正常，反正不准你们来往，否则以纪律处分！”呵？真不讲理！我心里想这哪叫官民平等呀！完全是以官压人嘛？我火也上来了：“报告团长，别说我们没有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你又怎么样？”副团长道：“告诉你，解放军有规定，三、六、团才有资格谈恋爱结婚——三年党龄、六年军令、团级干部，少一不可！女同志例外。”这不就等于明摆着，年轻女学生只能嫁给老干部了！我想解放军里怎么这么黑暗。

不到一个月，是 1950 年的春节，副团长宣布停止我的团籍，我思想非常不满。不久，我就看见副团长老把颜某叫到他宿舍里谈话，一谈就是半夜。后来大家也明白了，是王副团长追求

颜某，并以入团、入党为诱饵。后来不久颜某果然入团了，只是他也没够资格结婚，只是一个营级干部。后来事情传开了，副团长因追求颜某而打击文彻赫恩，名声不好，到了春天，他就被调走了。

不久我注意到，每逢星期天，团、师、军的老干部，都来文工团看我们。表面上是关心团员的生活，实际上是来看文工团的小姑娘们。我们文工团女的都很年轻，多半是中学生，少数大学生。我思想揣摩着，不许我们接近女的，而他们却可以到文工团来挑选，并且以团籍党籍做条件，如果嫁给老干部，马上可以入团入党。更可恨的是，他们动员小姑娘“老干部为革命南征北战，没能成家，现在仗打完了，没结婚。你们嫁给老干部就是你们对革命的具体贡献！”这是什么婚姻制度？简直和奴隶社会制一样。更何况老干部很多在农村也有妻室，只不过是农民老百姓或小脚女人，他们嫌她们土气。土八路进城换老婆早已成风，这是共产党掀起的第二次换老婆热了。第一次是抗日时期，许多女中学生、女大学生都奔赴延安抗日根据地。到了延安之后，共产党高官也是用以上手段换老婆，把原配农民老婆，休的休，扔的扔。我院党委书记是第三野战军转业的团级干部，就休了小脚农民老婆，娶了我院女同学张某。副院长江俊峰，于 1952 年初和我院任政治辅导员的王某结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辅导员王某和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袁某搞不正当两性关系，被人抓住了，而王某平时张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尽说漂亮话、唱高调，经常批评这个人作风不好，那个人道德败坏，经他手劳改劳教的就有几个人，结果自己是地地道道的道德败坏份子，他没有脸再活下去，结果自寻短见了。后来我们江副院长又

把农民的小脚夫人接到上海来了，重修旧好。换了是一般群众，早就给你判劳改和劳教，罪名是重婚罪。

离开军队

解放后第一次政治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对象主要是国民党人员，国民政府的官员干部和军、警、特、宪等人。这样的人一律镇压，判刑的人较少，多数被处以极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一致行动，每天各个城市都几百几百集体处决的，声势浩大。镇压行动持续了一年。据有关报导，当时被枪毙的人就有四百万之多，判刑的不在其内！这个运动我没有参加，但我敢说里面肯定有冤枉的。毛泽东规定每次运动按百分比来镇压异己，按一般常理有些单位可能多一些，有的单位可能就没有，而没有的就要硬凑数。就拿反右派运动来说吧，搞错的或曰是扩大化，按照比例竟是99%错了！可以说全部搞错了。

1952 年的春天，中共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上开展五反，而我们部队搞三反。三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腐化、反官僚主义。文工团第一副团长王某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和颜某有不正当关系，被调走之后，又调来一位政治指导员，叫郑恒纳，山东人，初中程度。这样，第一副团长的位置就由第二副团长李鹏顶上。

三反运动一开始，政治部下达命令，叫群众揭发文工团的问题。女团员李某和陶某都是我的老乡。她们告诉我，在 1950 年时，李副团长把陶某叫到办公室，企图强奸未遂，把腿弄断了，休息了几个月。当时他说是晚上上厕所出来时摔倒了。现在事情

的真相是，他企图强奸时，两人搏斗而造成腿部骨折。李某也告诉我，在她生病时，割盲肠才出院，躺在宿舍里休息，李副团长来到她的宿舍，突然冲上来压在她身上，企图强奸，而李拚命的大叫，才把李副团长吓跑。在全团揭发大会上，我发言揭发了这两件解放军干部做出的不光彩勾当。会后大家都认为我大胆检举，不留情面，坚持真理正义的行为非常可贵，一致推举我为核心组副组长。“三反核心组”共五人，成员都是党团员，只有我什么都不是。几天后，新来的政治指导员郑恒纳和女团员分队长白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也被揭发出来了。在大会上我也补充发言证实，我在一天中午亲眼看见郑指导员和女分队长白某两人同在一个床上睡午觉。三个月后问题都基本搞清楚了，走了一个腐化的副团长，又来了一个搞腐化的指导员，而李副团长，又是两次企图强奸未遂！怎么共军的干部都是这样啊！我太失望了，特别是王副团长的卑劣手段，打击我、迫害我，只是为了达到自己追求颜某的目的。闹了半天解放军里面这么黑暗！算啦，我决心不干了，打报告请求转业和复员。

1952 年 7 月 4 日，我离开了部队，回到我参军的城市北京。我日夜不停地读书准备功课，决心考大学。九月中旬发榜，我竟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了。到了大学之后我努力学习，我想这是高等学府，环境和人都一定是高层次的，是学习圣殿，一定是光明磊落的知识份子群体，我会学习到不少东西。谁知道到了 1955 年肃反运动，我被陷害，说我组织一〇五反动乐团。到了 57 年我又被划为极右份子，成了双料的反革命份子。58 年整风初期，我即被逮捕入狱。我多次被共产党诬陷，险些送掉性命。我对共产党的希望、幻想，一次又一次的破灭。

反胡风运动

1955 年夏，毛泽东发动了反“胡风运动”。报纸书刊电台广播天天不停地叫喊，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上海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份子。《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头条头版新闻进行大批判，并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紧接着，许多文化人开始遭批斗，审查隔离反省。真是风声鹤唳，气氛紧张，人人自危。

我们学校相对倒很平静，表演系三年级（简称表三）的功课比较紧，因为还有一年就毕业了，这也是关键的一年。我这个人自入学以来，只知道钻研功课，无心注意社会上的事。努力充实自己最重要，对政治非常的冷漠，不感兴趣。班上几个团干部党员都说我是纯技术观点，只专不红，我当时还满不在乎。技术观点有什么不好？难道只喊口号，业务一塌糊涂，饭桶草包就好？

戏剧学院 1952 年取录的大学生，《人民日报》都有名单。北京考区共录取三名：娄际成、陆世德和我。我是在原北大沙滩红楼应考的。

戏剧学院不大，学生也不多，全校只有二百余名学生，仅有三个系：戏剧文学、舞台美术和表演系，加上教职员工也不过四百人左右。校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1844 号，这是一幢灰色的四层大楼。第一层四川路小学，二至四层才属于戏剧学院。二楼是表演系排练室和舞蹈教室。三楼是舞美系、戏文系和办公室。四楼则是图书馆和小剧场。别看剧场小，可是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几乎上海及全国的著名艺术家、导演、演员、教

授，都在我院任过教。像欧阳予倩、曹禺、郑君里、赵丹、陈鲤庭、佐临、丹尼、盖叫天等等。学院有这样好的师资队伍当然会出人才。后来中央戏剧学院要人，就把一部份师资调到中央了，如欧阳予倩、李建吾教授等。后来，学校要扩大，原校舍太小，决定搬到现在的静安区华山路630号，直到今日未动过。

学校的广播在每天中午开饭时和下午四点半以后的课外活动时间广播。某天中午吃饭时广播开始，首先播放东方红歌曲，然后，广播人，我班同学曹宇文说："请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饭厅，听完广播再走。接下来是正文："我院表三文彻赫恩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潜伏的反革命份子。他们一伙在学校散布反动言论，煽风点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最后一句："文彻赫恩你是皇帝子孙，快快坦白！"全校同学都在饭厅吃饭，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表示拥护，热烈鼓掌，每一个人都盯着我看。这突然的打击使得我措手不及，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我闷头了，只感头晕眼花，头像要爆炸似地嗡嗡作响，感觉恶心要吐，又像要摔倒似地站不稳。也许是人的本能反应，我警告自己不能倒下去，顶住！可能我的脸色早已变得发青了。我终于屹立未动，还装着拥护的样子鼓掌。我放下饭碗说了一句话："我是黄帝子孙，你们难道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身边一位同学说道："你说什么？"我看他一眼说："没听见拉倒！"转身走出饭厅。

我毫无目的地走向大操场，这儿是同学们经常散步的地方。我走到足球门框下靠在那儿，坐下来，看着那稀稀拉拉、参差不齐的草坪，仰头看着那灰灰蒙蒙、永远看不着蓝色的上海天空。

我的心很痛。难道我的祖先是满人就有罪吗？是的，我们是旗人，而且是上三旗、镶黄旗。我们是古满族，鄂河国人，始祖伯尔济是和多尔衮并肩作战的大将，随顺治皇帝进京。上有三兄也是武将，我们可谓将门之后。小时候我听母亲讲起家史总是乐而不倦。曾祖父依典阿事业辉煌，房产之多土地之大，在奉天(现在的沈阳)一带无人能相比。祖父景祺更是赫赫有名，曾和铁岭有名绅士比穿套裤，三年半有余，每日换一条新的不重样，家里堆了几箱子套裤！祖父经常和下人赌牌，曾输了几幢房子给大师父——厨子。祖父共有妻妾八房之多，可谓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享尽了荣华富贵。可惜好景不长，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军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由于时代的突变，祖父受不了而精神崩溃，年仅三十六岁就自杀身亡！

姐姐曾说："东北大学二千多学生，都是公费学习，只有我一人是自费。"校长也说过："景袖坤是景二爷的孙女，那得交学费，谁叫他家太有钱了！"为此姐姐差点转到冯庸大学读书，因为姐姐是东北著名运动员，每次运动会，总是拿三项冠军。冯庸大学愿以每学期三百大洋为报酬，要姐姐转学，可是因父亲不同意而作罢。姐姐在抗战前夕结婚后即退出体坛。她是文武全才，又是校花。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机会让她充分发挥。

父亲文烈在奉天和北平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抗战初期，我们家迁居广东清远县。父亲在这一地区留下许多笔墨。后来移居大后方重庆，在路经广西八步县时，不幸逝世，年仅四十岁。

父亲是一个热爱公益的人。听家母讲，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和阎宝航在奉天，共同创办贫儿学校。咱们家和阎家是世交，记得小时候在重庆日本大轰炸时，咱们家房子被炸烧光，我们就全部

搬到阎家住。那时我和阎明复都还穿著开裆裤在一块玩耍，可以说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我遭迫害，阎明复则高升了，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共统战部部长。他由于1989 年“六四”学生运动时曾和赵紫阳一同前往”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而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姐夫、大哥、二哥都成了东北接收大员，我们家族于是又兴旺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内战又起，全家决定迁往台湾，唯一留下了我。当时我不愿走，一是为了升学，二是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蒋介石政府给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要求结社、出版、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等，深得人心。特别是年青人，很多都被他们吸收，壮大了队伍。我就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家庭，参加革命，随后加入第四野战军，随军南下。

抚今追昔，我深觉茫然。是我当时太天真幼稚？还是共产党欺骗人民的手段高超？

已是期末考试前夕，快放暑假了，大家都在准备功课迎接考试。下午，全班同学开会，由班上团支部书记党小组组长夏守鸿主持，政治辅导员张庭顺坐镇。他是专管学生思想的政治干部，没有同学不怕他的，连班主任薛沐也得听他的。

夏守鸿首先号召全班同学要划清界线，对我大胆揭发。由于脑子很乱，他们说些什么我听不大清楚。吃饭前还是好好的学生，怎么广播以后就成了反革命份子呢？突然受到这样的刺激，这么大的压力，几乎让我精神崩溃。反胡风运动实质上就是肃反运动的开始。从那时起，除了考试就是开批斗会斗我。我什么也交待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组织什么反革命小集团。由于精神压力

太大，我吃不好、睡不着，每天昏昏沉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他们给我派了四个“保镖”日夜守着我。

学校的广播经常点我的名，同学们见到我都离得远远的，怕受到株连。他们用这种方法孤立我，企图把我搞臭，目的是伤害一个人的尊严。

我不明白，我的确没有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为什么非要叫我承认组织过小集团？其实我在学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体育方面，我是校游泳队的救生员，也是篮球校队成员，音乐方面我是学校乐队唯一的大提琴手，也是上戏、外语学院、财经学院联合乐队的成员，担任过队长。我交谊舞也跳得好，曾获大奖。我还经常担任接待外宾的工作。这些社会活动，全部停止，他们不许我参加任何活动。

经过几个礼拜的批斗，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又出新招。一天上午 8 点开始，全院开批斗大会，另加两位平时和我接近的同班同学——蔡振声和王文杰，全是部队转业下来的，说我们三人是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批斗会由张庭顺主持，班上彭淑娴和魏淑娴做纪录。会场设在 202 舞蹈教室内。我被指控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头，蔡振声是大将，王文杰是军师。他们编造得挺绝的，真像有那么回事似的。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揭发我的是王培力，现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她说我欺骗她的感情。我心里觉得很好笑，我们又没有谈过恋爱，平常的来往也不多。在我未被批斗之前，她曾经请我看过一次电影，就在学校隔壁的永安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她的身体老往我身上靠，贴得挺紧的。我那时无动于衷，不是我不需要感情，但我是个穷学生，靠助学金生活学习，哪里还有心思谈恋

爱呀！再说，我也暗下决心，事业不成功绝不谈恋爱。可是那时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谈恋爱已成风，因为再有一年学习即将毕业，确定恋爱关系后，分配工作可以在一起，美其名为组织照顾。

第二个发言的是吴桐桦，表一的学生，从附中部升上来的。她说我造谣，诬陷她和表四潘鹤祥在四楼小剧场后台拥抱接吻（她是全校的模范团员），说我破坏她的名誉。其实我确是看见她和潘鹤祥拥抱接吻。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到小剧场舞台上准备片段作业，我饰演《龙须沟》中程疯子的一个片断。走进后台一推门，正看见他们的热烈场面。我停了一下，悄悄地离开了，他们也已经发现了我。事后我并没有和任何人讲过，因为我认为谈恋爱拥抱接吻是正常的事。但这个模范团员竟然怕我说出去，名誉不好听，因此先发制人，恶人先告状。在会场上我当众把她顶回去了，我说："我和你无怨无仇，诬陷造谣你什么？现在你可以当场问大家，我私下有没有讲过你和潘鹤祥的事！"会场上一片沉静，无人发言。倒是夏守鸿打了圆场，说："现在大家继续发言，揭发批判文彻赫恩在各处散布的反动言论，你好好记下来，散会后回去写出，全面检查。"

会议开了四个多小时，散会时，组织者宣布从下周起开始放暑假，学校利用暑假期间搬往新校址，华山路 630 号。又宣布我们三人隔离审查，不许和他人接触，不许交谈。同时宣布我们这个班不放暑假。从暑假开始，班上成立了项目小组，专门搞我们三人反革命小集团的问题。项目小组的成员有团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夏守鸿、团宣传委员尹建明、团干部魏淑娴和彭淑娴，争取入团者李尚奎为组长。

我们一切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彻底失去了自由，连大小便都得报告批准之后才可方便！全班同学轮流看守我们。我们三个人单独在灰楼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各住在三个角落，剩下一个角为看守人员休息的地方。

我开始整理材料，对大会揭发的问题，我认真地做出全面的检查交待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攻击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问题。

我的原话是："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趁机侵入东北，拉东北的机器、物资和粮食。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来有九个高炉，被苏联拉走七个。苏联红军不但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强奸中国妇女。当时东北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剃了光头，白天不能出门，怕碰上苏联红军，甚至有的苏联红军女兵还强奸中国男子！"我承认讲过，但不是造谣诬蔑，是事实，不相信可以问问东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文人郭沫若 1949 年 4 月在南下工作团一次为我们作报告时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地点在北京朝阳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的，说："领导叫我们一面倒，倒向苏联，那为什么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拉我们工厂的机器和物资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苏联红军干的，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兵干的。机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机器有毛病坏了，是苏联老大哥拉回去帮我们修理的。"而事实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边倒的问题。

"我对苏联有看法，从历史上看，在沙皇时代，俄国人对东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不走。虽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也应该提高警

惕。”至于对苏联专家援华，我也有想法：“苏联专家在我院教学的列斯里是斯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没有去世的学生，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里涅夫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可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老师几十倍！我认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们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关于污蔑党团员和丑化党团干部问题。

我承认看不起团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夏守鸿，我曾断言他不适合当演员，认为他是天然性体形僵硬，两只手一上台就像鸡爪似地太紧张。历史证明我说对了，他一直在云南省艺术学院当行政科长。再有就是尹建明，走路一跳一跳地，脚后跟不沾地，鼻子永远不通，大柿饼子脸，个子又小，我讲他不能当演员。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他毕业之后回安徽省，在剧团当行政干部。

1953 年大二时，政治课是由上海财经学院杨荫簿教授担任（他是 1957 年反右时上海十大右派之一）。在期末考政治经济学时，我考九十分，是全班分数最高的，而且只答了一张卷子。它被贴在黑板上做示范让大家阅读。之后我曾说过，一天到晚唱高调又红又专，咱们的团支部书记才考五十三分不及格，到底谁政治好，大家看黑板嘛！

我从大一到毕业，成绩一直是属于优等生的成绩。他们批判我只专不红，我则反驳：“念不好书，没有学到本事，怎么为祖国建设服务？光唱高调，祖国就富强昌盛啦？”

读大学时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在寒暑假期间，我把下一个学期的功课全都准备好了，所以我有时间去锻炼身体，也有时间去拉大提琴、学跳舞。大学里每年春天都放春假二周，学生会组织大家去春游，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脱离群众。我则理直气

壮地反驳："我没有钱，春游费、伙食费谁帮我出？"他们无话可答。一个暑假翻来覆去就是检查这些问题。

项目小组反复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我没有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怎能承认呢？他们使用疲劳轰炸的办法，把人分三班轮流上阵，八小时换一班，不叫我休息也不能睡觉。一天两天我熬过去，三天以后我也顶不住了，困得要命，两个眼睛早已不听指挥，眼皮老打架。人是要睡觉的动物，他们却一点人道主义也不讲。夏天天气很热，有一次我实在是太困了，竟然把头撞在书桌角上，虽然流着血，但我仍然呼呼大睡。事隔几十年后，我头部左角还有一个疤。且将此做为永生的纪念吧！

他们软硬兼施，逼、供、信、诱供什么手法都用尽了，但我仍然不承认。后来他们又用挑拨离间的方法说蔡振声、王文杰已坦白交待并且检举我了，要求我自动坦白，仍然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我说："既然他们检举我了，有了旁证，那么你们定我的罪好了，我没有什么好交待的。"

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说："只要你承认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现在可以把反革命三个字取消，承认组织小集团，我们马上停止开会，恢复你学习、拍戏的权利，你仍然演你的程疯子！"我则说："我不会编瞎话说假话，我就是承认了组织小集团，问我为什么要组织小集团，什么目的？什么计划我也一概答不出来。你们不是叫我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吗？怎么可以教我说假话编瞎话欺骗大家呢？"

几天后项目小组又出新招："你不用写检查，批判材料，只写一张小字条也可以，承认组织小集团就可以，你看怎么样？"

我回答："这又不是做买卖讨价还价，你们这不是叫我欺骗组织欺骗领导嘛！一切后果由谁负责？"他们说："一切后果由项目小组负责，绝不叫你承担一点责任，这一点你放心！"我答："我仍然不能这样做，这是自欺欺人，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呀！"

坚持几天后，他们又出新花样，这次由两位女同学出面，魏淑娴和彭淑娴。她俩找我个别谈："这样吧，你写一张小纸条说是自然形成小集团，一切就完了。"而且他们当场裁一张小纸条放在我书桌面前。我想了半天："不行，这是欺骗。"

这些党员为什么这样昧着良心叫我编瞎话说假话？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存的什么心，为什么这样做。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了我还未找出确切的答案。

我平反之后，回到学校工作，见到这些人，他们若无其事，好像过去没有发生任何事似的。他们从未感到惭愧和内疚，竟然都升官了，有的还当上系主任，像魏淑娴之流！

特别使我反感的是他们说我参军是混入革命阵容。我在项目小组会当场把他们顶回去："我参军的时候是 1949 年三月，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华北还在战争中，华东淮海战役还未分胜负，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西南刚进军，长江还未打过去，这时候跟军队一起南下是有很大危险的，我参军完全是青年人的一股革命热情，促使我南下随军前进！你们年龄和我差不多，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参加革命，为革命早日成功贡献一份力量呢？现在全国解放了，是和平的环境，你们倒跑出来说漂亮话啦！你们那时候都干什么了？"他们叫我说得哑口无言，又转换话题："还是坦白交待你是怎么组织小集团的吧。"我回答："你们老说我组织小集团，拿出具体证据来吧。"他们说："你

组织一〇五乐团！”我说：“我只知道上海有一个上海交响乐团，没有听说过上海有一个一〇五乐团。怎么会来个一〇五呢？又是乐团？”他们回答：“一〇五就是你住的宿舍门牌号一〇五室，乐团就是你经常拉大提琴、手风琴！”我听了之后哭笑不得：“如果说我住的宿舍号就是小集团的名称，那么团长绝不是我而是团支部书记夏守鸿，大将就是尹建明宣传委员，军师就是团组织委员江波。还有两位团员，一个是现江苏省镇江市话剧团的编剧朱世跃，另一位是现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游本昌（济公扮演者）。怎么会轮到我们三个群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再说就我一个人喜欢玩乐器，也不能称为乐团，这不是胡扯吗？”大家无话可说，项目组长李尚奎宣布：“你下去写出全面检查交待，现在坦白还不晚，坦白从宽的大门为你开着，散会！”

后来很久没有开会，保镖四人变二人，大概是看我这个人不会寻短见吧！我猜想，他们大约是出去外调了，像江波等人已经不露面了。这一段时间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毛泽东搞反“胡风运动”，那就要在全国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及文艺界团体内揪出大大小小的“胡风集团”。单位里没有也得想办法搞出几个小集团，以表示下面响应老毛的号召，表示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做，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无数人为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看得很清楚，李尚奎表现得特别积极，无非是想在毕业之前入团，好分配一个比较好的地区和剧院。共产党利用这些青年人的心理和欲望，促使他们对一些无辜受害者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我觉得奇怪，同班的同学平时互相都挺客气的，无怨无仇，无缘无故，怎么一下子就变脸，说翻就翻了，难道这就是人的本质？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半年多过去了，仍然是隔离审查，但批斗会停止了。1956年夏天，学校里忽然开进来两辆吉普车。教室门口就对着学校的大草坪，那有一棵很大的树，同学姬寒正靠在树上看书呢！两辆吉普车停下，下来几个警察，把姬寒上铐，推上吉普车开着就走。我很奇怪，没有开过他的批斗会，怎么一下就逮捕了呢？他犯了什么罪？后来听班里同学议论，才知道是男女关系的事。他和一楼四川路小学教师江某发生性关系。两个星期后班上贴布告，姬寒被判两年徒刑。其实他们两人在谈恋爱，发生关系并不奇怪，为什么判刑就不得而知了。

在逮捕姬寒之后，他们对我发动新的攻势，当天晚上他们就开会启发我："我们对你还是抱有希望的，一时一刻也没放弃过你，否则我们通知公安局把你逮捕起来算了，何必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要明白这是党在拯救你，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我回答："我该检查的都检查了，你们不满意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拖下去，我也是人，我的精神压力这么大，日子很难过，都快一年了。"一年来我完全失去自由，只是未进公安局的牢房而已，实际上和坐牢没有什么分别。

1956年6月，以江波为首的外调人员回来了，第二天就开会，气势汹汹地叫我交待解放前的问题。江波说："我们出去几个月，一切都搞清楚了。你不是孤儿！在校你常说自己是孤儿，其实你家全在海外！你哥哥在美国，你母亲、姐姐、妹妹都在台湾，只有你一人留在大陆！你不是潜伏的特务是什么？今天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必须从实坦白，是怎样参加美蒋特务，怎样潜伏下来的，如何混入解放军，和到学校以后做了那些特务工作？你必须全部彻底老实交待，否则后果自负！"

我竟变成了空降特务

我交待了解放前的历史之后，他们说我不老实，重复说我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我强力分辩，我一个十七岁的高二学生，年轻轻就当特务了，有那么大的本事吗？解放前我们一批学生被捕，又不是我一个，一共有一百余人，你们可以去外调嘛，他们大多数在北京，如梁铁山“原北京市郊区建筑总公司总经理”、像中国登山队政委，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许竟（原名许承矿），《人民日报》第一版登着他的大照片，你们到体委去问嘛。在青训队时我和许竟是睡在一起的！参军后，1949 年七月，我是第一批被吸收入青年团的，在入团时我已交待清楚，全体文工团党团员一致通过我入团。50 年整风时我又交待了一遍，部队下了结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对革命的贡献。我自己也认为是荣耀，为共产党而坐国民党的牢是光荣的历史。可他们现在说是罪过，我拒绝承认有错。

我们 56 级同学马上就毕业了，正在进行公演，全院都已放暑假了。由于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解决，不能参加毕业演出。一天中午我感到气氛不对，同学们都来去匆匆。不一会，有三辆吉普车开进学校，直奔我们教室而来，前大门立刻被传达室的工友关闭。校党委副书记萧洒率领着三、四位便衣及几名着警服的警察走进来，教室里外的同学鸦雀无声，都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盯着我。这时我也楞住了，大概是来逮捕我的吧！我感到呼吸开始急促，心跳得厉害，好像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极度的恐惧感，令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设法克制自己，事到如今，

怕也没有用。镇静下来后，我坐在书桌面前一动不动，静观其变。他们进入教室，把穿警察制服的公安人员留在外边。便衣和院副书记萧洒对我打量一番后，萧洒书记说："别的同学一律出去，教室里只留文彻赫恩。"接着又说："这几位是上海公安局的，来和你核对一件事情。"一个便衣走过来，看样子是一个小头头。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可能放大过的照片，是四寸的黑白照。他说："这张照片上是你吗？"我瞟了一眼，肯定地回答："这照片上的人不是我。"便衣说："你再仔细看看。"这回我为了尊敬对方，仔细地看了一下。照片上的人长得确实有点像我，他穿的皮夹克和我解放前在中山中学穿的皮夹克一模一样。我回答："他不是我，只是有点像我而已。"便衣说："你敢肯定？"我说："当然敢肯定。"便衣说："这是一个空降特务，现在还未捉拿归案。"我回答："这与我无关。"他们几个人嘀咕了一下，又和萧洒副书记说了什么，上了吉普车，就扬长而去了。

车子开出校门之后，大家才恢复正常状态，有些同学又回到教室里来了。我也慢慢地回过神来了，深深地换了一口长气，心中甚感不平，我这算过的什么日子啊？一会儿说我是潜伏特务，一会又是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现在又变成空降特务了！他们的想象力倒挺丰富的，已超过了一般正常的演员和导演的水平了，否则就是荒诞派的戏剧表演，别的无法解释。这次的突然袭击，对我的精神刺激很大，好几天都没有缓过劲来。

我班同学都已经分配完了，陆续走向工作岗位，就剩下我们几个被批斗的人，等待学校的发落。秋季开学前，我班政治辅导

员找蔡振声、王文杰二人谈话，未参加毕业考试就分配工作，全改行了。蔡振声分到图书馆，王文杰分到演出科。他们最后才找我谈话，张庭顺说："组织上认为你在专业上有一定的前途，所以让你继续学习深造，暂时决定不分配你工作。开学后你跟 57 级学习，多读一年书，也有好处嘛！补一个毕业演出成绩，这是党对你的培养，你看有什么意见。"我讲："我没有意见，一切听组织安排。"

一年多的批斗审查生活总算告一段落，但结论还未下，而且株连许多人，像赵铭彝、陈古虞、杨荫簿、朱端君、薛沐、张应湘诸位教授、著名导演胡伟民（上海青话首席导演）、上海青话演员冯纯超、许守钦，以及现中国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游本昌等等，受牵连者近四十多人，是上海文艺界最大的反动集团，也是上海文艺界最大的冤假错案！

毕业演出成功了！

1956 年秋季开学后，我就跟 57 级毕业班上课，别人四年毕业，我则念了五年。其实多读一年书没有什么不好，可多学一些知识。因为被批斗审查，没有参加 56 级的毕业演出，这次要补毕业公演的成绩，剧目是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由薛沐老师导演，他是 56 级的班主任，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朱瑞君教授为艺术指导，他是上海著名的话剧四大导演之一，是我院的教务长。艺术顾问是陈鲤庭教授，他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兼电影导演。

在分配角色上，领导犹豫不决，因为我是被斗被审查的对象，还没有宣布结论和处理办法。为此，他们给了我一个最小的角色，只有六句台词，但其中有一段京戏唱腔，难度比较大。当宣布我饰演李陵碑时，我并无反感，愉快地接受了。这是我老早估计到的，他们绝不会给我主角演的。剧中主要角色都由个别人演出，而我这小角色反而是 AB 制。这一点我心里也有底，他们是准备两手，如果我出问题，另一个扮演者可以马上顶上来，不会耽误演出。

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小角色演好，争这口气。我到淮海路的旧货店翻了两天，终于在旧唱片堆里找到了由余叔岩先生灌的唱片“李陵碑”这段唱腔，由百代公司出品。我把它买下来，天天跟着唱机一字一句地学。我把这段唱腔的内在涵意和感情，全部融化在角色之中，我唱的韵味和角色的情感表现完全融二为一。每次练习时，不但自己流泪，同时催人泪下。在我们排练期间，上影厂的演员也来观摩。一次，电影皇帝金焰和著名演员张伐、中叔皇等都来看。座谈时，他们都对我发生兴趣，因为我的长相和身材都有点像中叔皇，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喊我小中叔皇。

到了 57 年春天，开学后形势有些变化。毛泽东的“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文登载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人民日报》上，其中第二段明文规定在哪儿斗错的，在哪儿平反。上课没几天，党委通知我们全班集合。57 级是个大班，人数比较多，有三组戏同时排练，平时难得聚会在一起。这次集合气氛不同，是圆桌开会，桌子上还有茶点，大家围成一圈。宣布开会时，由院党委副书记萧洒讲话：“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决定，在哪里斗错的，在哪里平反，恢复名誉。我现在代表院党委宣布，为文彻赫

恩同学平反并向他道歉，欢迎文彻赫恩同学回到人民队伍里来。”大家热烈鼓掌。这时，以陈祖烈为首的几个同学，把我抱起来抛得高高的，足有七八次，真是好开心啊，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大家连吃带唱的，直到开晚饭时才结束。因为太兴奋了。那天晚饭我没有吃也不觉得饿！这突然来的喜讯，顿时使我精神焕发，眉开眼笑。生活是美好的，从这一天起，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整天生气勃勃，富有朝气。我更加努力地读书了。

四月份，流行性感冒袭击我院，我也被传染上，在宿舍里休息。有一天，熊佛西院长来到我们宿舍，看到我的被子未叠起来。院长说：“文彻赫恩同学，振作起来，勇敢地生活下去，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用再想它了。”我说：“院长，我生病了。”院长说：“我知道，我这不是来看你来了吗？”并帮我把被子叠好。我理解熊院长的意思。

五月份，体育测验又开始了。游泳测验是在南京路上的体育俱乐部进行。我一年没有锻炼，更没有游泳，想来成绩肯定不好！可测验结果，我自己几乎不相信，就连体育老师郑硕律也没有预料到想到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一百公尺自由式成绩为一分六秒，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大家开玩笑地说：“这小子批斗一年多，身体还没有斗垮，好样的！”我说：“要是不被批斗呀，保证游到一分之内，那就是国家的运动健将了，对不？”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戏排得很紧，已经快合成了，准备在六月份上演。上影厂演员剧团也在排这个戏，也定在六月份上演，海报已印好了。他们的演员阵容相当强大，由著名演员张伐、白穆、赵抒音领衔演出，导演是瞿白音先生，等于是两台戏打对台。他们是在曙光剧

场演出，我们在长江剧院公演。这出戏我们共演出二十七场，每场上座率平均有 85%，相当不错。

1957 年 6 月 27 日第一天首演，我们获得空前的成功。因为第一天来的观众可不一般，多半都是文艺界的人，事关重要，大家特别卖力，各方面配合得天衣无缝，共谢幕七次。我得到两束鲜花，这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特别要感谢古人驹同学，他私人买了束鲜花，跑到台上献给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成功了，演出非常精彩，祝贺你！"

演出时，每次演到我独白和那段京戏唱腔时，台下的观众鸦雀无声，甚至能听到观众的唏嘘声。也许我是个演悲剧的材料，和悲剧有缘份。三年级时我演"龙须沟"的程疯子就是悲剧角色，演出之后也获得好评，也许我的人生道路就是个悲剧历程。

其实我是个开朗达观的人，十分外向，直筒子心肠，心里存不得货。我认为自己演悲剧不合适，可是每次分配到的都是悲剧角色，这也许是艺术的命运之神所决定的。那时每天晚上演出完毕，卸了装，换上衣服，走出后台时，总是有许多热情的观众，拿着本子让我签名，而且女孩子小姑娘最多。这时我才感觉到我选择的职业是幸福的，感到理想实现的满足，艺术的魅力给予我莫大的欣慰。

鸣放、反右和整风

1956 年中期，毛泽东又出新花样，在全国开展大鸣大放运动，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院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全体党员都动员起来了，要求大家帮助党，希望大家提意见，党

脸上也有灰尘，也要经常洗洗脸，希望大家爱护党，关心党。他们到处征求意见，并一再说明，绝不抓小辫子、打棍子，并提出“畅所欲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者足戒，言者无罪。”的方针政策，号召每个人都写大字报。后来竟规定每人必须写二十张大字报。我心里啄磨着：共产党觉悟了，改过了，讲民主自由了。他们过去一贯强奸民意，一言堂，独断独行，剥夺了群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个人权利。这回来争取群众意见，看来态度倒是非常虚心诚恳。许多同学都叫我提意见：“你受过那么多委屈，也该出出气了。提！有毛主席撑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见早就提过了，而且都写在检查里了，我没有新的意见。”其实我刚被批斗完没有多久，才平稳下来，哪还敢再提意见？还是少说话为妙。随便他们怎么动员，我就是一言不发。大字报的纸都摆在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写！

1957 级的同学已开始分配工作了，领导上没有找过我谈话，我心里难免嘀咕不安。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政治辅导员张庭顺，问他关于我的工作分配问题。他回答：“你留校工作，下个月就发工资。”到了第二个月，工资是发了，但工作仍未分配。我心想等着吧，有工资就行。几个月后大鸣大放停止，收兵了，人民还未喘过气来，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又开始了，明摆着是秋后算账。我庆幸自己这回非常冷静，未上当，没有发言，更没有写大字报。

不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学大楼四楼排练厅开反右动员大会，由院党委书记苏坤做反右报告。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鸣放时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的人。我心里想，当时你们去征求意见时，称赞这些人是好同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怎么今

天一翻脸就什么都不认账了？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给这些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说他们有意向党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没想到最后还是把我点出来了："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在肃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揪出来了，他还对我人身攻击，说我是小学程度，数理化一点不懂，还领导大学生呢，简直是误人子弟。这不是和储安平所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一样的反动言论吗？还讲什么凡是好事都是党员的，这不是和章乃器的'党天下'一个反动论调吗？这种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反革命份子，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大家都鼓掌，并且回头看着我。我坐在最后一排，已习惯了，无动于衷。两年多了，我过的就是这种无尊严的生活。他们践踏人的自尊心，侮辱别人，人格早已被他们撕得粉碎。我只有一个感觉，恐怖的日子又来啦！

从那天起我被指定搬到校后门延安西路汽车房旁边一间屋子里住。一个人倒清闲，每天除了锻炼身体，就是读书，学校图书馆就是我白天的家，晚上才回来睡觉。

1957 年 10 月份，从演出科传来了令我振奋的消息。上海电影厂来调人，点名要文彻赫恩，这是彭年和王文杰告诉我的。他们在演出科得到此消息，都为我高兴，这回文彻赫恩可得救了。可是学校方面讲文彻赫恩有问题还未处理呢。上影厂来调人时说："一切由我们电影厂里处理，希望你们放人。"后来我打听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江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著名的电影导演应云卫指名调我的，因为他看过我的戏。我听说他们谈判几次都未成功。院里强调我的问题严重，哥哥在美国，母亲、姊姊、妹

妹在台湾，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不但是极右派，而且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头，一定得叫他到坚苦的地方改造锻炼。上海电影制片厂最后没有办法，学院的领导保证下学期分配几个人到上影厂，至此调人之事结束，我白高兴一阵。

要我到艰苦的地方去改造，我不怕，心想顶多到东北黑龙江北大荒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呗，总比在学校里好，每次运动都把我拉出来批斗，精神上无情地受折磨，日子多么难熬，我逐渐有点受不了了。

1957 年反右运动结束后，接着就是整风运动大跃进，到了 58 年一、二月份，整风运动已达到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教学大楼红楼。这次又把我揪出来了，把我肃反交待过的问题，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我去看了一下，虽然有关我的大字报有几百张，但内容总也不过是诬蔑苏联和苏联红军，丑化党团员，组织一〇五反动小集团等 。

表演系党支部书记章琴调来不久，态度极坏，一看就知道是大老粗，苏北人。一天，他把我、蔡振声、王文杰叫去，叫我们打扫卫生，监督劳动。每人包一层楼，每天早晨五点开始打扫，八点之前一定得完成，包括厕所，并且还要给办公室送开水。我当时听了非常反感。这突然的变化，令我们不能接受。我理直气壮地责问章琴：“我们没有犯错误，凭什么罚我们劳动打扫卫生？况且 57 年 4 月，院党委副书记萧洒代表院党委向我宣布平反道歉恢复名誉的决定，你当时也在场，我相信你不会忘吧！”章琴半天答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说：“那是错误的决定。”我回应道：“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你可别忘了，那是当着 57 级毕业班全体同学宣布的，我想共产党不会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吧！

那是有文字材料，有根有据的！”这弄得章琴哑口无言，最后说：“反正从明天起你们要监督劳动，否则叫公安局法办。”我们无奈，忍着吧，反正没干几天就放寒假了。等到开学时，章琴又来找我们去劳动，我提出：”要正式书面材料，文字根据，空口无凭。我们受处分也要搞明白为什么，不能稀里糊涂地凭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拿文件来，拿处分决定书来，我们就劳动。”章琴忍耐不住拍桌发火：“我叫公安局把你们抓起来！”我也拍桌子：“你看着办，顶多劳改呗，老子就是不干！”我心里想，劳改还比在学校舒服点。到了劳改队倒有期，现在学校，动不动就把我弄出来斗斗，简直是无期的折磨了。我干脆把心一横了。共产党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甘愿去劳改！

我被逮捕入狱

平时我很少到电影院里看电影，因为学校经常放电影，而且是好片子、新片子和参考片。1958 年 3 月 11 日，我碰到谭松林大姐，她说她想看匈牙利片子《称心如意》，在平安电影院公映，我就陪她去看了。看完电影已十点多了，我回到宿舍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敲门。我把门打开，进来了两名警察，一个持手枪对着我说：“不许动。”一个宣布：“你被逮捕。”我问：“我犯什么罪？”答：“反革命罪。”我说：“我是反革命？老子革命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老子是解放军，帮过共产党打天下，现在……”没等我说完话，就被强行铐上手铐，连推带拉地被推上吉普车。

到了看守所，首先把衣服全脱光，进行全面检查，最后给一件衬衣和裤子穿，但没有皮带。然后宣布监规：一，不准说出自己的真名字。二，不准讲案情。三，不准相互交谈等等。并宣布从即日起只叫代号。“你代号为一〇二〇。”然后把我送到二楼二十二号牢房门前，脸朝墙站着，待牢门打开后才被推进去。我进入牢房后站着看了一会，这个牢房大概有十五平方米，右边放着一个很大的马桶，新来的人按规定一律睡在马桶边上。我数了一下，牢房里原有十五人，加上我为十六人，十分拥挤。坐在头一个位置的是最老号，后来他自己说已被关押六、七年，仍未结案判决。这小子看上去有四十来岁，贼头贼脑的模样，一眼看去就不是一个正派人。

进大牢第一天整夜未合眼，脑子乱轰轰地，也不知道想什么，就是睡不着。虽然躺在马桶边上，但没有感到臭味，不时地有人过来大小便，我像植物人一样毫无反应。

上午八点吃早饭，每人一盒稀饭跟两块大头菜。我刚逮捕入狱，思想很混乱，咽不下，拿着稀饭盒子说：“谁愿意吃就拿去吃，我一点也不饿。”坐在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不能随便给别人吃，监房的规矩是谁不吃饭，必须给坐在门口的第一个人吃，如果他不吃再往下传给第二个人，这样如此类推，明白吗？”“明白！”我就拿给坐在门口的那个贼头贼脑的人吃了。

吃过早饭之后大家坐在自己被褥上，靠着墙坐，倒挺像坐沙发似的。狱方规定不许叫警察和狱卒，而是叫“看守”。牢门上有一个五寸见方的洞，洞上有活动的盖。如果看守要看我们牢房内的情况，打开盖子就一目了然了。我从第一个人看到最后第十五个人，发现多是中年知识份子，小青年除了我还有二个。中午

是吃干饭，上面浇有白菜汤。当饭盒传到我这里时，我说："谁要吃谁拿去，我不饿。"这时坐在我对面的长者说话了："小伙子，饭不能不吃呀，你才进来，心神不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是正常现象，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等到你要吃的时候，这点饭大概还不够你吃的。" 我后来知道这个人叫莫朴，是"前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画家"。我回答："谢谢大哥教诲，还是给大家吧！我现在实在不饿，要是饿了我会吃的。"监狱规定每人一月定量为二十一斤粮食，肉类蛋类豆制品均没有，多半是白水煮萝卜、青菜汤。油水少，人们就吃那点米，时间长了当然就不够吃。

下午四点左右是每日倒马桶的时间，看守打开牢门之后，由我们轮流值日把马桶抬到门口。门外有劳动犯，会把它拿走洗干净后再拿回来放到门口，由我们拿回牢房。五点半吃晚饭也是稀饭。晚饭吃毕等半个小时左右，看守打开牢门上面那个小洞通知犯人"开始活动"。大家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开始在屋子里转圈子，先往左转几分钟，再往右转，整个活动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走路的声音节拍非常整齐，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真像在阅兵式时士兵经过检阅台前的步伐，喳、喳、喳，走路声音非常有节奏。这也是大家小声说话的最好时间。再有就是喝稀饭的时候，全楼都能听见胡噜胡噜的声音，有节奏又有高低长短，颇有音乐感。我不是作曲家，否则我一定要作一首曲叫"喝稀饭之歌"！

几天之后，我了解到坐在我右边的是画家储仁恺，左边的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学生陈天顺，"祖国大合唱"的作曲之一。这个看守所的位置在南市区车站路，是专门关押政治犯

的，全名是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据他们说，抓到这里来的人，没有出去的，最少也得判十年至十五年！我听他们讲完之后，情绪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低落，难道一辈子就这样完了？我拚命读书，刻苦学习，一方面是喜爱我的专业，一方面是为祖国服务，贡献自己才智。他们不喜欢正直的人，而喜欢拍马屁的人和奴才。学习好的人，他们就说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就要受批评，把你打下去。

狱中每周放一次风，时间是吃完中饭之后，地点在一楼外面的小院子里，以牢房为单位。原本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把它隔成许多小院子，大概有四十平方米吧。大院子的四个角有炮楼瞭望台，上有轻机枪，有解放军端着冲锋枪站岗，监视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许锻炼身体，不许东张西望。其实围墙很高，大家什么也看不见。

每天的用水是严格控制的，每人每天仅供应二号搪瓷杯一杯，相当于五百cc水，洗脸、刷牙、洗碗、洗衣服、擦地板，全靠这点水。我开始敬佩这些被关押的人们了。他们将水倒在洗脸盆里，把水集中使用，共有三脸盆水。洗脸只用半盆水，而且是轮流洗，今天你第一个洗脸，那明天你就是最后一个洗。不许用毛巾洗和把毛巾放在水里。大家洗完脸后，水不倒，原封不动叫它沉淀。刷牙的水每人只发茶杯水之中的四分之一，这个水刷完牙就倒入马桶里。吃饭的饭盒不用洗，它早已被人们用舌头舐得再干净不过了。这样，大家实际上只用了刷牙的半盆水，洗脸的半盆水在沉淀后，还可以用。然后就可以轮流洗衣服，每天洗两个人。洗衣服的水也不许倒掉，也要沉淀，沉淀后把清水倒出来，脏水倒入马桶，余下的一盆水就可以擦地板。剩下一盆干净

没有动过的水作为紧急用水处理。经历了这个用水过程，我非常激动和感概，这一茶杯的水做了这么多事，真是个空前绝后的大发明！人类的智能是无穷的，可惜啊，用在牢房里了！

1958 年 4 月 29 日晚开始，各楼层的牢门开开关关的声音非常频繁。大家都在议论，快到“五一劳动节”了，又该抓人了。共产党执政以来，一定在年节前进行大逮捕，但 1958 年不同，几乎天天抓人，抓人也来个大跃进，只是节假之日抓得更多一些而已。

大约在十一点左右，我们二十二号牢门打开了，推进来一位小伙子，没有穿衣服，光着膀子，只穿一条三角裤，手被反铐着。牢房的灯永远亮着，晚上也不熄的，大家都坐起来看着这位被反铐的小伙子。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非常愤怒，他的表情也显出万分的不服气和不情愿。四月底的天气，晚上还是挺凉的，半夜里我看到他冻得打哆嗦，我就把被子拿给他盖上，自己盖铺上的毯子。他看着我点头，表示非常感谢。我摆摆手说：“不用客气，都是落难人嘛！”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看守把房门的小洞打开，叫我过去，抓住我的头发就往铁门撞，头上立刻起几个大包，拉下来不少头发。看守说：“你同情反革命！”我说：“我也是反革命嘛！”这下又把他惹火了，抓住我的头发猛往铁门上撞，撞得我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我没有吭一声和求饶。我的火也上来了，我说：“我告诉你，共产党是不许打骂犯人的，更不能虐待犯人，是讲人道主义的。你和共产党唱反调，也是反革命份子。”这下气急败坏的看守把牢门打开，冲进来照我就是两拳，然后把我按倒在地上反铐，又踢几脚，让大家监督我

坐在牢房中间反省。牢房里的人围成一个圈坐，每个人都可以靠在墙上，如果坐在中间，四面不靠墙是很累的。虽然大家的眼光里都表示同情，但也没有人敢帮我擦掉血迹。大家都知道是坐在门边上的第一个人报告的。我心里想，这样的人不但大学里有，连牢房里也有，都坐牢了，到了最底层，还想往上爬，想踩着别人的头上，得到好处，得到宽大。在牢房里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真是太幼稚了，那可真叫做白日梦。可共产党就喜欢这些小人，这种人才会到哪里都有！

四月三十日晚上，牢门开关的次数更加频繁了，我们的牢房已有十八人，够挤了，不到两小时，牢房里已塞满了三十四个人！连坐都坐不下了，还怎么睡觉呢！后来大家研究，商量了一个办法：一半人先睡，另一半人坐着，等三、四个小时，再换一班人睡，就这样，算是初步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天才蒙蒙亮就听见敲锣打鼓、能打响的物体一律上阵。整个上海市轰天动地，响声和战争时的炮火声无区别，真是响彻云宵，如雷贯耳。我从牢房里的小铁窗户往外看，整个房顶上都占满了人，他们打着旗子摇晃，使得飞禽不能落地，一直飞着最后累死堕地。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发明的运动，全国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一同打麻雀，美其名为消灭四害。我看不只麻雀，连益鸟和一切会飞的动物全在劫难逃。整个中国大地不知有多少益鸟命归西天，这就是 58 年大跃进中著名的“打麻雀运动”。这个运动对全国的农业林业造成极大的危机，使得蝗虫、害虫到处泛滥，这也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无知，破坏生态平衡，使灾情更加严重，时间也最长，达三年之久。

有次，同牢房里的交大数学系讲师被看守叫出去，十分钟后回来时已是满面泪水，泣不成声。我们大家很关心他："出了什么事了？"他说："我是反革命份子，妻子提出要和我离婚，划清界线。两个孩子太小，女的三岁，男孩才一岁，我妻子也是教师，工资不高，她一个人抚养两个小孩很困难。"我当时庆幸自己年轻尚未成家，否则也是这个下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们牢房里新来了个小男孩才十九岁，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说自己是天主教徒，别的什么也没有。他非常乐观，从没有愁容浮现在他年轻的脸上。他告诉我们，每个牢房里都有他们的人——天主教徒。他英文、意大利文、法文都会一点，真是后生可畏，可惜入了牢房。三天后判决下来，他被判十五年徒刑，第二天就转到提蓝桥上海监狱里去了。

虽然牢房里剩下二十五人，但要躺着睡也是困难的。太挤，大家无法摆平。我们大家研究了一个办法，一头一脚交叉睡，翻身的时候大家一齐翻。每天晚上总有几次集体翻身，由一个人喊向左翻，大家就一块往左翻，喊右翻大家就往右翻身，就这样大家睡得满好。人啊！真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

五月份以后天气渐热，加上马桶之味，臭气之大可以想象，难以忍受。可时间长了，我和装满屎尿的马桶共吃共睡，竟毫无感觉，真乃"久而嗅其臭，而不知臭也"！

我们一个月洗一次澡。一天早晨通知准备洗澡，牢房里的老人都开始脱衣服，往自己身上擦肥皂，已开始干洗起来。我很奇怪，哪有这样洗澡的？半小时后牢门打开，大伙直奔一楼浴室。澡池有三公尺见方，有三个淋浴头。洗澡是以牢房为单位的，五分钟换一批人。我哪里知道这种洗澡方式，身上刚擦好肥皂还未

冲洗呢，时间已到，看守吹哨集合回牢房，我只好带着一身的肥皂回去了。后来用大家沉淀的水、拖地板的水分一点给我，算把肥皂勉强擦洗下去了。第一次洗澡完全失败了，等于没有洗。第二次洗澡我也有经验了，一通知洗澡我就脱衣服，往身上擦肥皂，干洗。等到了浴室往水池子一跳，冲冲洗洗上来正好五分钟，这就叫洗澡，完全像赶鸭子过河过过水而已。

在车站路第一看守所住了四个月，除洗过两次澡外，还理过一次发。理发的速度之快也很惊人，一律马桶盖式，仅两分钟不到。我主动提出要剃光头，那个理发员倒干脆，用推子三下五除二就推光了。我并不是喜欢光头，而是预防挨打时被看守抓头发。那次挨打，把我的头发拉下来不少。房里的日用品，肥皂、牙膏、手纸，都是自己家里亲人送的。每月接济一次，家属交给看守，由看守交给本人，大家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没有多久，我的日用品全用光了，我在上海无亲无友，无人接济我，全靠牢房里的难友帮助。画家储仁恺和音乐学院的陈天顺帮助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他们。储仁恺因为是国民党员判刑十五年。后来我们一同到青海，农场领导叫组织剧团时，我建议把他调到剧团，搞布景和舞台设计，生活在一起十来年，也算是对他的报答吧！陈天顺自从分开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1958年7月1日，是共产党生日。那天，吃过早饭，看守叫我："代号一〇二〇，穿好衣服出来。"五分钟后，我出牢房，必须蹲下，脸朝墙，等候别的牢房里的人一起出来，共计六人。到齐之后下楼，下楼后两个人铐一副铐子。一左一右，上了吉普车。警笛一鸣，街上所有车辆一律靠边站，马路的行人也停止了前进，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警车里的人。他们可能在想，一定是土

匪、强盗、杀人犯！我也往外看，心想你们别盯着看，我们都是无辜被害者，是好人！车子开得挺快，一会儿就到了外滩的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大家这才放下心，是开庭审判。我心想真巧啊，共产党生日这天我受审判，我是参加过共产党解放军的人，为他们打过江山，今天落到这个下场，是多么大的讽刺呀！说明共产党过河就拆桥，推完磨就杀驴！

下了车，我们六人的手铐被打开，坐在休息室等候审判。这时我和在车上一起来的六个人中的一个说话了。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丘石平，他的作品曾在国际上得过奖，是中型纪录片“淡水养鱼”。候审室和看守所一样写着“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八个大字，我看是骗人的，坦白并未从宽，而是从严。

十点钟左右，一名法警叫我的代号一〇二〇，带上手铐进入法庭。房间不大，中间坐着法官，左边是记录，右下方是检察院人员，是起诉人。法官宣布开庭后，检察院的人坐在原位置上说：“罪犯文彻赫恩，在上海戏剧学院期间，组织一〇五反革命乐团，要求法庭严办，以平民愤。”我内心好笑，共产党又搞栽赃，我有什么民愤？真是滑稽！

法官：“你组织一〇五反革命乐团了吗？”

答：“我没有，是他们捏造陷害于我。”

法官：“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吗？”

答：“当然知道，我没有组织什么乐团，我不能瞎说、乱编，欺骗政府。”

法官：“你还不承认，押下去等候处理。”

不到两分钟就把我打发了，回到了候审室。不到半个小时，全部六个人审判完毕。像来时一样，两人铐一副铐子上了吉普

车，回到车站路看守所。进了牢房，中饭已开过，但我那份给我留着了。我三口两口吃完了中饭，感到一点也不饱。刚进来时不想吃，现在又吃不饱了。我身高一米八，体重一六八斤，大块头，典型的东北大汉，饥饿也是很难熬的。大家都说到了提蓝桥就好了，那里的饭菜多一些。提蓝桥就是上海监狱，是远东最大的监狱，所以看守所里的人都希望早点判下来，好到提蓝桥去吃顿饱饭。读书时，我和著名电影演员杨在葆比赛吃包子，那次我一口气吃了十九个碗口大的包子，他吃了十八个，这说明我的饭量之大。事隔二十多年，我平反后回到学校，伙房的老刘还提起我和杨在葆比赛吃包子的事，做为笑话讲给大家听。

两个礼拜后，看守叫我打行李，我挺高兴，心想大概释放了吧。因为审判时，没有任何证据，说我组织一〇五反革命乐团，而且我也没有承认。既没有口供，也没有旁证，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根据什么判刑呢？十分钟后，牢门打开了，我向难友们招招手："各位保重，咱先走一步了，后会有期。"我拿着行李下了楼一看，心里冷了半截，不是释放，而是到提蓝桥去，幻想又破灭！共产党要判你的刑，没有任何问题也照判，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到了提蓝桥，我一看，这个监狱真不小，有八幢大楼，还有其它的附属大楼，车子经过两道铁门才到下车的地方。又是老一套，检查行李，登记入册，又给我一个代号，可惜我已忘得干干净净，怎么也想不起来。监规基本上和看守所一样。我编入第五幢大楼第四层，牢房很小，只能睡四到五人。没有门，是铁栏杆门。人员流动性很大，经常在晚上成批地送往西北和东北。一个楼层可关五百人，共五层，可关押二千五百人左右，从早到晚乱

哄哄的。监狱每天都发报纸看，自己也可以订晚报。一个星期可购买一次东西。监狱里小卖部用的吃的都有，什么日用品、信纸信封、邮票等等都有，这些东西都由劳动犯负责买卖。劳动犯一般都是年青力壮，案情简单轻微者，也就是判二至三年者，才决定留在监狱里服刑，五年以上的就要送边远地区了。

牢房是水泥地，虽然是七月天，但晚上睡在上面仍感到很凉。白天很热，大家都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小裤叉。几个月都未看过报纸，现在可以看，挺开心的。虽然是党报《解放日报》，但总能知道一些情况吧。我这时还心神不定，因判决书还未下来，不知道判多少年。

同号子里（号子也就是牢房的意思，因为牢房不好听，所以到提蓝桥，都改叫号子。）共有四人，一个中年人，看样子是个科级上下的干部，人长得很黑，脸上还有几颗小麻子，不是本地人。另一个是上海机械学校的学生，说贴了反共产党的标语，判刑七年。再有一个是刑事犯，未交谈。我初来这里，也不敢多问多谈，怕被打小报告，自己吃亏。所以大家都相互观察着。每个星期可发一次信，两个星期可接见一次家属。我在上海无亲人，几个要好的同学也不知去向，反正是凶多吉少。眼看日用品手纸等就要用完，怎么办呢？这儿不是车站路看守所，那儿牢房里关的人多，又都是政治犯、知识份子，有同病相怜之感，也有同情心，他们自愿帮助我解决这些生活的小问题。可到了提蓝桥，房里只有四个人，又不摸底，谁知道他们怎么想，我看他们那个样子，没有想帮助我的感觉。我忽然想起了谭松林大姐。我们是在文艺会堂认识的，几年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别看她比我大两岁，可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是广东中山县人，我们挺谈

得来。那天晚上和她看电影《称心如意》回来后即被捕，否则按讲好的，第二天会到她家帮助种花。

我写了封求救信给她。首先，我声明为什么第二天没有去她家帮助种花，告诉她我是被陷害，因政治问题入狱的。因为我上海无亲人，只认识她，希望她能看在过去友谊的份上帮我一把，望她能接济一下。信写得很简单，和主管要了邮票就发信。到了提蓝桥，大家不叫看守而叫“主管”了。一个星期后，主管叫我出去，说有人给你送东西来了。我准备到楼下去见人，主管说不用去了，人走了，东西在这里。我拿着两条固本肥皂、二支中华牌牙膏、二刀手纸、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心里非常感动，含着热泪，看着这些东西，我默默地祝福她幸福健康。我将永生不忘她的恩情，好几天我都在感激和不安之中度过。

八月四日，主管在我们号子门口叫我的代号：“你的判决书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我拿着这判决书仔细地看了几遍。判决书写道：“罪犯文彻赫恩，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解放后混入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戏剧学校后，组织反革命一〇五乐团，攻击苏联，诬蔑苏联红军，破坏国际统一战线，丑化我党、团员，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实属现行反革命份子，判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如不服从以上判决，可在十天之内上诉高级人民法院。1958 年 8 月 1 日。”

真绝了，共产党生日那天七月一日，我被审判。人民解放军生日这天八月一日我被判刑。我当时想上诉，但大家都说，现在这个时候，谁敢上诉呀？谁上诉都加刑。你判五年，一上诉最少加十年，例子太多了，现在是大跃进风头上，忍了吧！“我是冤枉的。”有人讲了：“冤枉的人太多了，不都判了吗？”我的情

绪一落千丈。五年，一千多天呀！怎么过呢！出来后又到哪儿去呢？干什么去，怎么办！前途在哪？真是渺茫。由于对未来失去信心，从此我每天坐在那一言不发，呆如木鸡，坐牢房！

发配青海改造

大概过了三天吧，号子里的那个像干部样子的中年人，打了小报告给主管，内容我不清楚，我看见他鬼鬼祟祟地写一张纸条给主管。我心里好笑，这种人怎么到哪里都有。已经都判了刑了，还想捞油水。但我不知小报告是汇报谁。中午我睡完午觉后，主管来叫我出去。到了楼梯口上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对面。主管说："你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以前参加过解放军？"我答："是的。"主管："你还很年轻嘛，才二十六岁，为什么想自杀？"我楞住了，停了一下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自杀，只是想不通。"主管："有人向我反映，为了对你负责，我才找你谈话。"我回答："主管，我绝不会自杀，我是被冤枉的，所以我才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要冤枉好人呢？"主管："那我们管不着，是法院判的，我们是关押单位。好吧，我看你的案情也简单，过去参加过解放战争。我原来是三野转业下来的，我看你就留在外面干活吧。早晨出来，晚上回去睡觉。生活够吃吗？"我回答："主管，我还差一点，不够吃。"主管："这样每天中午加你两个馒头，早晚稀饭随便喝。"我说："主管，您贵姓？"主管："我叫赵涛。"

就这样我倒因祸得福了，感谢那位打小报告的人，否则我还捞不到这样的好事和美差！

58 年大跃进，逮捕人也大跃进，监狱人满为患。赵主管给我的任务是编队，编花名册，赶快往外地送劳改犯。从此以后我的情绪也稳定了，饭也能吃饱了。我拿本子一个号子一个号子去对每个人的年龄、姓名、籍贯、案由，核对好了就开始编组。一般三个号子十五人为一个小组，三个小组为一个分队，三个分队为一个中队，一般为一百五十人，三个中队为一个大队，五百人左右。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二十四号止，我都是干这个工作。经我手编队去外省的劳改犯就有六个大队。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批去黑龙江、第二批到江苏大丰农场、第三批是到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农场、第四批是安徽白湖农场、第五批到新疆、第六批编好之后我也在内，到了最糟的地方。

主管曾和我谈过话，问我愿意留在监狱改造，还是愿意到外地去，我没拿定主意。大家都说到外地好，见见阳光，在大自然里生活，对身体也好。干农业活也不太累，总比长年蹲在监狱强。再说我无家累，留在上海干吗？我一个人，人走家搬，无牵无挂，到哪里都一样。哪儿黄土不埋人啊！走！

主管通知下来，告诉我通知家属的信要写清楚，说即将赴外地，希来接见，写完就发出。每次编队都是用复写纸写五份，随队走的干部带一份，其余的我不清楚了。我在上海无亲无故不用通知，否则一场生离死别的情景，也是很凄惨的。我看到接见那天，每一个人都是哭着回来的，悲痛的场景可以想象。我虽然没有看到告别的情况，但这楼面上五百人哭的哭、嚎的嚎、默默流泪的，这悲痛的气氛也传染给我了，弄得我一天都非常难过，我想这里不知有多少冤枉的人呢！毛泽东也做得太绝了，抓人还有

按比例抓的？必须百分之五，没有也得凑数，那还能不出偏差？小组长、大组长都是由赵主管指定的，我们是第五大队，三个中队的大组长是丘石平、吕文和我，但赵主管这次没有告诉我到哪里去，只说西北！

九月二十四日宣布编组名单，二十五日零晨出发。那天晚上晚饭特别好，是干饭，有红烧肉、炒西红柿鸡蛋，还有排骨汤，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告别上海的最后的晚餐。饭后大家开始准备行装，每个人都必须轻装，因为一切行装都是自己背着，多了也背不动。我很简单，一个毯子一床军被，都是 52 年部队发的。一个手提箱，内有两套毛蓝布衣服。

十一点半的时候，全楼面的人都按组坐在走廊上，等待出发。赵主管最后一次讲话，宣布纪律，路上不准讲话，不许掉队，如有逃跑和不听指挥者，当场击毙。十二点一到，主管哨子一吹，我们按次序排队下楼。这时提篮桥里，各条路上和路口，探照灯齐明，照得提篮桥像白昼一样。我领着第三中队一百五十人，按秩序上了公共汽车。我看共有七十至八十辆公共汽车。前面有军用大卡车开路，车上两挺机关枪架着，两边有摩托车护航，真是好不威风。车队直奔上海火车西站，一个中队一个货车皮，又曰“闷贯车”，整个车厢是封闭的，只有两个三十公分见方的铁栏干窗户，透气用的。每个车厢一盏马灯、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上车之后每人发一袋干粮，是压缩饼干，共五天干粮。大家这时全明白了，肯定去新疆了。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我看出来大家的情绪有波动。有些失落感。一个车皮睡一百五十人的确也够挤的，那也无法，只好忍着。随列车同行的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干部和家属，还有两车厢女劳教，全是年轻小姑娘，监狱对

她们特别优待，她们坐的是客车厢。列车很长，大概有二十多节，三个大队总共大概有二千余人。车门开始上锁，车内一切事由大组长负责。由犯人管理犯人也是共产党的一大发明。车厢里铺的是草垫子，要特别注意防火，一旦失火，只有烧死，无路可逃。每天早晨停车时，马桶被抬下去，倒入车站的厕所里，冲洗干净再拿回来，同时下车装食用水。

深夜二点，火车离开上海西站，徐徐而行，有的人爬在仅有的两个小窗口上大喊："上海再见了！"有的人则开始流泪，有的默默坐在那沉思，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已经睡着了。那种留恋难舍之情，他们内心既复杂又沉重，甚至悲伤。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妻子儿女和亲人，何时才能回来？鬼才知道！

火车缓缓西行，那戈壁滩，那大草原，大沙漠在等着我们去开发，人们面前的路将是坎坷不平坦的路。

我把车上的小组长召集在一起分配值班的任务，安排每天倒马桶，领开水，晚上值班等事。由于我们吃的是压缩饼干，两天之后大家嘴全起泡了。我告诉大家少吃干粮多喝水。三天后我也吃不消了，舌头口腔里全是泡。

当天傍晚火车停下来了，除倒马桶，添开水外，队长叫各个车厢里派两个人去领稀饭。真是谢天谢地，车内一下子沸腾起来了，笑的笑、乐的乐，高兴极了。每个人分一大瓢小米稀饭，足有一千 CC。我那天喝小米稀饭，觉得特别好喝，特别香。记得我参军时，天天吃小米稀饭，小米干饭，早已倒胃口了，可今天恨不得再吃一瓢，可惜不能随便喝。

火车停了将近三个小时，我送稀饭桶下车时，才看到这个火车站的牌上写着西安火车站。已经到了西安了，说明还有两天就

到新疆了。火车继续西行，马灯在车厢里有节奏地摆动着，我看着马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梦中，妈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还是穿著那件离开北京时的灰色旗袍，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向她奔去，抱住妈妈时我已泪流满面。她拉着我的手说："儿啊，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妈，儿子不是参加八路去了嘛！妈，您这些年过得好吗？""还行，就是日夜想念惦记你啊！""妈，儿这些年过得好苦啊！"我跪下抱住妈妈双腿不停地哭泣。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了，跟妈回家去，再也不分开了，走吧。"可不知怎么，我就是站不起来。眼看着妈走远了，渐渐地消失在云雾之中……。我大声喊叫："妈妈！妈妈！等等儿。"我忽然醒来。啊！原来是个梦！我的脸上仍然流着泪水！

车轮滚滚，仍不停向前，奔向祖国的大西北。

第五天的早晨，火车停了，只听大队长叫到："到目的地了，大家准备下车。"我想这是什么地方？新疆还没到啊？管它哪里，下了车就知道，反正一百多斤任他们折腾吧！下了火车，大家背着行李，走不多远，进入一个大广场。大队长命令原地坐下，大家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往四周一看，我的妈呀！真是黄土高原啊！到处一片黄土，房子是黄土盖的，墙是黄土打的，从车站走到广场的路上，黄尘卷起，一切都埋在黄烟之中。围观的老百姓都穿着破棉袄，这就是贫穷落后地区的人民，我顿时感到怅惘失落。四周的解放军架着机枪和手持冲锋枪对着我们。他们用好奇的眼神在分辨我们这些犯人，是杀人犯、土匪、反革命还是强奸犯，怎么看上去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呢？我小声说："甭看，我是好人！我当解放军排长的时候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呢！"

这儿的劳改犯全穿著黑棉袄棉裤，带着白色小帽。我明白了，这是回族地区。他们端来了大米稀饭，白面馒头，羊肉炖罗卜和炒白菜，大家非常满足地吃了一顿好饭。每个人都挺兴奋，东张西望。我问给我们送饭的劳动犯："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回答："民和县！"噢，这是青海和甘肃交界的一个县，属于青海省管辖。

吃过饭看见开来了上百辆大卡车，每辆车上均有两名解放军。队长叫我们每个分队上一辆车。五十来人挤在一辆车上够受的了，可还得把车厢的一半地方留给解放军，中间用铁链子和粗绳子拦起来，不许我们过界。五十来人半个车厢也太挤了，行李都放在脚下，大家尽一切力量挤上车，沙丁鱼似的，连气都喘不过来。最后还是全部都上车了，看来人的肉体还是有伸缩性的。车子开得很快，目的地是青海省会西宁市。当时火车只通到民和县，还未修到西宁，所以只有坐汽车了。一路上黄土飞扬，每一个人上半身都是一层黄土，下半身挤在车厢里反而干净。土多的原因是公路不是柏油路，而是黄土路。开到西宁郊区，才看到柏油路和一排排杨树。杨树长得都挺大，肯定是解放前种的，后来问本地人，他们说是原省长马步芳发起种的。到了西宁市，车子直接开到劳改局转运站。这儿的房子也是黄土盖的平房，一排排，倒是很整齐。每个房间可睡五十人，中间是走道，两边铺麦草。

当天是九月三十日下午，次日就是十一国庆节，劳动犯在门外大喊："不吃猪肉的登记，明天过节打牙祭。"我们早已忘了日子，坐的闷贯车把人都晃胡涂了，再加上三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因太挤站着的姿式都未改变。一个姿式站到西宁，可想而知

累不累，身上又都是西北特产黄土，也得洗洗再休息吧！刚洗完脸，大队长又宣布纪律了：不许乱串号子，不许和当地的劳改犯做买卖等等，最后宣布放假三天。

转运站其实是一个大监狱，从外地调来的犯人，到这里集中后再分配到青海省几百个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等单位去。围墙足有四公尺高，还有铁丝网，四面有炮楼和监视哨。这里能容纳五千人左右。和我们一块同行的女劳教已直接运到西宁被服厂和西宁塑料厂去了。

十月一日休息，可劳改局来要人了，凡有技术的犯人都可以登记。大家议论纷纷，没有技术也登记说有技术，这样就可以留在西宁市了，比到戈壁滩、沙漠、草原上要好多了。农场也挺苦的，百里不见人烟，荒凉得很。我也跑去登记，问戏剧学院毕业的算不算技术，那位干部一听乐了："当然是了，劳改局文工团正需要人呢！虽然劳改局文工团人材不少，但像你这样科班出身的还真不多，明天我就通知劳改局文工团来领人来。"我心中抱着一线希望和梦想，想着想着就入梦乡了。

第二天起来，洗洗脸括括胡须，人倒感到精神多了。我等着劳改局文工团来调人。文工团的人没有来，倒是大队长来了，说："你想去文工团？他们来人调你了，但我不同意。你跟我一块去查查香卡大炼钢铁去，回去做准备。我们这个大队大小组长一律去大炼钢铁，一个不能少，明天就出发。"真是一盘凉水泼在身上，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犯人嘛，专政对象，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回到大号子里，躺在麦草坑上，由于昨天晚上胡思乱想得太多，一夜也未睡稳，恶梦做了不少，这下倒好，死心了，我就呼呼大睡起来！

大炼钢铁

第四天早晨十月四日，我们大队集合，每人发一套黑棉袄和黑棉裤。虽然是十月初，青海可是很冷了，特别是早晚不穿棉衣是不行的。坐汽车的方法和以前一样，可大家穿上了棉衣就更挤了，因此把随身带的小件如提包、脸盆、网兜、书包等都挂在车外，这样不占地方。九点钟出发，一路上受的那个罪就不用提了。车子开得快，路不平土又大，把挂在车外的东西都颠掉了。每辆车上都有东西被颠掉，特别是书包里的纸张颠出来之后，就像仙女散花似的。一路上都是撒的东西，掉了就算倒霉，车又不停，继续快速前进。更糟的是大小便没有办法解决，有人干脆就往自己裤子里尿，刚发的新棉裤就这样当了临时厕所了。

八个小时后到了查查香卡，是个镇，但我什么也没有看着，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山，这里有铁矿和煤矿。到了目的地，已看到在山沟里搭好的一排排帐篷，大概有百十来个。远看挺美的，像一幅油画，有想象的空间和诗意，也像古代战场安营扎寨的兵营。下车之后，大队长宣布，我们这个大队叫“碎石大队”，就是把铁矿石砸成小块，送到炼钢大队去炼钢，这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跃进、大炼钢铁。帐篷四周插着四个三角小红旗，表示这是警界线，如果谁超过警界线，可当场击毙！而且四个角都挂上马灯。三角小红旗的标示也很醒目，可谓一目了然，如果不是故意想逃跑是不会越过警界线的。再说才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荒凉地区百里见不到一个人影，往哪里跑？除非是疯子、傻

子，正常人是不会逃跑的，就算你跑出去，不是冻死也是饿死，要不就是给狼吃了、熊吃了。

晚饭后，各小组讨论开工的生产计划和指标，商量如何完成任务。几个队长也在各个帐篷里听大家发言，帐篷里点的是蜡烛。最后队长发给每一个小组一份定额材料，这也是共产党发明的。吃饭分三等：甲等饭是超额完成任务的，乙等饭是正好完成任务的，丙等饭是完不成任务的。规定每个人砸一立方米铁矿石，这个定额不低。各个小组表态都挺好，一致表示响应毛主席的大跃进号召，完成任务立功赎罪。反正在中国任何时候，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都不犯错误，大家早已习惯这套公式了。会后大队长叫我到办公室去，说："从明天起你的任务是收方和检查质量，当统计，不用参加砸石的劳动，做好表格记录下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并把完成定量的数字通知伙房，告诉他们按标准供饭。"最后发一盏马灯给我："你拿着这个灯警卫不会管你的，可以自由出入。"回到小组，就听吹熄灯哨了，大概十点正。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整个帐篷里一层冰霜。这地方的气候很恶劣，早晚冷中午热，典型的大陆性高寒气候，幸亏人多大家挤在一起也未感到冷。大家还未穿好衣服就听大队长喊叫："大家起床后先集合，一个不能少。"全体犯人站好队等候训话。"昨晚二中队金××企图逃跑越过警界线，被警卫当场击毙，大家排好队参观现场。"当我走到现场仔细一看，心里已明白了。其时金××是在解小便，离警界线还有一公尺多，这就叫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该着这小子倒霉。共产党惯用这种手法，这叫现场教育会，目的是叫大家别想逃，这就是企图逃跑的下场。他们一贯草菅人命，拿人命当儿戏。

早饭后，队伍开到工地开始砸矿石了。一大队和二大队是炼钢大队，三班制日夜不停地开工。还有一个运输大队、开矿大队和我们碎石大队共五个大队。只有我们和开矿大队是白天干活晚上不干，但劳动时期很长，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第一天下来我去收方，结果只有一小半的人完成任务，大多数人完不成任务。我把每个人完成数量的情况交给了伙房组长。他根据我的报告，按标准发饭吃。我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大家辛辛苦苦，一天下来完不成任务，吃不饱饭，那不都恨我了？我成了罪人了，我又不敢做假帐，怎么办呢？

三天之后，我的工作已经熟练，这一百多人的情况我也熟习了。我们这个队知识份子多，都是“反革命”。我发现知识份子劳动很努力卖劲，但完成任务的不多，而有些刑事犯，年轻力壮超额完成很多。根据具体情况，我在验收时做了一点手脚，告诉他们超额完成任务很好，但质量差一些，要扣一点分数。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反正超额了嘛，而我把多余的分数，补那些知识份子、老弱者。这样下来大家都完成任务，都能吃饱饭了，皆大欢喜。

后来有的人知道我这样做都挺敬佩我，说我心眼好，说一些感谢的话。我直摆手：“少说，大家心照不宣。”我也和另外两个统计交流过经验，像吕文（《文汇报》资深记者，因为发表“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而被打成极右劳改的），另一位是上影厂的编剧丘石平（老八路，地下党，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入党介绍人。因怀疑他是叛徒，又同情右派而入狱，78 年都平反了。）他们也感到这样做没有问题，因总产量不变，内部调整一下有什么关系！

我曾到炼钢大队参观过，并征求意见，问我们碎石大队砸的矿石合格不合格？他们的回答使我惊奇。这个大队多是山东人，他们说："大矿石多炼一会，小矿石少炼一会，碎矿石扔掉，怎么都行。"我看他们炼出来的钢质量很差，他们说矿石含铁量少，煤的质量又差，哪能炼好钢，政府叫干，咱就干呗！好坏与我们无关。我心里想，这些土高炉都是犯人自搭的，在这小山沟里土法炼钢要行了，还要鞍山钢铁公司干嘛？上海的钢铁厂也可以取消了。我看出来这完全是瞎试验，反正这些劳改犯是无偿劳动，免费劳动力。虽然我感到大炼钢铁有问题，但整个矿区工地上都搞得热火朝天，天天都是喜报频传，晚上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红旗招展，一片大好形势。工地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横幅写着"大跃进万岁、三面红旗万岁、超英赶美，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等等，豪言壮语何其多！虽然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小山沟里，又是高寒地区，可劳改犯搞得挺红火、挺兴旺的。

已进入冬季了，天一天比一天冷，气温已降到零下廿度左右，经常飘着雪花，我们也得继续劳动，人们在向冰雪和寒冷挑战，为了完成超英赶美的历史神圣使命而努力奋斗。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喊口号。由于环境的恶劣，天寒地冻，许多人手脚都生冻疮。有的人因营养不良而得了夜盲症，病号一再增加，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一天中午，我在帐棚里做报表，来了两位穿军衣的队长。一位是管教科长刘孝来，一位是宣传干事莱之宣，说是要成立宣传队鼓动大家劳动情绪。刘科长说："你是科班出身，从下午开始，你和莱队长到各队了解人材，集中起来。现在人员不要多，十几个人就可以了。"我说："那我的统计工作呢？"刘科长说："今天晚上，你移交给史善祥好了。"

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就集中了十五个人。莱队长说一个星期后要在工地演出，表扬好人好事，鼓动生产情绪。我想大概就和随军南下时一样，编一些快板、顺口溜、三句半，鼓舞战士的行军热情，使军队前进步伐加快，快点追上逃跑的国民党军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今天是给劳改犯加油，叫他们加劲劳动多炼钢铁，赶英超美，完成伟大光荣的历史任务。我当时写了一首不像样的习作，大概的意思还能记住几句：

青海是个好地方，
满山遍野是牛羊，
草儿青青马儿肥又壮，
人们高声把山歌唱。
青海湖啊好风光，
风吹湖水翻白浪，
打鱼的人儿忙撒网，
船上黄鱼堆满仓。
柴达木是聚宝盆，
地下埋着丰富的宝藏，
青海是黄河的母亲，
青海是长江的奶娘。
我要歌颂您啊！
向您高声歌唱。
我的母亲，
祝您万寿无疆。

一周后我们到工地里演出了，有丘石平的快板，王九林的京戏清唱（他是上海淮剧团的团长），我的诗朗诵等小节目，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由于我们敲锣打鼓，打着各色彩旗，确实活跃了一下沉闷的气氛。砸矿石的声音由锣鼓、手风琴、唢呐的乐器声音取代，因此备受劳改犯的欢迎，也把工地的生产热情推向新的高潮，给与世隔绝的小小山沟里的人们增添一了点生命的活力。

香日德农场

1958 年底我们小小宣传队奉命调到都兰县香日德农场，这是青海省第二大劳改农场，关押劳改犯人四万名有余。青海省第一大劳改农场是德令哈。听队长讲农场条件不错，有大礼堂剧场、被服厂、副食品厂、商店一应俱全，和一个小城市一样。这次，我们十五个人坐一辆卡车，而且是带帆布棚子的，比以前两次五十人坐一辆卡车要舒服多了。

我们经过青海湖，在那里停车吃饭。青海湖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湖，而且是盐水湖。青海湖中有一个小岛叫湖心岛，岛上有庙宇也有僧人，在岛上居住没有船只，他们在冬天湖水封冻时出岛购买一年需用的各种物质，夏天不出岛。湖中左侧还有一个闻名全国的鸟岛，岛上有上千种各式各样的鸟，在岛的上空自由飞翔，真有百鸟争鸣之感。数以万计的五颜六色的鸟飞呀、唱呀，你追我赶自由地飞翔。如果带着摄影机把它拍下来，那将是绝妙的佳景。我们还不如小鸟呢，别说飞了，连走动都不能随意，我们是失去自由的人。

青海湖黄鱼太多了，在湖边上湖汊子上，都有黄鱼游动，顺手就可以抓上几条，一般都有四、五斤重。但当时的藏族同胞不叫抓更不准吃，说是神鱼。如果要吃神鱼，必有大祸临头。

车子继续前进，过了青海湖就上了“日月山”。这座山挺高，海拔三千公尺，是昆仑山支脉。根据历史考证，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就在此地扎营，在山顶上最后一次向故乡告别，日月山由此而闻名。现山顶上有大石碑上刻着“日月山”几个字。

下了日月山就进入柴达木盆地了，香日德农场是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南边。打开中国地图看一看，青海省凡是有地名的地方，都有劳改队或曰集中营。不论是西宁市和大小城镇，甚至村庄、工厂、矿山，都是劳改犯们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的财富。当时青海省只有三百万人口，而劳改犯就有两百万，号称劳改犯省。类似这样的劳改犯大省还有新疆、黑龙江、宁夏、甘肃、安徽等。中国的劳改犯按世界人口平均比例计算是世界冠军。文化大革命时期，据《人民日报》登载，前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中国在押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有六千万。”它超过了多少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可谓世界之最和劳改犯帝国！

傍晚，我们到了香日德镇，这儿有几户人家，是公路养护队住的，镇政府也在此。这里和甘肃一样，房子是黄土盖的，墙是黄土打的，房顶也是用黄土抹的。人们都说青海省有三怪：一怪山上不长草，二怪猪羊房上跑，三怪大姑娘不洗澡。说是个镇，还这样荒凉。这儿离香日德农场的总场还有三十华里。附近有一个分场叫老四站，我们的汽车经过门口未停，直往总场开去。二十分钟后，到了场部，这里很像一个小城镇，房子一排排的，很整齐。我们车子停在管教科门口，科里一下出来五、六个干部，

都穿著军棉衣。据说这里的干部一部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转业下来的，刘孝来科长让司机拉到一站一大队休息。

我们是离开了天寒地冻的查查香卡了，但是大炼钢铁的几千号人，仍在冰雪寒风中劳动呢，我心中总感不是滋味。

这是大跃进的一年，报纸上都报导各条战线的丰硕成果。在农业上最突出的要算是我们青海省了。赛什克劳改农场的小麦亩产高达 8586 斤，比丰收年高出几十倍。《人民日报》新闻版上头条大登特登，他们当然没有说这是劳改农场，而是把劳改二字取消，只说是青海省赛什克农场。我们香日德农场哪能落后哇，报到省里是洋芋“土豆”每亩产量达到一万斤！地点就在老四站。后来我们到老四站演出，问那里的劳改犯们，他们说那是晚上大家把十亩地土豆抬到一块地里，可不是万斤嘛！弄虚作假，浮夸风是共产党一贯表现，还口口声声叫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呢！而在事实面前教育我们的是：说假话，不作老实人！这样能把人改造好吗？真是越改造越会说假话，越会弄虚作假。

我们农场到处都插着牌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农田里都插着万斤田的牌子。共产党口口声声是唯物主义者，而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者，靠吹牛，说假话欺骗过日子。少数知识份子昧着良心为这股浮夸风吹牛风推波助澜，甚至胡说经过计算，亩产十万斤粮食是可能的。这些知识份子在历次运动中都大有人在，真是把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而有些知识份子不是没有看穿这些把戏，只是经过一年前的反右和整风运动，看到大批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剩下的人真是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说真话了！那个时代一般老百姓都以为上了报纸、广播，都肯定是真的。因

为是中共最权威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吹出来的，谁敢表示怀疑，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那罪可就大了。

查查香卡于 1959 年初撤了，因为炼出来的钢铁质量不过关，等于废铁一堆。三千多人等于白干了一年，劳民伤财。

一大队离总场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下了车，我才真正看到了劳改队监狱。四周都是用草泥堆起来的墙，非常坚固，大概有十公尺左右高，墙宽有三公尺，可走小车。墙上还有电网，四个角有炮楼，上有流动哨。门是铁和木制的，很大，可以出入大车和汽车。每个犯人进出必须经过大门口的哨所，进出都须检查。来带人的干部带出去多少人，晚上也必须原数带回。我们被安排在离大门很近的一个窑洞里，挺暖和的，比帐篷强多了，铺上铺着很厚的麦草，农场不缺草。头头吩咐我们和一大队吃一个伙房，次日早饭后，莱队长来带我们出去。

第二天早晨，莱队长把我们领出大院，参观了农场的中心，有剧场、招待所、小卖部、托儿所等。我挺高兴，将来能有机会在这里演出就太好了。剧场不大，有六百个位置，挤一挤可以容纳一千人。舞台大小还可以，灯光只是照明设备，缺少舞台灯光设备。刘科长来开会了，要成立文艺队。农场的被服厂有女劳教二百余人，可以去挑选一些人才。另外可到各分场各大队去调一些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筛选和调整，剧团成立了，有一百多人。剧团的人员，唱京戏的最多，越剧、黄梅调也都有人。乐队方面中乐较多，西洋乐器较少，演歌剧和话剧的人不多，但亦都是专业剧团科班出身的。

剧团成立后调来的队长叫郭萌（原公安部，公安大学教务处长），很有水平，听说是反右时打下来的右派份子。59 年的春

节即将来临，上面叫我们准备一台节目。经大家研究，决定演出京戏“铡美案”，越剧“十八相送”，黄梅戏“夫妻观灯”。我不会唱黄梅戏，有一位女演员是黄梅剧团来的，她看我有体操底子，会舞蹈又会翻筋斗，于是建议由我演。我没有演过黄梅戏，试试看吧。结果在春节演出时，受到场部干部和家属的好评。

剧团规定每个月必须演出一场晚会，给场里的干部、家属、职工们看，一般需要演出三至五场。田管期间和冬训期间必须下分场和各大队演出，演了一遍下来已将近一个月了。

为了迎接 1959 年 10 月 1 日国庆十周年的大庆，我们开会讨论演出剧目，选了歌剧“三月三”和话剧“槐树庄”，许多人倾向“槐树庄”，我持反对意见。“槐树庄”的剧情是地主的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儿子枪毙了父亲，这是大义灭亲。另一个是地主的佃户参加八路军，在离开地主庄园时，放火把地主的房子烧了。当时这个戏在全国演出时受到好评和赞扬，认为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

我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槐树庄”这个戏是丑化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戏。不管谁，杀人就是犯法，就是杀人犯，因为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就可以杀人不犯法啦？再说佃户放火烧地主的大院，就是放火犯，因为他参加了八路军，就不是纵火犯啦？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戏有问题，而且问题相当严重，是典型揭共产党老底和抹黑八路军的。

大家的观点和我有分歧，辩论会后来演变成批判会了，说我没有阶级观念。我则反驳：“法律是给全民订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当官的和老百姓，都在法律管辖之下活动，谁犯了法也不行。因为法律是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

家有这样的法律——共产党员杀人不犯法，八路军放火不犯法，包括我们中国和苏联老大哥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他们开了两天会也没把我批倒，后来决定排“三月三”。该剧在国庆节演出时获得空前成功。这个戏后来一直是我们剧团的保留剧目，共演出一百卅多场次，凡省长来了，厅长局长什么的，均以此剧目招待。

天天排戏演戏也是很辛苦的。我们到分场和各大队演出，近的坐马车，远的坐汽车和拖拉机，一般需三、四天，远的则需要一周。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三站去演出，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黑沙风暴”。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觉得很恐怖。那时，我们正在大渠上行走，忽然听到大风的声音，大家向西看，整个天已变成黑色，以飞快的速度向我们扑来。队长一看立刻下令赶快下渠，爬在渠底不许动，大家手拉手。不到三分钟，沙暴就到了。风沙声震耳欲聋，对面不见五指，白日顿时变成了黑夜。沙子打在身上，非常痛，但没有人敢动一下，如果有人站起来会被吹跑或者被吹到天空上去。大概二十分钟后，沙暴过去了，天空还是那样晴朗，麦田的庄稼仍然旺盛挺拔，绿油油的一片片。我们互相看了一看，每一个人都成了土人，大家都笑了，谁也认不出是谁，挺逗的。大家兴奋地大声喊“平安无事”啊！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又称“瓜菜代时期”，是人为还是天灾造成的，我的看法是，人为为主，天灾为副。毛泽东心血来潮，脑袋发热，要搞“人民公社”，这一下可好，全国农民不干活，都吃大锅饭去了。58 年搞一个“打麻雀运动”，麻雀死的不多，益

鸟几乎死光，使得农业上的蝗虫、害虫泛滥，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及其它农作物大量减产，灾荒即将降临大地。加上苏联老大哥跟中国翻脸，要钱还帐，真是雪上加霜。建国才十年的中国，底子非常薄，确实是一穷二白，怎么办？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饿着肚子还帐。我们没有钱，只有用农产品顶帐。东北大豆、土豆，山东的花生、水果，以及大米小麦、猪肉、牛肉、鸡蛋等等均被兑换成钱——卢布，还给我们老大哥！全国人民遭到空前的饥荒，不到三年，中国人民竟被饿死数千万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1959 年初冬开始，我们吃的粮食明显减少。劳改犯一般定量每月为三十五斤粮，这时已减为二十一斤。虽然文艺队比大队劳动轻，但也吃不饱。60 年开始，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感日益加重，只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体会到长期挨饿的煎熬，比听到判死刑更令人颤栗。长期漫无止境的饥饿折磨，造成人类心理的变异是非常可怕的，人的情绪异常脆弱，感情波动非常大，理性逐渐退化。学养品性变得面目全非，羞耻与尊严的底线被降到了不知何处！我想人类之所以伟大并有尊严，是因为他们的智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这智能的起点在于生存的基本条件得到大致的满足。费尔巴哈说“一个人肠胃里什么也没有时，他的头脑里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从猿到人花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时间，而从人倒退到猿就容易得多，只要使用饥饿手段，数年时间就够了。我是一个大汉，按当时的定量二十一斤粮食肯定不够吃。加上没有任何副食品，肉类很少吃到，靠这点粮食维持生命根本不行。整个劳改队都在饥荒中。后来，我们文艺队派出去几个人到沙漠里去挖“索阳”，

这种食物属于中草药，把它剁碎和到面里蒸馒头吃，它的甜味挺好的，但这种东西吃多了，大便就困难了，必须用手指伸入肛门把大便挖出来，有时肛门都会撑破流血。树皮、草根、野菜，早已被我们吃光。冬天里整个戈壁滩什么也没有，地上一片冰霜。高寒地区的冷可以浸入到骨头里去，身体没有一点热量是顶不住的。每个人先是消瘦，然后就是浮肿。人与兽不同，人是两条腿走路，站立的，而兽是四条腿走路，头是朝下的。为了寻找食物，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也是头朝下的，看地上有没有能吃的东西，盼望有人会把能吃的东西扔在地上，比如土豆，没有土豆，土豆皮也行，我们会冲上去抢着吃掉它。这时人与兽在心理上已无多大分别，已毫无人的尊严和自尊了。

本来农场的场部是人们活动的中心，挺红火挺热闹的，和小城镇中心差不多，如今已冷清下来，没有人逛商店，也没有人想看戏了，况且我们也演不动了。有时省里来人，什么副省长、厅长要看戏，场部特批我们每个人增加二斤土豆，吃饱了再演，可是一顿二顿解决不了问题。有时我把大家吃剩下的土豆皮，集中起来煮一煮，照吃不误，这就是饥饿！

一天，队长叫我们小组到职工医院菜窖去拉青菜，路边看到两条瘦猪在地上挖什么。我心想这地下面一定有吃的东西，这是动物的本能。我立刻想把猪撵走，可他它们不走，我和两条猪开始争食的搏斗。我顺手拾起一根向日葵的粗杆子，连打带喊的，猪最后终于撤退了。我在原地挖出来两个大萝卜，足有四、五斤，但我也累得倒在地上了。和我一块去的四个人，都大笑起来说："人家都是'虎口夺粮'，我们文彻今天表演的是'猪口夺食'！"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大伙经常还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

1959 年的初冬，大批藏民犯人押到我们香日德农场来，特别是“科日”分场就有几百藏族犯人，据说是反革命叛乱份子。他们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领着一批人逃跑了，这些是未跑掉的。听说每个农场都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同，没有酥油茶和奶酪吃就活不成，吃不来我们的饭，病号特别多，语言又不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的死亡率最高，几乎死了一半。

1960 年的夏天，我们接到任务，到分场“白浪沟”去演出。这个分场离我们场部有一百来里路，是 1958 年开垦的，有几万亩土地是盐碱地，适合种甜菜。上头告诉我们准备三台戏，演出三天。不是文艺队所有的人都去，有戏的人才能去，共三十人。场长刘富干亲自带队，一辆吉普，三部拖拉机带拖斗的，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从中午走到晚上六点左右才到，正赶上大队吃晚饭的时候。人们一听说场长带着文艺队来了，劳改们大叫起来：“场长来喽！场长来喽！”这一叫，上千的犯人一拥而上，把场长和干部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场长和干部们来不及躲避，只有站在中间看势态的发展了。二千余劳改犯几乎一个不拉，非常统一、整齐地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救命啊！场长救命啊！”声音之壮烈和凄惨，场面之感人，催人泪下。拖拉机上的人每个都流下了热泪，我强忍着眼泪未掉下来，但泪水已湿透了我的眼睛。饥饿使人拉下一切伪装和尊严，似乎人们都饿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刘场长最后说：“场里一定想办法解决吃的问题，我回去一定会和别的场长和干部研究一个解决的办法，但请大家放心。”最后刘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犯人们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排队去领饭了。

演出的三天，大家都吃饱了，我们也吃得很饱。说起吃饭这事，有时还挺玄乎的。喝一脸盆稀饭，随随便便，吃一筒土豆还感到不够，人到底有多大的肚子嘛！我心里啄磨着，长期吃不饱造成人们的心理变态，已成为疾病的一种了——“饥饿症”。人们的生活内容一切都围绕着吃，人们已经变成了只会吃的动物了！

三天之后，我们走了，听说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一顿一瓢菜稀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都在饥饿的生活中挣扎着。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 1962 年分场撤销，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 85%。因为土地是盐咸的，已开始翻浆，白开垦了几年，又是劳民伤财的买卖。

1960 年的冬天，我的身体渐渐地支持不住了，非常虚弱，体重只剩一百斤了。我感到走路很吃力，名副其实的骨瘦如柴，人已经脱型了。终于，我在一天下午解手时晕倒了。别人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看了看说：“饿的，打两针葡萄糖。”我的腿和脸已浮肿，是极端营养不良造成的。我每天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一般病人都是早晨休克的多。医院每天早晨检查病房，看见没有气的，摇晃一下不动的，用棉被一包放上马车，拉到西河滩去埋。自从建场以来，西河滩就是埋死人的地方。从 1960 年到 1962 年期间，每天都有二、三马车死人拉到西河滩去埋。其实那叫埋呀，就是拿沙土盖一盖拉倒了。听大家讲许多尸体都露在外面，不少已残缺不全，晚上不是叫狼吃了，就是叫别的动物饱餐一顿。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天上的星星有的还在闪亮，黑夜即将逝去，黎明就快降临大地。可是我感觉自己特别的虚弱，呼吸异

常微弱，觉得身体像已不属于自己似的。好疲倦啊！想说话已无能为力，眼睛也渐渐的闭上了。我好像浮萍一样在水面上飘荡，飘呀飘，我终于睡着了。我忽然感到自己从空中掉下来，摔得好痛。我醒来，身上裹着层棉被，躺在河床上，河里已经结冰，好冷啊！我明白了，他们一定是当我死了，放在大车上，三晃两晃把我给晃掉下来了。因为冰上很凉，把我冻醒了。我要不醒，那活埋就是我的命运！我定神一看，三辆马车堆满尸体，晃晃悠悠地还往前走呢！我大声喊叫："赶车的，我没有死啊！我还活着！"这一下可把赶大车的吓坏了，以为炸尸了呢！他们跑回来看了半天，赶车的人相互看了一下，意识到这个人还没有死，两个人又把我抬上马车，到了埋死人的地方，就把我放在一旁。我看见他们把死人推下来，随便铲两铁锹土埋一下就算了。后来又把我装上车拉回来，到了医院，他们告诉护士："这个人没有死，我们又把他拉回来了。"这里的护士都是劳改犯小青年。他们过来看了一下，说："这小子命真大，又活着回来了。"抬回病房，我这才拣了一条命！

和我情况相同的大有人在，林业队的黄长礼，广东汕头人，他也是被装上马车去埋的，在放下来准备埋时，黄长礼大叫："你们干什么？要活埋我嘛！我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你们就把我扔到马车上当死人拉来了啦！告诉你们，怎么样把我拉来的，还怎么样给我拉回去。"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死与活已无所谓了，区别只有一点：一口气和没有这一口气了。后来在医院里都把这些事当笑话讲，仔细想想，人还没有死就拉去埋了，是很残忍的事，真是拿人命不当回事啊！

第二次死亡

休养了两个月，又回到文艺队了。1962 年春天，农场已全部瘫痪，都不出工干活了。每天大家都缩在院子里晒太阳，听说也能增加热能。我啄磨着红军长征时，吃皮带喝马尿，人家红军都挺过来了，难道咱们就挺不过去了？咱们也吃吃试试看。我和弹三弦的萧子文两个跑到被服厂后头，拣了许多碎皮子，都是牛、羊、马、猪的皮子。我们洗了又洗，煮了又煮，怎么也吃不下去，后来我们加些盐和酱油，总算勉强的咽下去了，称吞下去比较确切，但没有十分钟又全吐出来了，好难受啊！红军长征时真的吃皮子吗？我心里在纳闷。

后来我们到熟皮子的车间，找没有熟过的才拉来不久的皮子，上面还有毛，有些带点点肉。我们拿回去一张羊皮，把羊毛烧掉，用刀子括干净，羊皮烧得直冒烟，羊油都烤出来了，还挺香的。这回吃下去，两天后我就病了，发高烧。我啄磨是不是羊皮上面有细菌有毒，感染了？我感觉病得很重，支持不住了。我找王德林队长说："我病得很重，要到医院看病。"王领着我到了医院，正好碰见我认识的医生，叫胡炳南，上海来的。胡医生看了一下："发烧，可能是感冒，先住下来吧！"分配在普通病房里。我的另一位朋友薛瑛，咱们是上海一块来的，听说我病了，特意跑到病房来看我。来到我的床前一看："怎么送来的饭都没有吃？"我说："身上难受，吃不下去呀。"薛医生说："瓜菜代时期不吃饭那还行！我检查一下。"他拿听诊器听了一下，说："不对，不是感冒！"拔腿就往外跑。没几分钟，薛、胡两位医生都来了。薛瑛说："老胡，您仔细听听，是感冒

吗？”胡医生用听诊器在我胸部听了一会道：“说得对，得立刻照X光！”薛医生讲：“老兄不敢马虎了，去年文彻赫恩休克了就当死人拉去埋了，弄得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写检查。”胡医生说：“那是护士太粗心大意嘛！”薛瑛说：“我们医生也有责任。好了，少废话，快叫护士抬他到X光室去。”照完X光，他们就把我抬到特护病房里去，又派了特别护理刘忠全照顾我。下午，他们给我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又打点滴，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烧就是不退。当天晚上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但是心里却很明白，脑子也很清楚。我对于死亡并不害怕，只是感到自己死得太冤了，而且也没有办法通知海外的妈妈、姐姐、哥哥和妹妹。想写几句话留言吧，这时人已经不会动了，一夜的高烧烧得我迷迷糊糊的。

第二天一早，副场长潘家兆来视察医院。来到我的病房，进门看到我之后问医生，这是文艺队的文彻赫恩吧，刘医生说：“是的。”刘建民是主任医生，也是上海来的。潘场长问：“什么病？”刘医生请场长到外面说话。这时我看到刘医生、薛医生、胡医生都在门外。虽然我已不会说话，不会动了，但他们讲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刘医生说：“是病毒性大叶性肺炎，两个肺全感染了。根据医学上的记载，这种病死亡率高达百份之85%！”潘场长：“现在情况怎么样？”薛医生说：“情况不妙，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可烧就是不退！”胡医生说：“如果再得不到有效控制，让病情继续发展下去，生命最多只能维持六个小时！”潘场长问：“就没有办法了？”刘医生说：“我们医院现在没有一百万单位的青霉素，如果有，还是有希望的。”潘场长把院长叫来，院长是志愿军某军医院的院长，转业之后到农

场，仍任院长。潘场长说："想尽一切办法抢救，通知全场、分场、各站、各大队医务室，有这种药的火速送场部总医院。"临走时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我们要用！"我寻思这次是准死无疑了。从中午开始，又增加了一名从干部病房调来的护校毕业的女护士照护我。打针吃药，输氧，非常忙碌！从下午开始每四小时打一次针。到了第二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刘忠全说："文彻赫恩啊！你小子说不定有救了。"我心里半信半疑的，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我感到身上舒服一些了，烧好像退了点。第四天早晨，胡医生来了说："你得救了，危险期已过。你这小子命真大，本来我估计你是准死不能活了，可全场接到潘场长的电话后，都积极想办法。真绝了！科日分场王伟医生，自己家存有两盒一百万单位的青霉素，共二十四瓶，立刻派吉普车送来，算救了你一条命啊！"我真是九死一生。俗话说，大难不死，定有后福，也许是吧。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也能说话了，但身体非常虚弱，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同病房的一个病友头一天晚上还和我打招呼，晚饭吃的小馒头还未吃，第二天早晨就硬了，可小馒头还赚在手里，人死了还舍不得吃。我们文艺队一同住院的有三人，一个叫庞复东的，球打得非常漂亮，是唱京戏老生的，能演话剧。正当年轻力壮，因营养不良脸脚都浮肿了。不知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了。他住院不到一个礼拜就拉到西河滩了。医生说："浮肿的人一拉肚子，准死不能活，无法抢救。"另一位乐队成员打锣的赵子富，也是饿得昏迷，大家以为他死了，送他到太平间。因为太平间太冷，他冻醒了就大叫特叫，才被护士发现人没有死，又从太平间里把他给抬回来了，否则也难逃活埋的命运。

我共住院半年时间，总算痊愈出院。但由于生病时，躺的时间太长，两腿肌肉萎缩，不能走路只能坐着，出院时是抬回来的，并且带着双拐，以后慢慢练习走路，才恢复了腿部肌肉功能而恢复健康。

这时文艺队已搬到工程队大院去住了，早晨去剧场，晚上回来睡觉，一共有五个窑洞。我的任务就是看家，以免东西被工程队的人偷走。因为工程队也是无警卫的大队。工程队也不出工，都在大院里晒太阳和乱窜。我一点不敢大意，坐在五个窑洞的中间。中午崔喜德给送饭来，工程队的人也看到我拄着双拐行动不便，他们每天看着我把饭菜摆在坑上，先吃白菜或者萝卜汤，最后才吃那两个菜馒，慢慢享受。有一天我正在喝菜汤，忽然来了一个人，伸手拿着我的菜馒就跑。我本能地站起来追，啪的一声跌倒在地，腿不听使唤，眼睁睁地看着他抢走我的中饭主食。我过去曾有过“猪口夺粮”的事，今天这个人是在我的面前表演“人口夺食”！那是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我定了一下神，看清楚这小子是工程队的大组长统计，还是知识份子。他看着我做出对不起的表情，表示自己太饿，请我原谅。我是腿不能走，否则非揍这小子不可。因为饥饿，人们已完全无自尊可言。这次食物被抢，使我下定决心加紧练习腿部的肌肉，争取早日甩掉双拐！三个月之后，我就恢复走路了。

此时文艺队又调到原铁工厂家属院了，那里有许多窑洞。王裕身队长会拉关系，从分场各大队搞来了马、骡、牛、猪等，文艺队又兴旺起来。我看到喂牛马的时候，他们总是把莞豆、蚕豆、大豆、生麦子跟草和在一起给畜牲吃。这时我起了歪念，在晚上去厕所小便时，就溜到马棚里去，在马槽里，把各种豆子筛

出来。一般我弄个二、三斤，他们也发现不了，而且可以长期供应。偷回来之后，我就蒙着被子躲在被窝里吃，又没有声音。我的牙口本来特别好，但由于长期吃生豆子、生麦子，使得我一口好牙都磨平了，而且不断地掉牙。我为此跑去问医生，他们说："不是因为现在营养不良而掉牙，而是因为前两年瓜菜代时期营养不良而造成现在掉牙的。"三十岁刚出头就开始掉牙了，多么可怕呀！当时农场里许多人都开始掉牙了，有的人甚至一口牙全掉光！

我的牙齿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共掉了十二颗。上面掉十颗，下面掉两颗，另外，在文化大革命遭批斗时，被打掉四颗，这样算来，我一共掉了十六颗牙！我看见报上登载的消息说，民运份子魏京生在劳改期间共掉十四颗牙，这是他受苦受难的证据之一。同样地，我在劳改期间所掉的十六颗牙也是铁一般的明证，而且我们是在同一地区——青海省改造。

若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肚子还可以理解，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还有人在饥饿边缘挣扎，就令人十分震撼了。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1984 年我去西宁办事，火车快到甘肃边境了，车上的人开始议论，说甘肃的生活非常苦，全村集体要饭的不在少数。我有点不信，已经打倒四人帮八年了，国家已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了，怎么还有人讨饭？火车到天水停车时，一群群的大姑娘、小媳妇，老老少少都拥在车窗下面要东西吃。我一看，大姑娘的确没有衣服穿，只披着一张麻袋片，全身抹上炭灰，流着眼泪叫大叔大叔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她们中有些连裤子都没得穿。我感到无限心酸，都这么多年了，怎么农村和边远地区还这么苦？我把所带的食物全部都给了这些妇女。她们为了

争夺，竟大打出手，在地上翻滚，有些人甚至头破血流，看得人倒抽一口冷气。

赶排《洪湖赤卫队》

1962 年下半年，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农场除组织打猎队之外，又成立了打鱼队。打猎队主要是打青海特产动物黄羊、羚羊、石羊等。打鱼队则是扎根青海湖畔，天天打鱼。这时，青海湖的鱼多得不得了，不但我们吃，连藏族同胞也不信神鱼，开始吃青海黄鱼了。鱼的营养非常丰富，改善了劳改犯的伙食，增加了食物中的蛋白质。青海湖的黄鱼可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特别是我们劳改犯的命！

农场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原来四万人的大场现在只有几千人。香日德农场是基础很好的农场，而且有发展前途。特别是在果树方面，受到全省的关注。这里种了许多苹果树和梨树，都已开始结果。我想现在这农场，水果一定不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外销了。我们文艺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取消后，队员全部合并到林业队去了，我在林业队又整整干了十年。

农场荒废了几年，要想恢复也不容易。首先必须从外省调劳改犯来，从 62 年下半年开始到 65 年，先后从山东、广东、浙江、上海、四川等地调来大批劳改犯。而这些劳改犯，多是刑事犯，年轻力壮的多，农场又开始红火起来了。

我们文艺队也准备排戏了。当时全国正在演出歌剧《洪湖赤卫队》，受到全国普遍的欢迎。青海省歌舞团、劳改局文工团都

在排练。我们文艺队也弄来了剧本，大家看过之后，一致认为按目前文艺队的力量，不管是人才方面、物质基础方面以及乐队的配备上均没有能力排这个戏。看完剧本之后，我也没挂在心上，剧本就放在一边了。

可我们农场的领导和干部非常喜欢这个戏，他们也想排，但他们的力量就更不够了。几个月后的一天，王队长叫我去队部谈话，问我文艺队和干部合起来，有没有能力排《洪湖赤卫队》这个戏？我思考一下，很慎重地说："排当然可以排，那得集中全场全队的文艺人才，乐队是弱一些，可以在乐队前面多放两个麦克风。灯光方面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土制聚光灯，但得到上海去购买彩色灯光纸。这些都得花钱！"王说："经济上你不必担心，场部会拨款的。"我问："有哪些干部要参加？"王说："有白涛，是总政歌舞团转业下来的；刘汇文，江西省歌舞团的；邝冰如，志愿军歌舞团的（她是著名电影演员韩兰根的儿媳妇）。待我向场里汇报后再通知你。"一个星期后，王队长告诉我："场里决定排这个戏，全力支持，但一定得排好，想办法尽一切努力超过省歌舞团及劳改局文工团的演出水平！"我苦笑了一下："尽力而为吧。"王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第一，排这部大型歌剧需三个月时间，一个月的案头工作，两个月排练时间。第二，戏排到进入合成阶段，有时必须排通宵，队里必须给演员夜班饭吃。现在是低标准时期，人吃不饱饭什么也做不好。第三，我本人希望队里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王队长："好！就这样办了。关于你生活上的问题，我看早晨稀饭随便喝，中午加二个馒头，晚上加两斤土豆，可以了吧！"我说："谢谢队长照顾。"

从队部出来，我找了黄国治、丘石平两个人研究了一下。黄国治是武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丘石平会拉大胡。我建议他赶快把我手上的大提琴接过去加紧练习。黄国治拉手风琴，陈一鸣什么乐器都会，吹黑管，张德洪吹小号（张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前四川省委书记段君毅的内弟），加上小提琴、二胡、三弦等等，可以凑合了。乐队由黄国治负责，丘石平负责教唱练唱。

一天中午，包其力来告诉我，赵树楠（赵和梅兰芳同台演出过，是梅兰芳的朋友。）在队部汇报，说伙房丢的洋芋是我偷的。我听了之后非常恼火，现在队部在生活上照顾我，我吃饱了还偷干嘛？过去我经常偷吃偷喝，否则也活不下来，早饿死了。瓜菜代时期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现在我没有偷吃却说我偷吃，我找他算账去。在宿舍门口我站住，看到他在背台词，我喊："赵树楠，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进伙房偷洋芋吃了？"赵说："我看见你进去过，伙房洋芋丢了不是你是谁？"我说："你看见我偷？"赵说："看是没看见…"说时迟那时快，我上去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骑在他身上一顿乱拳打得他直喊"救命！"看见他鼻子眼睛往外喷血我才停止。我站起来后，只见他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医院跑，打得着实不轻。

当晚我被带上手铐关入禁闭室。赵树楠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出院时眼睛仍然用纱布盖着，脸上还有鼻青脸肿的痕迹。我平时看他就讨厌，一天到晚打别人的小报告，身为劳改犯了，还拍领导的马屁，这回叫我抓住，猛揍一顿痛快极了，出出气，受处罚我认了。十天后我也放出来了，后来记一大过算完事。

几年的劳改生活让我看明白了，温文儒雅不行，知识份子那一套吃不开。我大病后不能走路，就被人抢走馒头。如果我强硬

厉害谁敢动我？要适应生活面对现实。劳改队什么人都有，土匪、流氓、杀人犯。文质彬彬就要受气吃亏，必须能文能武，学会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反正我是一个人，无牵挂，腿肚上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人活着一口气，决不能像窝囊废那样活着。劳改队也是弱肉强食，和社会一样，只不过劳改队更复杂更加残酷罢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的案头工作完成了，导演计划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是对剧本的分析，确定主题和主题思想，找出最高任务和贯串动作，确定高潮戏处理方法、分配节落和段落以及演员的舞台调度。在音乐方面，对音乐的处理要求以及配器和声及音响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计划。对角色的分析也都提出要求和意见。在布景设计、灯光设计、化装造型和服装道具方面也都有一整套蓝本。几本计划全部交给王队长，队长看了很高兴："做得很详细嘛，我看能排好。告诉你，戏排好了，我减你的刑，提前释放！"我想算了吧，我反正还有半年多就刑满了，无所谓了，何况共产党说话从来不算话。

这次排戏非常严格，要求很高。我曾听到有人议论："这小子年轻，才毕业，能排好这么大的戏吗？而且又是歌剧！"我为了争一口气，几个月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脑子里全是戏。为了稳拿胜算排好这部戏，我付出了个人全部的艺术经验和智能。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戏成形了。在合成和彩排时，劳改局副局长、香日德垦区区长高什克来了，场里的大小头头全部到齐。从戏大幕拉起到戏结束大幕落下，观众的情绪一直跟着戏走，演出结束后获得了空前热烈的掌声，我们也首次尝到谢幕的滋味。

局长和场长都上台来看我们。局长问："这个戏谁排的？""是我！"局长把我叫过去说："噢，小青年嘛？犯什么错误？""反革命右派。"局长说："你年轻嘛！有前途，有什么要求吗？"我低下头想了想。"有什么要求说出来我们能办的一定办。"我说："剧团的条件太差，灯光设备及音响设备太落后，乐队人员和乐器还不齐，希望局长解决！"我的要求出乎队长的预料之外，他可能以为我一定会提出减刑的要求。局长点点头对大家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超过了省歌舞团和劳改局文工团的演出水平。现在，我决定由局里拨三万元给你们团里增加设备。"大家热烈地鼓掌。局长又说："你们先别太高兴，以后还得拿出更好的戏来给大家看！"大家兴奋地回答："没有问题！"那天，队长特别高兴，通知伙房当晚夜班饭做纯面的，随便喝。管理员也开心地说："每个小组还增加一桶洋芋。"

那天晚上，我算是真正的睡着了，几个月来第一次睡得这么香甜。

戏是成功了，前前后后共演出了三十多场，但我心里还是没有底，因为没有看过外面剧团的演出，不知道真正专业剧团是怎么演的。几年后，1965 年电影《洪湖赤卫队》公演了，电影队来农场放映。我心里有些紧张，七上八下的，这回可是真正比苗头了，全场的人要检验我的艺术水平了。看电影之前我非常的低调，到处讲"肯定比人家差远了！"可电影放过之后，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轻松极了。我的布景、服装、化装设计，可以说跟电影一模一样。对剧本的处理手法，和电影导演手法非常相似，甚至在舞台调度上也一样，连韩英的台词和动作处理都接近一样！一夜间我竟成了香日德农场的大红人啦！场里的干部说：

“这小子真行！”我心里想，在劳改队演出成功了，如果在社会上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可惜我只是在劳改队里。总而言之，我的辛勤劳动得到回报，我已深感欣慰了！

万人批斗大会

青海省劳改农场冬天只干半天活，因属高寒地区，太冷，冰天雪地无法劳动。一般秋收完毕已十月底了，十一月中旬开始冬训学习，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一日起，才整天地劳动，准备春耕春播。我们文艺队劳动就是排戏。冬训时上午学习，下午排戏。冬训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犯们认罪守法，洗脑，改变原来的观点立场。每年都深挖犯罪根源，学习文件反复对照检查自己。已经四年了，有经验了，老一套无新意。我个人认为几年下来，不但没有改造好，反而更加明白了许多问题。我从来没有认过罪，因为我没有罪，罪名是学校里硬加在我头上的。每年为避免找麻烦，我尽量地避开认罪问题，检讨自己个性强，态度不好，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等等。到二月底冬训即将结束时，写一份年终总结，把自己臭骂一顿，算完成了冬训任务。

1962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说工农业大丰收。在学习时，我发言表示反对《人民日报》社论的说法：“工业我不知道，农业方面呢，根据我们场和其它农场的情况，不但没有丰收，而且是欠收。结论很简单，大家都吃不饱，还丰收什么！《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说假话，愚弄人民，我思想搞不通。”我们香日德镇的老乡，经常有人到农场、场部要求加入劳改队，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和供应情况，还不如劳改队。农场虽然吃不

饱，但还有得吃，而老百姓有时一点吃的都没有。特别是农场，这几年饿死了多少人，怎么还说农业大丰收呢？我的发言震撼了小组全体劳改犯，但没有人提出异议。学习完，我刚躺下准备睡觉，队长来了，叫我到队部里去。我明白了，打小报告的人真快，连夜都未过，就报上去了。调来不久的王裕身队长是山东人，说我在会上放毒，一定要消毒。

隔了两个星期，冬训进入高潮，说要开全场大会，他们特别在二站搭了台。二站地处全场中心，各大队站容易集中。那天特别冷，我不但穿上了棉衣棉裤，连劳改的黑棉大衣黑棉帽也带上了，全副武装一身黑。全队经过半小时的急行军到开大会的广场，也就是一大片麦田地。会场布置相当严肃，台上正中是毛泽东像，横幅上写“批判斗争大会”六个大字。两边对联是：上联“高举三面红旗”，下联“工农业大丰收”。会场周围竖着许多牌子，上有标语口号。

会议由管教科刘科长主持，他喊：“宣布开会，把现行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薛瑛（就是救我命的医生）押上台来。”然后宣布罪行：“罪犯文彻赫恩、薛瑛，一贯不认罪，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言论，反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攻击《人民日报》社论。下面开始由大家揭发他们的罪行。”薛瑛的观点可能和我相似，才和我一起遭批斗。

我在台上一看，整个广场最少有一万多人，四周解放军架起机关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气氛紧张得叫人窒息。靠近点的大牌子上写的是“打倒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再下一个牌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场几个分场都到齐了，一、二、三、四站、工程大队、水利大队、被服厂、铁工厂等等都来了。

分场来的是代表，因为路太远了。这个斗争大会，可以说是农场建场以来最大的一次。

顿时万人齐呼“打倒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薛瑛。”声势之大，口号之响亮真是震天动地。喊了一阵口号之后，下面有人大叫：“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低头！”薛瑛已老早把头低下了，我仍然不低。下面连喊几声：“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低头！”我就是不低！主持会场的刘科长说：“文彻赫恩，你为什么不低头？”我把帽子往地下一甩，反而把头扬得高高地。刘科长命：“你低下头来！”我说：“我就是不低头，低头表示认错，我没有错当然不低头了。”刘科长道：“你不低头，后果自己负责。”我说：“头可断，不可低！”台上的干部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刘科长说：“你不想得到宽大处理？”我答：“你们早就计划安排好，看着办吧！”上海人讲话，我当时是“横竖横”了。刘科长说：“现在大家揭发文彻赫恩的罪行。”文艺队发言的有张广信、徐秀峰、王庭杰，特别是王庭杰，还领着喊口号，他是唱黑头花脸的，嗓门特别大。揭发的言论不外乎不认罪、吃不饱发牢骚等老一套。

大会开了二、三个小时，我在台上昂首挺胸坚持到底。最后主持人刘科长说：“今天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反动气焰相当嚣张。他是全场最反动、最顽固、最不认罪的反革命份子。奉劝一些坚持反动思想的人，认清形势，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死路一条。各单位回去后进行对照检查。文艺队、医院回去后继续对文彻赫恩、薛瑛进行批斗！散会。”

我走下台后，站在右面的出口处，等待外单位走后，和文艺队一同回去。文艺队最后走，收拾会场。左边还有一个出口，很

多人都在我面前走过。他们多数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用亲切同情的眼神和我交流。有的人干脆走在我面前伸出大拇指说“有种”、“好小伙子”。特别是医院里的护士刘忠全，走到我面前停下来说：“英雄啊，小子！”并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苦笑了，叹了一口气，我也是无可奈何啊！这种“英雄”太可悲了。

晚上继续批斗，王队长说：“文彻赫恩态度极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告诉你们这些臭老九、拿笔杆子的，今后就不叫你们拿笔杆子，非叫你们拿锄把子不行。你有天大的本事就是不用你，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我心里想，批了半天都是老一套！一般队长晚上都回家了，王裕身队长也不例外。最后有人揭发我“崇洋媚外、好大求洋”。我不服气说：“你们这样批判我不客观，不能以理服人。排大戏不是我要排的，是政府场部队长叫排的！不是我的主意。我学的一些艺术手段、排练方法是苏联老大哥一套，这不能叫好大求洋，这是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其次你说我崇洋媚外，我不同意。共产党是高举马列主义闹革命的，马列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品。马克思是中国人吗？不是，他是德国人。列宁是中国人吗？也不是，他是俄国人！难道你们说共产党是崇洋媚外吗？不行吧！毛主席说了，这叫洋为中用！对不？”弄得大家无言可辩。从此以后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文铁嘴”。“这小子太能说了。”我说：“不对，不是我能说，是我学了马列主义。这是辩证法，横说竖说都有理！这叫‘常有理’！”

事情再巧不过了，第二天早饭后，我们都到工具房拿铁铣准备去干活，修理地球去了。王队长说：“先到饭厅等候。”不一

会队长叫我到队部去。肯定昨晚上的发言又惹麻烦了，准备挨熊吧！结果出乎预料，队长说："副省长和劳改局长来了，听说我们的'洪湖赤卫队'演得好，超过省里，所以一定要看。明天晚上就得演，你看怎么办？"我说："那得排一遍才行。灯、服、道、效、化还得准备，乐队得练一遍。今天一天加上明天上午，可以！"队长："可得演好！""那当然。"我心想，昨天刚讲过天大的本事不用，可今天就得用我了。这些人经常自己打自己嘴巴，既无知，又无能，又可笑！

王队长宣布明天演出任务，命令大家不要认为开了文彻赫恩的批斗会，就不服从他了，他仍然是导演，都得听他的，否则严肃处理！队伍拉到剧场开始排戏。对昨天批斗我的，喊口号的人，我对他们起了报复心，对王庭杰的表演一遍一遍的不通过，把他们折腾了一上午，累得满头大汗，大家都明白我在报复人。最后王庭杰也火了："你在报复人！"我说："随便你怎么说，你不服可以报告队长去！"其实队长精得很，戏开排他就走，看也不看。他知道你们这些人会表演狗咬狗的把戏！中国人窝里斗、狗咬狗是常事。那天晚上我演出特别卖力，劳改局局长张贵德还特意跑上台来看我们。这场戏可把我救了，批判会也不开，检查都没有写，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

共产党的劳改政策不管你判多少年徒刑，到了期一律留场就业，继续干你的农业活，修理地球，拿你的锄把子，实质上就是无期徒刑。所以一旦判刑，就一生劳改。外面的人以为坐满刑期就释放，恢复自由了。而事实上，我不但不能离开农场，也没有自由。刑满就业人员，反而比劳改犯更苦。劳改犯一般劳动八至十小时，当然春播和秋收例外。而新生就业人员（刑满释放的也

叫新生就业人员，也叫农业生产队员），每天早晨天一亮就出工，直到天黑才回来，披星戴月地干活呀！就这样往往都完不成定额，星期天再加班，等于天天没休息，比劳改犯苦得多了。这种劳改终身制是不成文的政策，可全国各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等单位都是这样执行的，和共产党的作官终身制一样，真是其妙无比！

我新生留场就业了

根据 1958 年的宣判，我刑期至 1963 年 3 月 11 日即刑满。所谓新生就业，就是仍然留在农场。

1965 年夏天，海西州开物质交流大会，请我们场文艺队去演出，叫我最少准备五台节目，并和海西歌舞团联欢和交流经验。我们的演出也轰动了海西州都兰县。我们一共在海西州呆了八天，生活挺好。当地都兰县法院的副院长经常跑到我们的住地招待所神聊、侃大山。他是陕西人，挺喜欢文艺的，和我们混熟了，在闲谈中谈到省公安厅厅长、劳改局长张贵德的事。我问他："听说张局长把西宁市塑料厂、被服厂漂亮的女劳改、女劳教全给搞了，说有一百多呢！其中大多数为小姑娘，可有此事？听说有一位上海小姐长得特别漂亮，细皮嫩肉的，张厅长竟然把她带出监狱，到杭州旅行去了，是真的吗？"这位院长答复："事情是有，具体搞了多少小姑娘，这些问题我不能告诉你们，这是党内机密！"张贵德是青海省公安厅厅长、劳改局长，是青海省劳改系统最大的官，他这种表现，这种形象还来改造我们，不是很滑稽的事吗？俗语说"正己才能正人"，而张贵德手下的

四大金刚之一，我们农场的场长又是香日德垦区的区长，听说也对女劳改女劳教下手。他们都是有妻室的，难道不犯法吗？副院长说："张贵德判了十五年徒刑，高什克判了十年。"我说："这样的罪行我看判得太轻了！不知道你们判刑根据什么标准来量刑？"副院长回答："这你们就不懂了。我告诉你，我就代表法，法就是我，我就是法。怎么判，判多少年，都由我来决定。举一个例子说吧：一个老红军干部搞别的女人被人家告了，我可以这样判：某某是老干部，经过长征抗日，受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仍然犯下如此严重错误，对党的荣誉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不重判不能平民愤，为此判处无期徒刑或者二十年，一点没有问题！"我们大家听了，点点头，都觉有理。副院长又继续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判：某某是红军，长征老干部，对党对革命有着卓越的贡献，认罪态度好，有悔改表现，我可以判他免于刑事处分，以观后效，就没事了吧！"大家听了后哈哈大笑。

我忽然茅塞顿开，明白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法。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深。我反复地想，共产党判刑也有很多奥妙，判决是由人来掌握决定，而不是由法律标准来权衡刑期。一句话，中国是人治，非法治也！

演出回来就秋收了。那年的庄稼特别好，一般每亩麦子产量都在八百至一千斤左右。麦子长得又密又高又粗，但给割麦的人增加了许多困难。定额每天割麦一亩，可一个队里没有几个人能完成。一般能完成五、六分地就不错了。这一年又从浙江调来一批犯人，都比较年轻，但多是刑事罪犯。郭萌队长又调回来了，管理我们的文艺队。秋收以前，照例开全场秋收动员大会。场长

非常兴奋地动员全场一切人员说："今年农场大丰收，全场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一个也不能少，都得参加秋收割麦子，文艺队也不例外。"全场男女老少齐上阵，锣鼓喧天好热闹。连中学、小学都一律停课参加秋收！从 59 年到 64 年，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收成，怎么能叫人不高兴呢？我第一次体会到丰收的喜悦。

那天，我们文艺队分在一大队帮助割麦子，一大队猪号的人中午挑来一担开水给大家喝。这个猪号的人说下午不来送开水了。我这个人一辈子快言快语，爱管闲事，问送水的人："为什么下午不送水了，天这么热，不送水喝怎么行！"猪号的人也挺倔地说："那我管不着，你们找队长去！"转身就走。这下把我惹火了："你给我站住！""干什么？""你下午非送水不行！"猪号送水的人理都不理继续往回走。"站住！""干什么，想打架？"我一看这个年轻人比我高，足有一米九，身体魁梧，是个彪形大汉。后来听大队干部讲，他是工人出身，在船上扛大包的，因抢劫犯案。我一看这架式，今天这个架是非打不可了。"你想打架？你没看见这儿可都是我们文艺队的人！""文艺队又怎么啦！"拿着扁担就冲过来了，我是逼上梁山了，否则就栽了。一瞬间我想到，他拿的扁担比我的镰刀长，打起来肯定他占上风，如果我冲到面前他的扁担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我一个箭步冲在他面前，他轮起扁担正好落在我的腰部，没有力量也不痛。我抬起脚往他下身狠狠地踢一脚，当即他就捂着肚子蹲下了。我拿起扁担朝他的左腿就是一下，听得卡喳一声，只见他立刻打起滚来，大叫："打死人了！打死人啦！"我定神一看，左腿已经翻过来，肯定断了。这时大家都围上来，我知道又闯祸了，到部队自首去了。

担水的人马上被大家抬到医院去，经医生检查，他的腿已打断，打上石膏，治疗了三个月才出院。我又进了禁闭室，整整关了一个月，放出来时走路都晃晃悠悠地走不稳。秋收已完毕，大丰收年我未出上力。因为这件事，我在全场打架又出了名。一个月后，队长又宣布记一大过算完事了。

1966 年夏天八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艺队取消了，全体人员合并到林业队。现在的林业队没有劳改服刑的人，全是新生留场就业的。农业生产队员，或曰就业职工，怎么叫都行，反正是专政对象。林业队原来就有女的，与文艺队合并后，现在有三十多名女的。一天，大家收工后，来了一批红卫兵，把长辫子长头发的女生产队员全给剪了，变成小分头。而我们呢，全给推掉成了平头光头，这叫扫四旧。我啄磨了半天，不明白剪头发与扫四旧有什么关系？

我在上海监狱认识的，在查查香卡分开后今天又碰头了。他们都在林业队，像史善诗、吕文等。林业队的知识份子当然没有文艺队多，但从全场来比较，林业队的知识份子也是最多的一个队。我们“牛鬼蛇神”被赶下舞台了，不准演戏，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以前没有劳动过，所以样样劳动都不如人家。秋收割麦定额一亩，我只能割二分。打土坯（砖），定额一千，我只能打二百。就是我自愿加班加点，也完不成任务，为此我经常受批判。星期天的生活检讨会，我也是重点检查对象，生活过得很不愉快，心情非常压抑。我暗下决心，要活下去就得过劳动关，否则在劳改队的日子不会好过。

新来的管教员叫荣树端，河北人，部队转业的。在 1967 年冬训时要整一个女劳教期满的人。她原是文艺队唱越剧的，人长

得很漂亮，爱清洁，手脚很勤快，人缘也不错。她和职工医院的护士谈恋爱，说男方晚上曾到过她宿舍。她名叫王丽丽，为了这件事，荣树端管教员找她说话，她怕被批斗，晚上吃安眠药自杀。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她未来学习就去叫她，发现她已昏迷不醒，桌子上放着安眠药瓶子。我们立刻报告荣管教员，荣说："不理她，死不了！"中午去看时王丽丽仍在昏迷，但脸色已发青。我们又去报告荣管教员，他讲："没有事，她是吓唬人的。"我们说："还是送医院吧！"荣说："不用送，不会死！"等到下午我们去看时王丽丽已经开始吐白沫了！我们又报告荣管教员："已经吐白沫了，该送医院看看。"荣这时才同意送医院。我们找了几个棒小子抬着她十分钟就到医院。医生看了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现在送来太晚了，药都吸收，洗胃也无用了。要是早来两小时还能救活！"这位共产党员公安干部，拿人命当儿戏，活活地把人命给耽误了。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队第一个自杀的人。

事后这位荣树端调走了，换了一个单位，到一大队仍然当管教员。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手法，共产党员犯了错，党内处理，当官的犯了错误换一个单位照旧当官，党外人士犯错，则去劳改了。这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世袭制及终身制的体现，否则也不会吸引那么多人入党，因为入党的好处太多了！

后来又换一位管教员，叫李立悟，陕西人，在部队里当班长，是转业下来的共产党员。他来之后添了新招，每天早晨和部队一样跑步做早操。我很反感，我们已经是体力劳动者，每天十来小时的劳动已经够呛了，还折腾我们。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

是专政对象，牛鬼蛇神呢？所以在农场里，刑满释放人员和劳改犯没有什么区别。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是从中学生发起的，迅速蔓延到大学生和全国。从北京开始的打、砸、抢、抄也很快在全国普遍展开，搞得全国工农业瘫痪，红色恐怖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武斗频传，人们相互残杀，真乃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苦难时代。我看到社会上这种情况，非常庆幸自己早进了劳改队，要不然还说不定会怎样呢！

到了 1967 年形势吃紧，外面的打、砸、抢风，已深入劳改队。我心想三年自然灾害才过去几年啊！那几年死的冤魂不计其数，而幸存下来的我们刚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混个温饱，好容易喘了一口气，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正不能叫你过太平日子，早晚把你折腾死了完事。

宿舍里新规定，墙上都必须挂毛主席的肖像，到处有买的。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一律对着毛主席的像唱东方红，然后三鞠躬。早请示，报告一天工作计划。吃早饭前必须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才可以吃饭。一天三顿饭得三次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劳动时下午四点有十五分钟休息，大家还得跳忠字舞。晚上收工回来还要向毛主席像鞠躬汇报一天的工作，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共产党真会发明这些邪门歪道。那个年月人活得都很艰难，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批斗，毒打一顿，大家都夹着尾巴过日子。

我的思想跟当时有强烈的抵触，认为这是搞个人崇拜，和苏联一样搞斯大林崇拜。过去的皇帝也不过每天上一次早朝，大家叩拜。现在好，一天折腾六次，这比历代封建皇朝更封建，都已

经超过封建社会了。把那张印着毛泽东像的印刷品当神坛供着，共产党把人民愚弄到什么程度了，这样奴役人民！每天晚上学习时，都得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有节奏地左右摆动，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可中国人竟然默默地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人民已成为不会说话的工具了。

1967年8月，管教员李立悟宣布支持去水磨劳动的名单，因为水磨任务在十月份完不成，就不能再磨面粉了。十月底就封冻了。这一年，场里来了许多新劳改犯，所以要多磨面。任务时间是三个月，按理说一般都是单身去，有家属的一般不出差。因为工资低，带家携口地分开，生活上会造成许多困难和不便。我此时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孩子，但是这次去的人名单上却有我。在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心里不满意，在会上还要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坚决按时完成任务。口是心非，说一通假话大话。

水磨离家有一百来里路，三个月不回家，完成任务才回。我们到水磨后立刻劳动。我的任务是在面粉机口上装面，装满一袋再换一袋，一天要站十个小时，每两个礼拜休息一次。共产党真会发明名词，叫“大礼拜”。我们大伙都很努力地干活，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三个月后总算完成了任务，大家高高兴兴地坐着拖拉机回林业队。准备回家时，李管教说明天照常上班，我提出，在水磨干活这些日子，衣服被褥都很脏，是否叫大家休息一天，洗洗补补。李管教说：“不行！现在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

第二天，我们在大田里挖蔬菜，下午休息时，猪号老周挑一担开水来叫大家喝。老周是山东人，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我们坐在垄坎上聊天，他问我：“出去几个月家里还好吧！”我说：

“家里挺好的。”他说：“没有出什么事吧？”我道：“没出事呀。”他说：“没出事那就好。”咱们俩谈过话之后，我心里就嘀咕。在猪号里干活的人非常自由，白天背着筐到处去打猪草，晚上也不学习。他们要去商店和小卖部都必须经过家属院，难道他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

我老婆是北方人，父亲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抗日战争时期奉命在山东打游击立过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某海港城市当市委书记兼港务局局长，可惜是国民党的，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了。女儿自感出身不好，不是工人和农民出身，于是响应政府号召到边疆去锻炼改造自己，支持大西北的建设，分在西宁市某公司当文艺宣传干部。领导给她介绍对象，是个老干部，年龄太大又没有文化，是个大老粗，她不同意，就遭到打击报复。领导说她出身不好，不服从分配，判处劳教一年。62 年调文艺队。我们因经常在一块排戏，有了感情，于 1963 年 10 月 1 日结婚。

64 年 8 月，我们生了一男孩。因孩子一直生病，于 66 年春天送青岛姥姥处寄养。由于孩子小时候经常生病，吃许多的四环素药片，导致他的牙齿非常不好，直到现在。

林业队的任务就是种树，每年都要植树造林。一般都是杨树和一些果树，苹果和梨树等。从宁夏银川移植过来的枸杞，不但经济价值高，而且是中草药不可缺少的品种。到八月份收成时，每个人一天都可以摘二、三十斤。冬天来了，女的翻菜窖，男的深挖地，贯彻农业学大寨精神。这是重活，每人每天定额挖十五立方。陈永贵是大寨大队的共产党书记。他出身好，是要饭出身。他是大老粗，发明的深挖地、密植法，我们也照搬过来。可经过两年实验，证明完全失败。土地表层是熟土，一般有二十公

分，加上勤耕轮种多施肥，肯定是丰收好地。可深翻地一公尺，把熟地翻下去了，上面是生地，再加肥料也不行，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密植也同样失败，由于种得太密，不透阳光和风，只往高长，不结果。秋收时，就是收一捆麦草。可明知道不对谁敢说呀！这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发明！

我是全场最反动的人，可老找我当学习组长。每组有两个组长，一个是劳动组长，我只管学习思想、读文件、读报纸，目的是叫大家彻底认罪，接受改造。这种洗脑手段，长期灌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灵魂，使得大多数人麻木不仁，习惯成自然。“假话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就是这个道理。上面说战犯都改造好了，像溥仪还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都改造好了，何况你们这些小喽啰！其实并没有改变任何人，只是这些人认命麻木了。

管教员强奸我老婆

68 年元旦前夕，我老婆病了，加上例假又来了，在家休息。中午收工，我回到家，家里没有人，也没得饭吃。奇怪，人到哪里去了？我在院子转了一圈没见人影，就跟邻居打听。沈克昌的老婆吞吞吐吐地说：“到场部去了，可能出事了。”我追问：“出什么事？”“不大清楚。”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吃饭，拿着两个馒头又出工了。下午在工地上我看到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说什么，等我一过去就都沉默了，我心里更加嘀咕了。晚上收工回家，老婆仍然没有回来。我急了，跑到队部找到新来的队长叶永祥。“报告队长，我老婆一天不在家，现在都晚上十点

了还未回来！不知道…？”“你老婆回不来，必须把问题交待清楚才能回来。”“我老婆出什么事了？”“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知道就不用到部队问你们啦！”“她和李立悟出事了，李立悟到你们家里去，叫范队长（范绍祥队长是广东来的生产队长）给抓住了。就是这事，现在到场部交待问题去了！”我楞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一点迹象也没有呀！这可是公安单位，专政机关！我离开队部，不知道怎样走回家的，一晚上似睡未睡。第二天照常出工，中午休息时，我到猪号去找老周头。“老周，咱们平时相处不错，又是半个老乡，我们刚从水磨回来那会儿，你和我在地里垄坎上谈过话，还记得吗？”“怎么不记得，现在出事了吧？全队都知道了，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到水磨干活那会儿，我看到李管教员经常往你家跑，有时晚上也去！你想，我们职工都注意到不对劲，那队长们还看不出来吗？恐怕早已盯上他了，这不叫范队长抓住了吗？”我说：“谢谢老乡啊！”临走时他说了句话：“他妈的，太欺负人啦！”

我一下午都在想这句话“太欺负人啦！”我是专政对象，否则他敢？老子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这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什么管教队长，连自己都没有改造好，管教好，凭什么改造管教我们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做的却是男盗女娼。我现在完全明白李立悟在八月份把我调到水磨去干活的真正原因和目的了，把我支开才有机会对我老婆下手。卑鄙、下流、无耻的共产党员！

一星期后，我老婆回来了，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老实讲，否则我要你的命！”她说：“你到水磨干活的第二个星期，九月初，他来我们家。”“他来干什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表示党和政府的关心呗。”我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存好心眼！”她继续讲：“隔不了几天，晚上他又来敲门。我说天晚了不方便。他说有事情，把门打开！我哪敢不打开门啊！他进来后，我给他倒了杯开水，他站起来把门扣上，熄了灯就把我按在床上。我说李队长，这可不行，我要叫啦！他说，我不怕，是你叫我来的。我说李队长你怎么血口喷人啊！我也不敢叫了，我想他是共产党员，又是公安干部，专门管教我们的，有权有势，事情闹出去谁会听反革命家属的，还不是听共产党干部的！他就动手扒我衣服拉我裤子。我拚命地和他扭打在一起，和他挣扎着，最后我一点气力也没有……。我哭了一夜，向谁说理去，向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后来他又来过三次。这不你们回来，他就不敢来了。那天我生病加上月经也来了，你上工去了，八点钟过一点他就来了。我说不行，月经来了。可他哪听啊！我说大家都在上班时间，经过门口叫人家看见……他已开始脱衣服拉我上坑。正在这时范队长敲门，我马上跑去把门打开。范队长进门看了一下说：“衣服都脱了哇，到场部说去！”拿着李立悟的衣服和鞋子就往场部走，叫我也跟着去。就这样我交待了一个星期，说清楚了才叫我回来。”

我咬牙切齿地说：“简直不是人啊！月经来了都不放过，连畜牲禽兽都不如！”她跪在我面前哭着，我上去就是一记耳光：“你真窝囊，你怎么不去死呀！”我躺在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到队部去找李立悟，岳嵩队长在那儿。他是生产队长，河南人，中专林业专科毕业的。他的水平极差，写的字还不如初小生，好的也不会分到这农场来，早叫省里市里留下

了！“报告岳队长，我找李立悟！”岳道：“我不知道，有事你找新来的管教员叶永祥。”听说他是原上海国民党时期旧警察留用人员，表现一贯过左，目的是说明自己立场稳觉悟高，想得到共产党的信任。我到管教室，叶管教说：“你来干什么？”我答：“找李立悟！”他回答：“李立悟调走了。”我说：“什么？做了坏事，强奸我老婆调走就完事？告诉他没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共产党的公安干部、管教员，自己都没有管教好还来管教我们，太下流无耻了！我要告他！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员强奸妇女就不犯法，不治罪！”叶永祥道：“你可以告他，写状子好了。”“那好。”我第二天就不上班，在家里写状子。下午大家收工，排队打饭时我去了。叶永祥在伙房里吃饭，我们职工在外面排队。我到窗口上大声地喊叫说：“报告叶队长，关于公安干部、管教员、共产党员李立悟强奸我老婆一案，我的控告书写好了，请叶管教收下。”这时全队的职工都听见我的讲话了，叶管教过来拿了状子又去吃饭了，没有说话。倒是岳嵩队长讲话了：“你少在大家面前嚷嚷，我劝你闭嘴少说话，否则对你不利！”我答道：“什么？共产党员、管教干部强奸我老婆还不叫人说话，还有天理没有？”岳对大家说：“大家都回去，别听他胡说煽动！”队里的人散了，我也回家去。

这件共产党干部的丑闻，很快就传遍全场。对干部的形象以及管教工作起了极坏的影响和副作用，共产党的形象也受到莫大的损害。他们下不了台，恼羞成怒，又编造了一个假案，欺骗全场的职工和家属：我这名受害人不但未告成强奸犯李立悟，反而被他们诬陷说是夫妻俩人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猪八戒倒打一耙！

1968年2月2日春节前夕，全体职工集合，岳嵩讲话："近来反革命份子文彻赫恩，反动气焰非常嚣张。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趁机捣乱。我宣布立即逮捕文彻赫恩，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并叫杭乃中、史善祥回家把我行李带来。他们回来时交给我十块钱，说是家里给我买饭用的。晚上开会，由组长杭乃中（历史反革命）宣布："从今天起，你的一切行动必须报告，准许后方可行动。"并由山东大汉李振江负责看管我，劳动生活均在一起。

冬天的劳动一般都是平整土地，用筐抬土。一筐有五十斤以上，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能力决定抬几筐土。一搬情况下抬两筐，可看管我的人李振江身高马大，年轻力壮，每次都要抬四筐，一天下来肩膀肿得像小馒头似的，收工回来躺在床上就不想动了，饭也不想吃。我完全明白这是故意整人，没有办法，只有咬着牙挺着。

这还不算，每天晚上八点，他们就开始开批斗会，叫我交待和老婆怎样合谋计划把干部拖下水，怎样陷害干部进行阶级报复。我自然矢口否认，结果是每天晚上被揍一顿，不打得鼻青脸肿不算完事！每次开会都叫我作"喷气式"（指低头弯腰九十度，然后把双手向后抬起，像喷气机那样的姿势）。他们说，什么时候承认和老婆预谋拉干部下水，批斗会就什么时候停止。一共斗了我八个月，二百四十天，一天没拉。他们像饿狼似地完全失去理性和人性，每天晚上都把我的脸打得变形，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我知道这是干部的指示，否则谁敢这样打人？这种酷刑手段一般人很难顶住，我争那一口气，死也得顶住，决不屈服！受害者反而连遭陷害批斗，天下真是没有公理了。

放水组的两个山东人碰见我时跟我说："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承认，顺着他们指引的杆子往上爬，免得受皮肉之苦。胳膀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是专政对象，没有道理可讲。"的确，有些时候，我也受不了天天这样的殴打，几乎想承认算了。可当我冷静下来，理智地想想，认为人的尊严胜过生命。我意念坚强地告诉自己，再大的困难也要顶住。我已经两次进过地狱之门了，是从死神那里夺回的生命，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罪名是共产党无中生有捏造强加的。如今我是受害者，又被诬陷为拖干部下水。难道天下竟有这样的男人，让自己的老婆任意叫别人践踏蹂躏吗？

从冬天斗到春耕，他们对我精神上进行残酷的摧残，肉体上进行严刑拷打，我依然没有屈服。他们的目的很清楚，想屈打成招，好挽回共产党和公安干部的面子。在春播动员大会上我又被拉上台批斗，这种场合打人更凶狠，每次做喷气式不到二十分钟，我就满头大汗，腰痛得支持不住，跌倒在地，却仍然被迫爬起来继续做喷气式。开完批斗会，我被打得无法行走，只能慢慢扶着墙走回宿舍。屁股也被白腊杆（一种有弹性的木棍，不易折断）打肿了，夜里只得脸朝下睡觉。第二天一瘸一拐的仍然得劳动。春播再忙，晚上照样开批斗会，田管期间不太忙，更是加班加点地开批斗会斗我。68 年的全场秋收动员大会，再度点了我的名，我当时已准备去劳改了。

回到林业队，晚上又开全队批斗大会，这次把我老婆也叫来了，坐在边上旁听。第一个发言的是史善祥："你老婆已经承认了拖干部下水，你还不回头是岸，争取宽大处理。"我答道："没有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这时七八个人对我劈头盖脸地打

了一阵，其中北京人王鉴朝我脸上就是两大嘴巴！只听鼻梁咯喳一声，鲜血冲了出来，血流满面，一地都是，还不让擦。这时工人出身的苏北人张三小上来就是两拳，当场打下两颗门牙，边上的牙也有点活动。我用手把打掉的牙拿出来，高高举起："报告大家，我的牙被打掉了。"众人说："活该！谁叫你不认罪。"我这时也横竖横，豁出去了："我拉李立悟下水？他官小点，他妈的！他才是一个班长，老子二十年前在部队里就是排长，我还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众人喝道："你老婆都承认了，你还抵赖？"我答道："那好，我和她划清界线，提出当场离婚！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我已成血人，李振江和赵青山还要过来揍我。由于鼻子血流过多，加上牙打掉后嘴里也流血，我忽然晕厥过去。

当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己的坑上了。大概天快亮了，我抬头看到广东人吴玉坤坐在我旁边。我说："老广，给我倒点水喝好吧！"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感到鼻子、脸庞、嘴唇都肿得很大。我病了不能出工，可晚上我躺在床上批斗会依然照开！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地了。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与恨。我的灵魂升华，更加坚强不屈。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既然已经有一个四岁的男孩，我一定要把他抚养大，不能像我一样，从小就没有父亲。从此以后，我的鼻子落下了毛病，经常流血。后经医生检查，是因为鼻梁骨被打断了。1998 年秋天，我特意去北京友谊医院专科门诊，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开刀才能治好。我想都这么大岁数了，刀还是少开为妙。

我的问题一直挂着，不能回家。每天叫我写检查，叫我从认罪开始，深挖犯罪根源。不论我把自己如何臭骂，他们都不满

意！后来队里又出现了新问题，在伙房做过活儿的河南人赵青山，拿旧报纸卷烟抽。有人检举，说报纸上有毛主席像和语录。这还了得？把毛主席给烧了！他顶替了我，也是天天挨斗、挨揍，脸经常被打得变形。不到一个月被逮捕了，判刑十年，没有多久竟然死在大牢里了，年仅四十。

过了国庆节，队里又调来一位朱指导员。十月中旬，通知我打行李回家。自从我被捕，隔离审查开始，我的工资降为三十元了，而我老婆又已下放当家属。我想这三十元那够生活的？还得往青岛寄孩子的生活费。我干脆叫老婆回青岛把儿子接回来。这次事件后，我等于扒了一层皮，生命受到重大的打击，虽然活了下来，但并不比死强多少。也许死了还不用遭这么多罪，受这么多苦。

孩子唱错了歌

69 年元旦后孩子带回来了。老婆帮人家打毛衣增加收入，维持家计，但生活还是艰难得很。我每个星期天拉着车子上山打柴禾，可以节省一些钱。又养了两只母鸡、几只小兔，可以改善生活。从被批斗之后，我很少跟人说话，任何人都不来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掉了十二颗牙，现在又打掉两颗，虽然只有三十几岁，但已经像个老头，满脸皱纹，体重从一百六十多斤降到一百三十多斤，这就是生活的烙印。每天谨慎小心地过日子，真正体会到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我也下了决心要过劳动关，因为今后的日子看来只有干活了。我学割麦子、学打土坯（打砖），逐渐地这些重活都能干了。

共产党叫我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叫人扒一层皮倒是绝不夸大！我每天和机器人一样，只知道干活，收工就回家。我的个性是个爱说笑的人，可环境逼得我不敢乱说话，“怕出一点差，最好是哑巴”。

六月份是田管期间，我们正在大蒜地里除草。岳嵩队长来了，把杭乃中叫过去说了几句话，回来后对我说：“你又犯案了，收工后你不能回家。从现在起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真是祸从天降，不知道又犯了什么错误了。晚上开大会时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份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命我回小组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犯了什么错？小组会上人们围过来准备动手。我说：“你们打我也没有用，我实在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啊！这半年多我规规矩矩干活，没有讲过什么话呀。”杭乃中问：“你在家讲过什么没有？”我答道：“没讲什么，每天劳动挺累的，吃完饭就睡了。”

第二天他们继续开批斗会，开会时小组仍叫我做喷气式。我自从去年被批斗八个月后，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腰部经常疼痛。我说：“我有毛病，医生检查过，不能再低头弯腰了。”小组的人说：“那你就跪着向毛主席请罪！”从那以后我天天朝着墙上贴的毛主席像跪着挨斗。开了几天会，我终于明白了，是我那四岁的儿子唱错了歌！有一首马屁音乐家写的歌叫“打倒刘少奇”，而我儿子唱成“打倒毛主席”。听说是家属院王鉴的老婆检举的。我提出大胆怀疑：他们俩人对我有意见，去年批斗我时就把我鼻子打断了。在文艺队时他们俩老想演主要角色，但我从来没有分配过他们俩演主角，因为我觉得他们缺少演员的创造力、激情和舞台魅力，素质比较差。现在是趁机打击报复陷害

我。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一百首语录歌，队里的歌都是我教的，别的歌我也没有唱过。再说打倒刘少奇这首歌我没有听说过，是社会上唱的，我就更不会唱了。我再笨、再傻也不会教小孩唱反动歌曲呀，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和自己过不去吗？小孩怎么唱的我怎知道，我天天在队里，只有睡觉才回家。天天批斗挨揍，我也习以为常了。我确实不知道孩子怎么唱的，再斗我也不能承认。

69 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社会上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劳改队也不例外。我想这回大概不会有我的事了，可是事与愿违，恰恰相反。祸又降临到我的头上，我被让交待在美国的哥哥的问题。岳嵩队长说："鞍山钢铁公司来人调查了，叫揭发你哥哥的特务问题。"本来只有教小孩唱歌一件事，现在又加上哥哥的问题，真是祸不单行。小孩唱歌的事我知道非同小可，当时公布的公安六条说得很清楚："凡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林彪者以现行反革命罪严惩。"我死活不能承认，我的回答实事求是，不能瞎编，欺骗党和人民。

每天劳动回来吃完晚饭，不管天气多么热，我就穿上棉袄棉裤，准备挨揍。也许是批斗时间长了，人锻炼出来了，经得起打，渐渐地我也变得更坚强了。从 1955 年反胡风运动遭批斗开始到 69 年秋天，十几年来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已经彻底地明白，共产党要整你，你就是跪着、哭着请求他们，也丝毫无用。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早已超过法西斯专政了，比希特勒还凶狠。希特勒是对异族犹太人进行屠杀和镇压，而共产党是对自己的本民族、对自己的骨肉同胞进行屠杀和镇压，这是共产党和纳粹的区别。

林业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进入高潮，每个小组，每个房间都在逼、供、信，都有打人的声音，受害者的呻吟，鬼哭狼嚎，形成一片凄惨的恐怖世界。第二天巡视一下，每个小组都有鼻青脸肿，脸被打得变形的人。小小林业队，不过一百多人，短短三个月时间里，竟有七个人自杀！有上吊的、吃药的、跳水池的，特别是一个名叫崔喜德的人死得很惨，他跳水池时我们都在场，看着他活活被淹死。队长不准我们救，说谁叫他跳水池，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大家的确是活不下去了，当时是把人往死路上逼的。我自个儿想，受那么多苦都挺过来了，再苦也得顶住，绝不走死路。可是想活着是多么的艰难，死路倒好走，活路太难熬了。

每年的秋收动员大会，都要枪毙几个人。镇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叫大家拚命地干活，接受改造，也就是接受奴役，老老实实做一个不会说话的劳动工具——人畜。在秋收期间日夜地干活，没有人敢发一句牢骚。一般秋收完毕以后，每个人的体重都会下降十斤左右。69 年的秋收动员大会在工程大队院内举行。四面屋顶上架着机枪，院子里的墙上都贴满标语口号，“镇压反革命”的牌子挂在舞台正中。都兰县法院宣判三个人死刑，罪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场执行。最后法院的人点我的名：“林业队的文彻赫恩来了没有？站出来！”我低着头站起来。“你今天回去后，老老实实给我交待自己的罪行，否则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我心想今天等于是陪判了，坦白从来没有从宽过，只有从严，是套口供的一种卑劣手段。我早已明白他们要套我的口供，以便定罪。秋收动员大会，实际上就是镇压大会。劳改队里人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既

然点了我的名，就不会轻饶我，得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叫他们打个半死，甚至打死。共产党利用人的本能自私心理，叫大家相互检举揭发，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目的是叫人们相互残杀，狗咬狗。我早已看透，靠整别人、打小报告而得到党的恩赐，那是做白日梦。检举别人不但挽救不了自己，同时也暴露了自己丑恶的嘴脸。可惜劳改队里没有几个人能看透这一点。

晚上林业队全队开批斗大会斗我，还是老一套，上台跪着，逼我交待孩子唱错歌的事。我一口咬定，绝没有教过，向毛主席保证。一群人上来把我打翻在地，并高呼口号："我们今天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社会上的口号也适用于劳改队。山东大汉李振江上来就是一拳，我大叫一声"唉呀"，感到牙齿肯定又被打掉了，鼻子里、嘴里都喷出血来。他又是一巴掌，左耳嗡的一声，从此之后，我的左耳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叶永祥、岳嵩坐在旁边无动于衷，这都是这些共产党干部唆使叫干的。我吐了一地的血，也不知掉了几颗牙，仍然跪在那里。这时史善祥过来了，他穿著高筒大皮鞋，朝我肚子上就是一脚！我当即倒地，喘不过气来，几分钟后才吐了一口长气，昏厥过去。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大家把我抬回宿舍，天亮时我醒来一看，全身都是血，脸上也是血，全身痛得不能动。我闭上眼睛，这个罪受到什么时候才到头，也许熬不到那一天了。后经医生检查，身上、腰部、腿部都有踢伤，鼻、嘴肿大，脸部有紫青淤血。牙齿被打掉二颗，耳膜也被打致破裂，不能劳动，休息观察。

一周后继续开批斗会，他们叫我交待我哥哥的问题，先把小孩唱歌的事放一边。我答道："解放前和哥哥相处时间不多，他

在鞍山，我在沈阳，读书情况不清楚。”他们叫我交待哥哥的特务活动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反正哥哥人在美国，他们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顺着领导的意思和指引的方向编故事，省得吃皮肉之苦。这一招倒顶奏效，表扬我有进步，态度有转变。就这样斗了一个多月，看看再榨不出什么来，批斗会就缓和下来。因为要开始斗别人了，我被命写全面检查。

清理阶级队伍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无一人可以幸免。这回我把知识份子那套讲理的方法收拾起来，私下也准备好一根白腊杆，四十公分长的木棍，这种木头不会断并且有弹性。凡是斗过我、揍过我的人，都一一回敬他们一顿白腊杆，打得他们皮开肉裂，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哇哇叫。几个月下来我报复了不少人，内心才平静下来、心理也平衡些，总不能老叫别人揍，也得揍揍别人，尝尝那种过瘾的滋味。在那种环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会变成没有人性了。热血变冷，人变成兽，既残暴又凶狠，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元旦前夕，新来的韩队长叫我打行李回家。这次批斗共持续了六个月，到此结束。吃过晚饭我背着行李回家，一进家门，看见大儿子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儿子，心酸极了，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多年来封锢的泪泉开封了，我流下眼泪，抱着两个儿子，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听孩子的母亲说：“立秋那天早晨生的老二，当时批斗你正在火头上。生小孩时，没有人敢来帮我，因为我是现行反革命家属，孩子是自己生下来的。”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每当忆及这幕情景，我就心疼如绞，泪水亦夺眶而出。我五岁的大儿子，从小因父母的遭遇，精神上受到莫大的伤害，性格蒙上了阴影。直到现在，

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仍然是寡言寡语，和任何人都不来往，稚幼的心灵受到当时疯狂的成人世界的残酷洗礼，奈何。

上次被诬陷拉干部下水，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后来与妻子离婚告终。这次又被诬陷教儿子唱反动歌曲，在批斗时险些送命。从 1955 年至 1969 年，我被共产党诬陷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大学里组织反革命集团，第二次是阴谋拉干部下水，第三次是教儿子唱反动歌曲。他们都用了软硬兼施，逼、供、信、诱的手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要我招供。他们动用酷刑，严刑拷打，企图屈打成招，我是在绝望中挺过来的。精神上遭受的折磨，肉体上承受的摧残，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能表达出来的。

谁是剥削者

69 年以后，林业队又盖了三排瓦房，每排六间共十八间。林业队六个干部每家三间，和我们职工的三排房子是对称的。中间一排房子是办公室，在办公室门前有一个大花坛。这些建筑物都是我们建造的，每年田管期间就打土坯盖房子。我们不但盖人住的房子，还盖马棚、牛栏、猪号，整个农场的建设全是劳改犯和职工两只勤劳的手创造出来的。我们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可当我们看到自己创造的财富，被那些贪婪的群体疯狂地掠夺和吞没时，我的心因愤怒而膨胀了，倒底谁养活谁？被榨干了的人民养活着一群群吸血鬼。

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干部和我们住在一处，不到三亩大的地方，每人每户的一切活动都看得很清楚。我发现这儿干部全是吃公家的、用公家的，一切都是免费供应，真正的共产世界。一年

四季最好的新鲜蔬果不用花一分钱，有专人送到家门口。负责管理蔬菜的人叫聂永兰，原为国民党少校军官。到了冬天温室里什么蔬菜都有，西红柿、黄瓜、四季豆、菜花等等，应有尽有，源源不绝地供应到各位队长的府上。肉类也是如此，鸡、鸭、牛、羊、猪，都是队部养的，哪条猪长得肥吃哪条，哪头牛长得壮杀哪头，六家人家分一只屠宰的牲畜满不错的。他们要用柴禾，就下个命令，派上三辆马车，到山上去拉，拉回来六个干部一分又完事了。拉来的好木头，就叫我们队里的木匠何惠忠给打家具。这个人一年四季为这六个干部打家具，这一切，都进入我们的眼帘。这样的土皇帝似的共产党干部在劳改队里要把我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林业队是这样，别的队想来也差不多。

中苏边界冲突

69 年的冬天，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东北有“珍宝岛事件”，战争的始末报纸都有详细报导。战争虽小影响却很大，全国都动员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全国人民各单位、机关、企业、学校，深挖洞，广积粮。整个中苏边境已进入一级备战状态，特别是新江更紧张，常驻我们农场的军管负责人关营长就奉命调往新江参加战斗。一年后关营长回来时已负伤了。听当地驻军讲，中国军队和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军团发生战斗，当时的策略是先引进来，再关门打狗，这是没有公开报导的战争。事后我看“珍宝岛”电影纪录片时，我心里又好笑又生气，每个战士都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左右摇摆大喊“不怕牺

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结果呢？苏联红军打过来一排子弹，我们的战士就全部倒地牺牲了。那毛主席语录不是护身符，更不是刀枪不入的盾牌，解放军的战士又不是愚昧无知，这完全是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把毛泽东神化后，士兵们甚至心甘情愿去当炮灰。何其可悲。

苏联老大哥以前是中国的榜样，国家的政策一边倒。谁反对老大哥，谁就是反革命。我被判刑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批评了苏联老大哥。现在验证了老大哥的本质了吧。由于当时的形势严峻，我们劳改队也紧张起来了。其实战事发生在黑龙江的东北部，我们在西北中部，相差有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劳改队如此紧张呢？我心中产生疑惑。

各大队、各站在犯人所住的区域，都加固围墙，加宽加高。我们住的地方林业队也开始盖炮楼了。林业队盖的炮楼分三层，七、八公尺高，厚一公尺。我是当小工的，整个炮楼完全是我们一天劳动归来之后，加班加点建成的。别的单位也不例外，全场都在备战。劳改队为什么搞这些措施？怕苏联老大哥打过来，还是怕打起仗来我们逃跑？后来才知道这些防御工事是用来防范劳改犯和新生就业职工的。

我们农场铁工厂有一位很好的老铁匠，姓周，手艺特精。他接到上级的密令，要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出二百把大刀，并警告他此消息不许外传，如有泄密，将严厉处理。现在的战争还用大刀来冲锋陷阵吗？太落后了吧。我们原来文艺队的扈文明和周师傅关系特好，他告诉我：“现在有新政策，刑满就业人员和家属可以申请回原籍，你可以和你老婆申请回山东原籍嘛。”我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问为什么？他道：“铁工厂的周师傅，天天

日夜加班在打大刀片，你知道不？”我说：“我怎么知道？”他说：“我告诉你，可不能外传，如果泄密可就是掉脑袋的事！”“这么严重？”他继续说：“周师傅听上面说，如果红军打到青海，首先处理劳改犯。你没有看见，各站、各大队都在加固围墙，加宽加高吗？到时候用机枪一扫，一嘟嘟，一个也跑不掉。而我们新生的职工住得分散，又无围墙警卫，集体处理很难。为此上面计划，对我们职工，在晚上进行用大刀屠杀，个别处理，不会惊动左邻右舍。”

这一大屠杀计划非同小可，把我吓得几天都未睡好觉。我也曾计划逃跑，可携家带口的，小孩又小。联系山东老家，哪那有这么快。中国办事，效率甚低，而且还得托门子拉关系。这事把我们愁得不得了，只得天天盼望老天爷保祐，苏联红军老大哥，你们可千万别打过来呀！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自己无所谓，已经死过几次的人了，可两个儿子，一个才五岁，一个才几个月，他们如遭不幸，那可是太不幸、太不公平了。他们有生的权利！后来战争总算没有爆发，真是谢天谢地。我们全家和农场里的职工、家属、小孩，都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严寒恐怖的冬天。

妈妈来信了

1972 年的秋天，我正在莞豆地里收割丰收的果实，忽然队长来到我的面前，叫我到队部去。我吓了一跳，不知又出什么事。到了那儿，有个军人在等我。他说：“我是军管会的。我问你，你家里都在国外吗？”我答：“是的。”又问：“他们都在哪个国家？”“我最后得到的消息是 1957 年的，香港的朋友转

信过来。这位朋友叫郭有铣，说我哥哥在美国，母亲、姐姐、妹妹等均在台北市。”“有书信来往吗？”我答道：“哪有呀！二十多年沓无音讯。”他说：“现在我国已和加拿大建交，在美国也设有联络处。这里有一封信，几经周折，终于转到我们农场来，现在交给你。”他递过来一封信，上面贴满了各种小纸条（都是由转信单位贴的证明，从国务院侨务办，北京、沈阳、上海、青海、劳改局到农场）。军管会的人最后说：“你必须回信，你写的信交给我们审查之后，我们会替你发出。”我紧紧地拿着这封信，深深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了。

我坐在大田的垄坎上打开了母亲的信，我的心在狂跳，身子不断发抖。她的亲情溢满字里行间，像一股激流冲破了我的情感闸门。多少年来，我没有像那天那样失控地激动过。泪水像喷泉似地流个不停，像要把这几十年来的苦难，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多少年来，我欲哭无泪，因为眼泪早已流干，只剩悲与愁。老天啊，今天就让我哭个痛快吧！这泪水胜过千言万语，告诉我的妈妈和亲人们，我二十多年来的哭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苦难生活。一家骨肉分离多年，沓无音讯，在苦难中令我格外思念亲情，这种思念化成一股渺茫的微弱希望，支撑我活下去。

我的泪一直流到下午收工才勉强止住。收工时，我跑得很快，到了家里我告诉孩子们，奶奶从加拿大来信了。全家都落了泪，但那是高兴的泪、兴奋的泪。我连夜给妈妈写了回信，信的上方首先要写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我写的是要“斗私批修”，下面才接着写敬爱的妈妈。当时写信都是这种格式，真叫人看了啼笑皆非。第二封信很快就寄回来了，亲人们希望我把过去家里的情况讲一讲，并说不能把钱寄给不相识的人，要我说怎么来青

海的。我回信告诉他们，是自愿参加边疆建设来到青海，哪敢说是劳改来的。更没有告诉他们我是被陷害，打成反革命右派，也没有说香日德农场是集中营，劳改农场。随后我把家谱细说一番：我们是满族旗人，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名字等等。这样家里就放心了，一个月后他们寄来二百美元。那个时候二百美元是笔庞大的数目。从那以后，家里每个月都从加拿大或美国寄生活费来，一、二百美元不等。我们家再也不用为吃饭的问题而发愁了。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人只靠我三十元人民币的收入过活。买完米、面就没钱了，只有打野菜，放一把盐煮一煮吃。吃面糊时放一点酱油就算一顿了。从1970 年的冬天开始，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老婆带着那时才一岁多，还未断奶的老二，到西宁流浪乞讨求生。后来因为孩子太小不方便，才又返回农场，在家属队里担任积肥、拉大粪、刨大粪的工作。一年下来才挣一百多块钱，补充家里的生活费。孩子三、四岁就跟我上山一块去打柴禾。我一想到那几年的生活就那过得流泪。1968 年到 1972 年，是我一生最艰难的日子。

我的体形又高又大，但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得非常矮小，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小时候半饥半饱，营养太差，发育不良。因此我感到对不起两个儿子，他们从小跟我受了太多的苦，遭了太多的罪，我永生感到内疚和不安。

我终于平反了

1976 年春天我老婆平反了，回西宁原单位工作，恢复名誉和原职原薪，这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她带着两个孩子去了西宁，

我一个人留在农场。当年九月毛泽东命归西天，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倒台。全国形势有好转，我心想这回该轮到我平反了，但等了一年多没有消息，

到了 1978 年三中全会以后，我看到报纸上报道总书记胡耀邦和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后，内心无比兴奋，时机来了，形势对我有利。78 年 6 月，我老婆带着小孩到农场来看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她。我写了一份上诉材料，既简单又明了，叫她带到西宁直接寄北京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亲收。因为我在农场寄信，要经过队里管教干部检查，不但不给寄出，反而会开我的批斗会，批我改造了二十年还不认罪。

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老婆的来信，她说田管期间，你们不太忙，你已经二十年没有离开过农场，希望你回家来看看，同时也看看社会上的情况。我心里已有数，次日即向朱指导员请探亲假。朱指导员当场批准我一个月的探亲假。现在我的家属也是革命干部了，他当然得批。第二天我即搭上林业队去上山打柴禾的马车，顺便走了一段路，到了香日德镇公共汽车站，买了直达西宁的汽车票。车子中午才来，我上车问司机什么时候到西宁。司机说当天到不了，夜间规定不开车，晚上在青海湖过夜，明天下午才到西宁。第二天下午到家之后，果然不出我所料，北京中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亲自批示：“你的案子已转至上海的戏剧学院，由戏剧学院党委处理解决。”我看完之后十分激动。“处理解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说明平反在望。我第二天就离家，坐直通火车去上海。坐了两天半的火车一点不觉得累，也许是太兴奋的缘故吧。我下了车直奔戏剧学院，到人事科，科长吴耀宗亲自接见我。我把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的亲自批示交

给他看。看完之后，吴科长就把我领到戏剧学院招待所，他说："你先住下，等候重新审查你的案子。"

记得我办平反时，二哥吴天威曾从美国给上海市统战部写信，阐明我不但无罪，而且是对中央革命成功做出贡献的人。二哥是在 1952 年从台湾来美留学的，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大学任教，后来更在伊利诺大学成为终身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美国、大陆、台湾均备受尊敬。他曾创办《日本侵华研究》季刊多年，并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赔行动，又在美倡议建立"日本侵华纪念馆"，揭露日本侵华时用细菌战及七三一部队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二哥天威与张学良将军有密切的往来，曾探访他多次。在张学良解除囚禁，举办九十大寿时，国府元老张群发请柬，二哥和姐姐都在被邀请之列，特意从美国去台湾赴宴，给张学良将军祝寿。

这时已是七月中旬，是盛夏的季节，过去的同学均来招待所看我，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俞洛声、青话的冯纯超、许守钦也来了。文艺界的前后同学都纷纷议论："文彻赫恩回来搞平反了，这小子还真行，没有死，在青海改造挺过来的人不多。"我是学院里几十个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反革命右派份子中第一个回来搞平反的。学院给了我生活费六十五元，是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当文艺十二级。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写信通知那些和我一起被整的小集团成员，有蔡振声、王文杰、陈振杰、古人驹、沈茂隆等等。他们分别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农场改造。大概不到一个月，招待所住满了回来平反的同学，多半是小集团成员或者与一〇五小

集团有关的人。后来大家平反了，都特别感谢我的脑子灵敏，反应快。我说你们离上海这么近，怎么反而迟钝？还得我从青海老大远赶回来叫你们回学院搞平反，其实应该是你们先着手才对。由于二十多年业务的荒废，许多人对戏剧已非常生疏。虽然后来所谓的小集团成员全部留校工作，但多数都改行了，分散在图书馆、总务科、演出科、传达室等工作，只有我返回本行，比较幸运，能够给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上课，能够导演、演戏、拍摄电视剧，并代表戏剧院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戏剧节”和“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

计算起来，大小歌剧我也排了十几出。其中自导自演的就有《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话剧是我的本行，早在部队和学生时代，就曾演出过《思想问题》、《龙须沟》、《上海屋檐下》、《雷雨》等。六十年代以后自导自演《年青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平反后演出莫里哀《贵人迷》、《陈嘉庚》，莎翁的《泰特斯• 安得洛尼克斯》。自导自演的有《日出》等，共三十余部作品。我也是戏剧学院首位参加电视剧演出的人，作品有《孙中山与宋庆龄》、《瞿秋白之死》、《嘉应观密史》等多部电视剧。

1982 年，我趁开放之机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小红帽艺术团”。演员来自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儿童艺术学院、上海歌剧院、上海舞剧院、上海乐团等，都是优秀青年演员。我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女子乐队，曾到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演出多次。在江苏盐城一带巡回演出，颇受好评，收支也能平衡。后来我欲来美，剧团就自动散伙了。想起来挺可惜，如能继续搞下去，定有大发展。

1992 年 11 月到 1993 年 1 月，我参加了好莱坞拍摄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 ）的演出。我是在东部纽约地区一千多名应征演员中，经过三次考试，唯一被录取的演员。虽然是个小角色，不过几个镜头，但也感到满足。只可惜从此之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

平反大会于 1978 年 12 月 22 日在戏剧学院大剧场召开，宣布我为有错误言论但免于处分。其实我讲的话都是好话实话，当然不服。我又继续上诉至上海市高级法院。虽然我已正式工作一年多了，但仍继续打官司，终于在 1981 年，法院才做出彻底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的结论。

平反大会的第二天，78 年 12 月 23 日，我即乘火车到西宁，只在家住一天就乘汽车回香日德农场办理释放手续和将户口迁移至上海市的证明。到了香日德一下汽车，就碰到老四站的新生职工邱石平等人。他们跟我说：“老文，你的事令全场轰动了，都在议论说你是全场最反动、最顽固、最不认罪的反革命份子，现在反而平反了，你是全场几万名劳改犯中第一个平反的人。”

后来听说，林业队和别队的知识份子，有百分之五平反了，像上影厂的丘石平，文汇报的吕文等。回到林业队，队里干部的嘴脸全变了，对我都是笑脸相迎，客气得很，同事们也另眼相待。第二天就把手续办好了，队里的朱指导员和陆管教员还请我吃饭。可对于岳嵩、叶永祥之流的干部我理都不理，他们主动找我打招呼，我看都不看一眼。这些干部水平太低，使得人心不服，造成人们的逆反心理，反而起反效果。

三天后我把东西都整理好，只带了一个小提包。其余的木箱子，衣服被褥，都是劳动用的，全送给那些比较正派和跟我接近

的职工了。他们也主动买酒和熟食，请我吃饭喝酒，为我庆贺和送行。临走的时候，对一些平时打小报告、心眼不正的人，像张寿春、杭乃中、史善祥之流，我对他们进言说："应该老老实实地改造，靠歪门邪道行不通，真的就是真，假的永远真不了。靠整人、打人小报告也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我过去曾被你们踩在肩膀上当垫脚石，结果呢？你们还得在这儿接受改造。我呢，现在平反了，回原单位戏剧学院了。你们要汲取教训，做人要正直、正派，永远不吃亏。"弄得他们面红耳赤，无以为对，连说对对、是是。多么可怜的一群哈叭狗呀！

一路上我坐在汽车的前座，看着窗外冰天雪地的戈壁滩。再见了，柴达木，我在这儿献出了青春、血泪和汗水。汽车平稳地向东前进，现在的青藏公路和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样了，是柏油路。二十多年啊！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活一幕幕都呈现在眼前，我怎么能不思绪万千，感慨落泪呢？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啊！刚到劳改队的时候，我是个血气方刚二十六岁的小伙子，而离开劳改队的今天，我已经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了。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共产党给毁掉了，否则我也许会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共产党毁了多少人，糟塌了多少人材？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类似我这样的冤、假、错案，何止千百万！还有那些在劳改队里饿死的、病死的、折磨死的、打死的……，共产党将怎样向他们的家人和后代子孙交待！

从 1958 年 3 月 11 日被捕入狱至 1978 年 12 月 22 日平反止，我共计坐牢二十年九个月零十一天！加上 1955 年 5 月反胡风运动开始至 1958 年 3 月 11 日被捕止，共计被批斗隔离二年十一个月，合计批斗加劳改共二十三年八个月。我今天能活着出

来，离开人间地狱，算是命大。虽然我没有死，可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将折磨我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断、左耳被打聋、牙齿因营养不良脱落十二颗，打掉四颗，共十六颗。腰部被打致残，成终身疾病，这都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精神心灵上的折磨摧残，伤害至深，我将终其一生无法摆脱梦魇。

文化精英的遭遇

中共建国以来，就连续不断的开展政治运动。从 1951 年的镇反、1952 年的三反五反、1955 年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运动、1958 年的整风、1959 年反右倾、1964 年的社教运动，到 1966 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十几年来就没有喘过一口气来，一直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

每次政治运动中，按人口比例镇压是毛泽东的发明，每次政治运动镇压 5%，一百个人就有五个，一千个人就有五十个，一万个人就有五百个人被镇压。按这个比例算下来，十亿人口，每次运动就有五千万人民被镇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变成禽兽。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精英，被共产党活活整死、斗死、关死、逼死！

著名钢琴家傅聪的父亲，大翻译家傅雷，早年留学法国，专攻艺术批评，学成回国后在上海美专，现浙江美术学院任教。后又创办文艺刊物《时事汇报》，任总编辑，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工作，因其译笔炉火纯青而闻名于国内外。译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等等。傅雷心直口快，对社会不良现象敢于提出批评，正因如此而被打成右派。他个性坚强，不承认自己有罪。1961 年 9

月 31 日宣布摘掉他右派帽子，他拒绝出席摘帽大会。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红卫兵抄家，对他们家进行打、砸、抢。傅雷不堪受辱，于 1968 年 9 月 2 日夜和爱妻朱梅馥双双上吊自尽，死时年仅五十八岁。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翻译家还没有人能超过傅雷的才华，英才就这样被逼死了。

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个成立的创作小组叫“五花社”，社长是石挥，副社长是白沉，社员有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等。1956 年鸣放时，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人称“话剧皇帝”的石挥响应党的号召，提了些对艺术领域中的建设性意见。1957 年反右时他被揪出来，说他组织反党集团“五花社”，借鸣放之机向党进攻，诬蔑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在批斗会上石挥反驳：“当时你们请我提意见，我石挥本着爱国、爱党之心，对文艺方面提了些建设性意见，现在又翻过来说我向党进攻，仇恨共产党。”石挥当然不服。上海电影局又决定开全市文艺界批判斗争大会，会场设在“淮海电影院”。开大会那天，几千名文艺工作者，左等右等，不见宣布开会。后来宣布被斗者石挥不见了，批斗会暂停。大家带着疑惑的心情离开了电影院。两个星期之后，在浙江舟山海边发现了石挥的尸体，一代天才就这样离开了人间。石挥能编、能导、能演，像电影《我这一辈子》，就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影片。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影片《鸡毛信》，也是他所导演的影片。平心而论，我还未见过中国有这样优秀的全能艺术家。

著名导演史东山，热爱祖国。五十年代响应总理周恩来的号召，回祖国参加建设。当时从香港回来大批艺术家，而史东山大导演竟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含冤去世。

著名流行歌作曲家陈歌辛，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之一陈刚的父亲，1957 年被打成右派，罹难于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劳改农场，年仅三十七岁。他的作品“蔷薇处处开”等均是世界级名曲。能弹、能唱，是一个全能的音乐家。

1957 年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对知识份子的大围剿。当时全国仅有知识份子五百万人，而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五十万，占百分之十的比例，一百个人有十个被送进监狱，按毛泽东 5%的提法，反右是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毛泽东为什么这样仇恨、忌讳知识份子？我看原因有二：其一，知识份子有文化有头脑，有思考判断能力，他怕阴谋被揭穿，愚民政策不易得逞。其二，他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对自然科学、数理化皆不通，只会用古文垫底，知道自己的水平考不取大学，因此他嫉恨大学生知识份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疯狂了，可以说全国人民都疯了，完全失去理性。到处是批斗声，一批批中国的文化、知识精英被红卫兵抓去批斗、游街、毒打。著名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有异议，结果被毛泽东的爪牙割喉断声后枪毙示众，当年只有四十六岁！

57 年曾指名调我去上影，被我院党委拒绝而未成功的著名电影导演应卫云，是江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由于他是“资产阶级出身”，被带上高帽子，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激烈的刺激导致他心脏病发作，他当场死在大卡车上。应卫云导演解放前曾掩护、营救了许多地下共产党员的生命，甚至冒险将他们藏在自己家中。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原名韦亚君，才华横溢，是我非常敬佩的表演艺术家。她是民国时期最高艺术学府——华光戏剧专科学校

的优秀生，和当今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是同学。1945 年在曹禺《雷雨》中饰演四凤，一炮而红。胜利后参加昆仑电影公司，在史东山、郑君里、蔡楚生等导演下排戏。并和蓝马、陶金、黄宗英等一批优秀演员合作，扮演创作了许多不同性格的角色，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而树立了大牌明星的地位。她主演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她在婚姻上经历过三次失败，但在事业上却是成功者。1954 年的影片《南岛风云》，生动地勾画出一名女游击队员的形象，获得空前的成功。正当其艺术成就达到顶峰的时候，反右开始了。她因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小组“五花社”的成员，与石挥、白沉友好，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斗争。 文革一开始，她被打成“文艺黑线骨干”。她当时患癌症，竟被医院赶出来，拒绝给她治疗。她被抄家、批斗、游街，曾和黄宗英、王丹凤关在一个牛棚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手段她都领教过了。1968 年 11 月 21 日，上官坠楼自杀了，那年她才四十出头。1978 年 10 月 13 日，上海电影局为上官云珠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可这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导演郑君里，也是在文革中批斗至死的。著名作家老舍，被逼得无路可走而投湖自杀。作家赵树理，著名诗人郭小川曾是我中山中学同学，也都被逼害致死。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和文学家被共产党给残杀了。他们还残杀了正直的爱国青年张志新、遇罗克等。后来虽然都被平反昭雪了，但人命是一去不返的。

2001 年第七十三届奥斯卡颁奖，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一举拿下四项大奖：最佳外语片、最佳美术设计、最佳摄影、最

佳音乐。这是中国人在世界电影艺术上第一次得到如此辉煌的成绩。这部电影剧本的原著作者是王度庐，原名葆祥，北京满族旗人。他生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 年），自幼丧父，家境贫困，十二岁时曾当过眼镜铺学徒，没有受过完整教育，但刻苦自学，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也到北京图书馆进修。抗战初期曾在西安《民意报》做编辑，后在《青岛新民报》当记者。1938 年开始写武侠小说，笔名“度庐”，共写了近二十部，代表作就是包括《卧虎藏龙》在内的《鹤铁五部曲》，作品气势浩瀚、结构宏阔，将儿女英雄的千姿百态、悲欢离合描写得淋漓尽致。抗战胜利后，上海历史出版社把他的作品汇集出版，很是畅销。但好景不长，大陆政权易手后，中共把武侠小说视为野花毒草，历次运动连遭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王度庐夫妇一再被批斗，受尽凌辱和精神折磨，肉体上也遭到莫大的痛苦，最后被下放到东北农村监督改造，于 1977 年被迫害致死。这位名列北派四大家之一的武侠文豪，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人世，得年六十八岁。

十一位法国知名历史学家，经过三年的努力搜证，前几年出一本书叫《共产主义黑皮书》[1]，首次为共产党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算了一笔总帐。这本书长达八六四页，在巴黎问世后，即轰动一时。书中指出，凡是共产党攫取政权的国家，皆有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于共产党手里，本书为“世界共产党之祸”的集大成者。中国大陆排名第一，共有七千零二十多万人死于中共手中。苏联排名第二，共有三千九百五十万人，是在整肃、镇压、饥饿、大

[1]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by 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等，于 1997 年在法国出版。Harvard Press 于 1999 出版英译本。

规模的流放以及在劳改营牺牲的。这本书的完成，应归功于东欧及前苏联共产集团的崩溃瓦解，不然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各国这些从前绝不会公开的档案。

华盛顿邮报记者萨铎兰（D.Southerland），1994 年 7 月 17 日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该报告的调查研究显示，自中共 1949 年建政后，因镇压、迫害、饥饿而死亡的中国人有八千万之多。这个数字比较准确，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光饿死的就有四千万人。镇压了三千多万，加上自杀的、失踪的，也足有四千万人了。

1998 年 4 月柯林顿总统下达书面命令，指示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尽速完成准备工作，将柬埔寨前共产党领袖波布逮捕到案，交由海牙国际法庭审判。波布在 1970 年后期统治柬埔寨四年期间，共杀害了一百万人民。柬国共有七百万人口，七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杀害，这样一个人物交付国际审判，虽说是迟来的正义，但毕竟是对那些枉死者及其家人的一个交待。没有几天波布心脏病发作，死于泰柬边境的村庄里，事情就不再追究了。在这里我想请问柯林顿总统：柬共杀害自己的同胞一百万，您就要求国际法庭对柬共头头及有关负责人以战犯名义公审，可中共头头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他们屠杀自己的同胞八千多万人，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国际法庭审判呢？难道杀人还有区别对待吗？

我看偷渡潮

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了大逃亡。选择出走的道路，是人民已看清这个政府太腐败，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没听说有美国人

偷渡到外国去，或者是英、法、德等国家的人民偷渡到中国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铁幕”依然在，人们没有自由，所以国门打开一点，偷渡风就兴起，并且越燃越烈。现在，不但美国打击中国的偷渡客，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防范中国的偷渡客。中国人已成了世界性的“盲流”，这难道不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吗？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明末时期，反清复明失败之后，第一次大举外移东南亚一带。大批抗拒满清王朝起义的失败者，携家带眷，乘坐各种船只，沉浮于海，外逃异地他乡。第二次是清末民初，国情动荡，华人再次向外移居。这次不限于东南亚一带，而是北美、南美、澳洲一带。据有关资料查证，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后代，现在就在南美生活。

当前既无战乱瘟疫，又无政权交替，却出现第三次华人外移的高潮，中国人这次是向全球扩散，特别是八九民主运动被共产党血腥镇压之后，大批中国人外移。还有有一部份人采取不正当的亡命手段——偷渡外移，这些偷渡者在海上陆地空中频频被客地查获，关进监狱或遣返大陆。偷渡成功者虽然是多数，然而也有不少同胞非但未成功，反丧命黄泉。有遇到船难死在海上，也有闷死在集装箱里的。还有在货仓、货柜、船仓里中冻死、热死的，情景之凄惨，令人落泪。偷渡的过程充满艰难惊险，与当初非洲“黑奴”被贩卖来美国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国人是自愿铤而走险，而且还花上万的美元偷渡费给“蛇头”，这个现代版的《黑奴吁天录》的确具有中国特色。这些偷渡客来美后，没有生存手段，往往走上不轨之路。偷窃、扒枪、骗诈什么都干，甚至组织黑社会，进行贩卖毒品、枪枝的违法活动。妇女则以卖淫为

生的较多，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报导。这样的非法恶性移民简直是“黄祸泛滥”，然而能怪他们吗？

成功的偷渡客到了客居地，还有一手，就是申请政治庇护，从经济难民转换成政治难民的身份。他们瞄准每年纪念“六四”的集会，并不是真正要参加“六四”纪念会，而是在“六四”纪念会的横幅下面照一张相片，就说自己参加了民运，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怕回中国后，会被政府迫害，拿着这张照片去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去了。这些投机份子，连死人的油水也要捞一把，既可悲可恨，又无奈。这也算是吃人血馒头，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另一种典型。

大学生，努力学习英语，目的为了考托福，半夜里去排队领申请表格。大陆各个阶层的人都想往外逃。因为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生活在“古拉格群岛”里，没有人留恋人间地狱。海外有亲属的，都想尽办法申请移民出去。这几年的移民潮，中国人有一百多万流向国外。现在是不管到哪个国家，只要能离开中国，哪国都行。过去是去美国、澳洲、日本为主，现在东欧、非洲、南美哪儿都有。

目前两岸的老少配激增，不论男女，目的都是去台湾。根据2002年4月23日陆委会统计：从1998年到2002年，两岸婚姻人数已达九万四千对。少夫老妻年龄差距最大的为四十岁，台湾老太太六十九岁，而大陆壮男二十九岁。老夫少妻年龄差距最大的为六十九岁，台湾老人九十一岁，而大陆姑娘只有二十四岁。另外还有假结婚的，也不计其数。

小孩和青少年也往外逃。1999年8月21日，在乔治亚州外海，美国海岸警卫队发现“尼古拉王子号”货轮上有中国偷渡

客。在逮捕过程中，竟发现三十多名少年，只有十四五岁。难道他们也看清楚共产党统治者的本质，也看清楚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希望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亡命天涯呢，我期盼着那一天。

丑陋的中国人

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国会拿去研究参考，议员们都引以为戒，改正之。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庭大使，结果被撤职，遣返日本，卸甲归田，丢了饭碗。中国人柏杨先生也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人总算平安无事，台湾是民主社会，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柏杨先生在白色恐怖时期，坐过一年零二十六天监狱，与此毫无关系，并且获得赔偿三百三十六万元。他现在仍在上诉，认为冤狱未获得合理赔偿，要求再补偿二百万。我在中共牢里蹲了二十多年，一分钱没赔，奈何！

1999 年 5 月 10 日下午，我在朝阳门附近某大宾馆门前，等候北京军区总院的战友。说好的在宾馆门口集合，然后去吃饭。在等人期间，我看了一场现代“高衙内”的全武行。

当时从宾馆里走出一对时尚打扮的男女，看样子像干部。男女均有三十多岁，女的拿着车钥匙去开车门，男的走到另一方车门，打开后准备上车。这时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停车发票给他们，请他们付停车费。女的说；“我没带钱。”工作人员说：“这是规矩，停车必须给停车费。”女的下车朝工作人员啪啪两嘴巴！工作人员说：“你怎么打人！”女的说：“我就打你，怎么样？老娘就是不给你钱！”工作人员挡着车不叫走。这

时男的也下车了，两人一起对这个工作人员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工作人员说："我叫警察去！"男的说："你叫警察去，告诉你，今天就是不给钱，还打了你，怎么着？"开车就走了。当时我站在那边看着这一切情景非常气愤，准备去劝阻，旁边看门的人拉我一把说："先生少管闲事。"我看旁边有许多工作人员都袖手旁观。奇怪，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大宾馆门口，不但不付停车钱，还动手打人，真是荒诞不经。我问："你们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敢上前阻拦呢？"他们说："先生你不知道，这些人惹不起。你叫警察，警察来了也不敢管，他们是高干子弟！"我深深地吸一口气，这还是人民首都北京呢！要是在边远地区，山高皇帝远，那还了得！现在中国到处都是"高衙内"，他们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人民首都北京，交通和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我从前门百货大楼出来，想乘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看。百货大楼门前有五、六个汽车站和无轨车站，都竖有牌子，可牌子上都贴满了各类广告。有租房的、找工作的、业余学校招生的、换房的、找对象的等等五花八门，早把牌子贴得满满的。我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坐哪趟车去天安门，无可奈何，只有坐出租车去了。

我所看到的中国，人们已毫无公共道德可言，乱吐啖、乱丢纸屑、果皮，特别是天坛医院门口更糟，整个是一个新"龙须沟"。一下雨到处是臭泥坑，要是一刮风，垃圾、纸头满天飞扬，哪像首都，完全是一个垃圾场。在路上，不管汽车、自行车、三轮车、行人一律不遵守交通规则，全闯红灯。连公共汽车也闯红灯，真令人叹为观止。整个社会乱七八糟无秩序，警察在街上晃来晃去，视而不见，什么也不管，看了叫人为之气结。

我住在龙潭湖附近，龙潭湖外面早晨有早市，不但卖小菜，还卖一些生活日用品，鞋帽衣裤全有。我每天早晨到龙潭湖散步，也顺便逛早市，看看有什么合适可买的。可是闲逛并不悠闲，杂乱不说，更觉不堪其扰。你看，早市里没有一天不打架的。青年人打、小孩打、老头老太太也打、就连穿著时髦的漂亮姑娘也大打出手。吵嘴的、骂街的，无奇不有。在场的警察和菜市场的管理人员，也只看热闹不加干预，袖手旁观，完全没有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火气特大，一触即发。小偷也经常光顾菜场，我见过小偷被打得头破血流，被送到菜场附近的派出所去。

解放前我在北京读中学，那时候北京人特别客气讲礼貌，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早晨碰着了都相互打招呼，“您早”、“您吃了吗？”多么祥和文明的百姓啊。现在的人都像有一肚子怨气似的，随时准备吵嘴、打架。首善之都北京都这样，那外省、小城市、小城镇还了得？北京的大楼越盖越高，可人们的素质，却是降至最低点了。

1999 年 5 月 6 日，我们四野南下工作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纪念会，出租车不能在中山公园门口停车，必须绕道至旁边的小街才能停。我下车后准备步行去中山公园时，一位青年人骑着自行车碰了我一下，我抬头看他，他竟回头瞪了我一眼：“看什么？”我说：“你碰了我了。”对方答道：“碰了你又怎样！”我道：“你碰了人还这样横！”他答道：“你怎么着吧！”一副想要打架的样子。我心想算了，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跟这小青年一般见识干嘛。小伙子见我没有吱声，骑车扬长而去。我摇了摇头，北京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在劲松社区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跌倒在地，正准备过去把她拉起来，我的朋友拉住我的手说别管了。我正纳闷，朋友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去扶她是好意，可她说不定就赖上你了。说是你把她给推倒的，抓住你不放，要求你赔偿。这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手段。北京已发生几起了，你何必找这个麻烦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道中国人想钱都想疯了，什么招数都使出来了，中国人怎么变得这样丑陋啊！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和友善竟然被物欲扫荡一空。一个民族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不叫人痛心。

大陆普遍存在笑贫不笑娼的心态。每年有上万女子到东南亚去卖淫。这些妇女多半来自西南贫困地区，有的以介绍工作为名，到泰国去干卖淫勾当。根据大陆警方统计，从 1994 年至 2002 年，已有五千名少女在泰国沦为娼妓或性奴隶。台湾海岸是不设防的，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往返两岸，大陆女子登台卖淫的不少。根据最近"两岸治安研讨会"指出，2000 年到台湾卖淫的大陆女子有九五三人，到了 2001 年，已增加到一千四百三十二人了。她们从福建平潭附近往返两岸，有的以假结婚手段进入台湾，实际是以卖淫为业。这些女孩都是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不但遍布东南亚，现在已蔓延至东欧、西欧，甚至扩散到北美。

久居美国，对此地的华人也有看法。美国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可多半又脏又乱，比别的族裔的住区都差，好像脏乱就是中国人的特色似的。来美国的大陆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原因，害怕共产党的运动、斗争，为了寻求民主自由和免受政治迫害而来美，这种人知识份子较多。另一种经济原因，认为美国到

处是黄金，只要在地上拣就是。其实大错特错，美国不是天堂，它的社会也有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

有许多中国人是以留学、访问、交流、参观学习等名义来美的，但有些人一下飞机就脱队失踪，非法地居留下来了。最典型的是十年前上海京剧团来美演出，任务完成后，以名角带头集体脱队，只有一个书记回去，余下的人全都留在美国。十多年过去，现在他们可能已有身份并安营扎寨了。另一个例子是五年前上海昆剧院来美国演出，巡回演出结束后，团长带头，全团不回去，现在这些人仍在美国混呢。在美国，大陆来的人找工作比台湾或香港来的人困难，很多人在餐馆打工。大陆人干活慢悠悠地，吊儿郎当。也难怪，在大陆吃大锅饭吃惯了，不习惯美国私人企业的快节奏。共产党长期的大锅饭政策，使得中国人原来的勤俭美德全给改造光了。

许多老华侨说六十年代来美国读书的人，由于工作关系留在美国，过去美国人挺尊重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可现在新来的中国人竟大做犯法的事，特别是偷渡客和非法过期居留的人，在美国各大城市乱窜，搞得中国人形像特差。

我住的这个小城镇里有一位来自大陆的女性，四十来岁，给一个美国老头当管家，她把老先生侍候得无微不至。老人很开心，认为晚年遇到这么个好女人真是上帝保佑，连老头的女儿也特别感动，认为这位中国女子心地特别善良，有爱心。过了一年多，女士就跟老人结婚了。结婚三年，女士忽然间把大陆的女儿接来了。老头问她，你不是独身一个，怎么又有女儿了？她说独身是没有丈夫，并不表示没有女儿呀！老头认为她不老实，对她态度变了。而这位女士也翻了脸，不再侍候老头了。两人经常吵

架，最后女的提出离婚，房子归她，老头竟被扫地出门，轰出去了。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小城，中国妇女的形象成了狡猾自私、无情无义的代名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过河就拆桥。后来这个小城有些老美见到中国人就把大姆指往下指。

就拿我自己为例，我的第二任夫人，是音乐学院本科毕业生，英文、意大利文都相当好，外国专家讲课，她可以当场直译，是一个才女。她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到美国来。当时的文艺界中，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多，而且全家都在美国的只有我一个人，于是她主动想法接近我。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共谈了马拉松式的八年恋爱。按常理说，这个爱情是有牢固基础的。但到了美国之后，受不住物质和金钱的引诱，她变了。她急于满足她的奢侈欲望，一心想发财，特别是想有一座美国的小洋房。可我们刚到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然而她等不及，到美国三年之后提出离婚。按美国移民法规定，拿到绿卡三年之后才可以提出离婚，不到三年就提出离婚者，可以上诉移民局取消绿卡，遣送回国。在没有提出离婚之前，她认识了一个秃顶的美国老头，他其貌不扬，没有什么文化知识。是一个司机，原籍德国，二次大战时当过德国纳粹士兵。他有一幢木制的小楼房，可在她眼里就是洋房了。她跟老头勾搭上了，于是提出离婚，并搬过去跟他住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在一起研究分析，说她不是爱那老头，而是那一幢小楼房。其实她的眼光也太短了，那幢小楼房很一般，不值几万块，在美国打工五、六年就可以买得起。

事情发展得也很绝，不到一年，他们还没有结婚，老头忽然得病，没几天就死了。遗嘱上什么也没有给她，她什么也没捞着，白白侍候老头一年多。事隔两年，她又找了一个老头，结婚

刚两年，老头得了癌症，才三个月就命归西天。这是我自身经历过的，是在美国的中国妇女的另一个写照。

我这个人从来都非常信任同学，特别是中、小学时代的同学，但我被同学欺骗和陷害的事却不止一次发生过。一位中学同学把她的妹妹介绍给我，据她说，妹妹既贤慧又单纯，我在回大陆时，跟她交往了一段时间，这位女士表现得特别贤淑，我回美国后便给她办了绿卡。当她来到美国时，竟然从北京市公安局那里搞了一套假证件，并且还有公安局的公证书，证明她儿子是我的亲生儿子。这一切她并未告诉我，是她自己偷偷地去找律师申请儿子来美，当律师通知我签字时我才知道。她还企图把她家里其他的人都弄来美国打工，这一切计划，后来才知道是她姐姐，我的中学同学——一个共产党的中层干部一手策划的阴谋。我的这次婚姻又是不到一年就以离婚而告终。

我爱中国，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是那里是我的故乡。然而共产党的独裁和暴戾迫使我逃出“古拉格”，远离中国。晚年的我只能生活在异国他乡，从遥远的地方怀念它。

苦难的历程

黑色文库 第五集
作者/ 文彻赫恩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廖天琪　古原
封面设计/ 蓝飞　古原
华盛顿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 作者 文彻赫恩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和转载文字和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Difficult Years
By Wenche Heen
Black Series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ww.laogai.org
Washington, DC
July 2003
ISBN 1-931550-33-6
Printed in Washington D.C.
定价：U.S. $ 15.00

一位演员的悲剧人生

苦难的历程

文彻赫恩 著

作者简介

文彻赫恩是满清皇族的后裔，曾是热血革命青年，参加过1947的学生运动，49年参加解放军南下，5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年被划为极右分子，58年被逮捕入狱，78年被平反。文彻赫恩曾执导和演出过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才华横溢，可惜生不逢时，从26岁起共失去二十年的人身自由，其中经历了饥饿、疾病及虐待的摧残，身心俱创。80年代，他带着受伤的心离开中国，移居美国至今。

黑色文库 第五集
劳改基金会

Difficult Years
By Wenche heen

Black Series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33-6
Printed in Washington D.C.
US$15.00

ISBN 1-931550-33-6
51500
9 781931 550338